

總第 **20**  
FEBRUARY 2026

**左野堂**<sup>TM</sup>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中國民主黨主辦

## 《在野党》杂志社严正声明

谴责中共当局重判黎智英

《在野党》杂志社就中共当局依据所谓“国安法”对香港传媒人黎智英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一事，表示最强烈的关切与最严正的谴责。

黎智英长期从事新闻与出版工作，其职业行为属于正当的媒体活动范畴。在任何具备基本法治与宪政原则的社会中，新闻工作者依法行使报道、评论与监督权力之职责，理应受到保护，而非遭到刑事打压。中共当局以“国家安全”为名，对正常新闻活动实施重判，已严重背离现代法治精神，公然侵犯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

我们郑重指出，中国《宪法》及香港《基本法》均明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论、出版与新闻自由。当前以国安法之名行政治清算之实，不仅损害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也从根本上侵蚀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基础。

《在野党》杂志社郑重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以法律工具压制良心与真相的做法，切实尊重新闻自由与公民基本权利。

我们将持续关注黎智英及所有良心犯的处境，并坚定声援一切为真相与自由发声的人士。

——《在野党》杂志社

朱虞夫/张致君 撰 2026年2月9日

### *Statement by "The Opposition" Magazine: A Solemn Condemnation of the CCP's Heavy Sentencing of Jimmy Lai*

*"The Opposition" (Zai Ye Dang) Magazine expresses its deepest concern and strongest condemnation regar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uthorities' decision to sentence Hong Kong media mogul Jimmy Lai to twenty years in prison under the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Jimmy Lai has long been dedicated to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 his professional conduct falls squarely within the scope of legitimate media activities. In any society governed by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constitutionalism, journalists exercising their duty to report, commentate, and provide oversight should be protected, not subjected to criminal suppression. By imposing such a heavy sentence on normal journalistic activities under the guis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CCP authorities have gravely departed from the spirit of modern rule of law and committed an overt violation of the freedoms of speech and the press.*

*We solemnly point out that both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explicitly guarantee citizens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speech, publication, and the press. Utiliz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carry out political liquidations not only undermines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but also fundamentally erodes the foundation of public trust in the law.*

*"The Opposition" Magazine solemnly calls upon the CCP authorities to immediately cease the practice of using legal instruments to suppress conscience and truth, and to earnestly respect press freedom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citizens.*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of Jimmy Lai and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nd we stand in firm solidarity with all those who speak out for truth and freedom.*

— "The Opposition" (Zai Ye Dang) Magazine

Written by Zhu Yufu and Zhang Zhijun

February 9, 2026

開篇 <u>Prologue</u>	01	目錄 <u>Preface</u>
02 在野黨簡介 <u>Contents</u>	03	05
思想火種 <u>The seed of ideas</u>	05-06	人物專訪 <u>Voices of Change</u>
07-12	民主火種 <u>The Spark of Democracy</u>	
真相中國 <u>Truth China</u>	13	13
13	中共罪行 <u>The CCP's Crimes</u>	
14-30	時事評論 <u>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u>	
31-40	社會評論 <u>Social Commentary</u>	
民運之路 <u>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u>	41	41
41-44	民運之聲 <u>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45-51	民運行動 <u>Democratic action</u>	
52-53	民運風采 <u>Portrai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54-55	民運同道 <u>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u>	
連載 <u>Serial</u>	56	56
56-58	作品連載 <u>Serialized Works</u>	
檔案館 <u>Archives</u>	59	59
59-60	迫害實錄 <u>Persecution Records</u>	
雜誌社介紹 <u>About the Magazine</u>	61	61

#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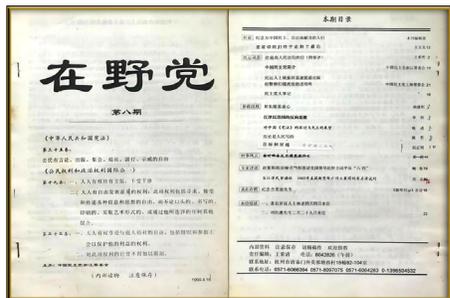
##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 组织框架介绍: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及加拿大分社，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被惩罚的人生与未被熄灭的信念

— 专访陈西

采访：林小龙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朱虞夫  
资料整理：林小龙

陈西，基督徒，贵州民主人权运动核心人物之一。自1980年代起，他先后参与组织「沙龙联谊会」「爱国民主联合会」「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及「公民国际人权研讨会」，发表政论文章一百七十余篇，著有五十万字《绿色文化工具书》。因坚持民主理念，他三次入狱，累计服刑二十三年。

1989年的六四事件，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原本身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教师的他，被当局“选定”为贵州地区的代表性人物。在国家机器的指认下，他从被动参与者转为主动承担者——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的民主进程紧密绑定。从此，牢狱、伤痕与打压成为常态，但“做一个反者、做一个公民”的信念始终未曾动摇。

上期采访回顾了他的人生转折与苦难经历，也呈现了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思考——通过制度约束驯化权力，而非制造新的权力循环。他寄望年轻一代延续反对派传统，记录历史，推动自由、民主与公民意识的成长。

然而，出狱后的陈西并未获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他原本应像普通退休教师一样，安稳地回归生活，却发现自己过去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保障体系被当局系统性剥夺。尽管家人为他多年缴纳了社保，地方社保部门却以判刑期间不计入缴费年限为由，粗暴地取消了他本应享有的养老金，将一个本该安享晚年的公民逼入长期的不确定与困顿之中。

这样的做法，在中国的异议人士群体中并非孤例：无数因为坚持信念、追求自由的人，即便服完刑期，依然被剥夺退休权利和基本生活保障，昔日为推动宪政民主、为国家社会贡献的精力与付出，被赤裸裸地否定和掠夺。

对陈西而言，这种制度性的“延续惩罚”无疑暴露了中共权力的冷酷与无情：惩罚从未在庭审结束后止步，极权通过行政、司法、社会机制层层加码，持续重新界定他的身份与权利，使他无法回归普通公民的生活轨迹。在独裁极权下没有公正、没有救济，只有一套精心设计、永不停息的权力机器——专门针对那些敢于质疑、敢于反抗的人而运转。

每一次被取消的养老金，每一次行政阻碍，都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中共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自由与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林：您从出狱之后，共产党对你的养老金是如何处理的？

陈：我出狱之后，我对社保局、军人事务部进行了



投诉，我家里人给我交了社保，但是社保局说我坐牢十年，给我取消了，这样的行为不单单是一种契约的不履行，更是一种落井下石。我已经受到了惩罚，共产党的这种行为是跟法律相抵触的，完全就是以地方的行政法规去处罚我。之前我是贵州省贵阳学院的教师，1989年因“64”事件被学校开除。

林：当社保部门告诉你取消你的社保待遇的时候，有没有提供书面解释和法律依据？

陈：没有法律依据，当时是以贵州省的行政法规给我解释的，我认为这跟法律不相符，这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表现，因为我坐牢，我退伍军人的待遇可以取消，但是我坐牢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的正常待遇不应当给我取消。

林：您是否进行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陈：我进行了行政复议，从社区到观山湖区到贵阳市政府，他们是这样答复我的“根据贵州省的行政法规，坐牢期间的缴费不应当计算在内”。地方性法律法规与法律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我在我的投诉状中给出了建议，法律的处罚是有边界的，但是你们对我的处罚是没有边界的，你们可以剥夺我退伍军人的优待，曾经我作为一名军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不能磨灭的，但是现在你们对我的处罚无异于“无期徒刑”。

林：如果按照正常的社保状态，那么现在你能够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待遇？

陈：如果按照正常工龄来计算，那么我可以领到5~6千，社保局有二十年的工龄没有给我算，加上五年的军龄一共是二十五年，家人给我交了十八年的社保，一共是四十三年。

林：您觉得这样的情况是单纯的行政行为还是一个政治惩罚的延续？

陈：这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没有进入法治国家的理念，而是阶级斗争，还是旧理念的模式，遇到“敌人”就要斗争到底，绝不姑息。

林：您去反应您的情况的时候是否有工作人员暗示过您的情况跟别人的不一样？

陈：没有暗示过我，社保是我的家人给我交的，但是处罚我的法规文件是不给我看的，除非我同意他们的处罚，都是暗箱操作。导致这种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国家还停留在“马列主义”时期，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随时都要求“意识形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党治”国家，全由共产党统治。

林：据您了解像跟您一样的所谓的“政治犯”是否遭到同样的遭遇？

陈：都是一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党治”的受害者。

林：现在您没有养老金，那么您的日常开销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陈：主要是来源于我的家人。

林：那么您现在住房、医疗开销压力大吗？

陈：压力肯定大，现在经济状况不好，而且物价还高。现在当地公安、政法委四十多个人轮班看守我，“疫情”早就过去了，但是“红袖章”还在我居住的这里，每年他们统计过花在我身上的慰问费是200万元，共产党的维稳经费是很高昂的，管理国家的经费是全球最多的，这就是专家学者已经公布的。五年前我出狱的时候，当时公安局的某位大队长曾经用一千万让我“息事宁人”，但是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们，我的人生不是为金钱而活，你们把我这种精神看得太渺小了。早期贵州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就是这样处理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人给了五十万让他们放弃民运。

采访并非发生在同一空间。记者身在海外，陈西本人仍在中国，交流只能通过远程方式断续进行。但正是在这种被时间、地域与审查层层隔开的状态下，一个个细节得以被反复确认、拼接与记录。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与清晰的表达。惩罚可以剥夺自由、切断收入，却始终无法彻底消除一个人对尊严、法治与自由的坚持。这，或许正是陈西至今仍被严密“看守”的真正原因。

在中国当下的政治现实中，“出狱”并不意味着惩罚的结束。对一些人而言，它只是另一种长期惩罚的开始。贵州民运人士陈西，正是这样一位始终被制度持续追逐的人。

当制度以无边界的权力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时，公民的责任不仅是自保，更是守护普遍的法治原则与社会正义。

陈西选择的不仅是生存，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通过记录历史、捍卫自由、批判权力。

他试图为极权社会留下一条可能的出路：在制度的野蛮面前，公民的理性与良知可以成为驯化力量。

## Chen Xi: A Life Punished, A Faith Unextinguished

*This article recounts the life of Chen Xi, a Christian and long time democracy advocate from Guizhou, whose experience reflects the lasting consequences faced by political dissidents in China. Since the 1980s, Chen has participated in civic organizing, promoted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written extensively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tic principles. For these activities, he has been imprisoned three times and has served a total of twenty three years in prison.*

*The events of 1989 marked a decisive turning point. Once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university lecturer, and state employee, Chen was identified by authorities as a representative local figure during the pro democracy movement. From that point onward, imprisonment,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exclusion became recurring realities. Despite repeated incarceration, he maintained what he describes as a civic obligation to record history and advocate for institutional limits on power.*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punishment did not end after his release. Although his family had paid soci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for many years, local social security authorities excluded significant periods of his employment and military service when calculating his pension. Officials cited provincial regulations, effectively denying him the retirement benefits he expected. Chen argues that this decision lacks proper legal basis and represents an administrativ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al punishment beyond the original court sentence.*

*He pursued administrative review at multiple levels of government, but his appeals were rejected. In his view, the case illustrates how political penalties can persist through bureaucratic mechanisms long after formal imprisonment ends. He also notes that other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have reportedly encountered similar treatment, suggesting a broader structural pattern rather than an isolated dispute.*

*Chen further describes ongoing surveillance and the allocation of considerable state resources to monitor him even years after his release. According to his account, financial inducements were once offered in exchange for his silence, but he declined, stating that his beliefs and dignity were not negotiable.*

*The article portrays Chen Xi not merely as an individual case, but as an example of the tension between 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demands for legal accountability. It concludes that while imprisonment and economic restrictions may limit material security, they have not extinguished his commitment to civic conscienc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tic refor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行政复议申请书

作者：陈树庆  
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申请人：**陈树庆，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1号，联系电话：87882789。

负责人：王思婕 职务：主任

## 行政复议请求：

请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社会保险责任，按照申请人的《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所显示的累计缴费24年4个月的年限，为申请人办好退休资格确认、核定退休金额并发放退休金。

## 事实与理由：

至2025年12月25日，申请人陈树庆已达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

20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39分许，陈树庆到被申请人设在拱墅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办公场所办理退休手续，办事人员以陈树庆曾经因遭2007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和2016年“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6个月为由，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剩余缴费年限只有九年多，不足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规定，拒不办理申请人的退休资格，由于申请人多次要求，被申请人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还有一份盖有被申请人印章的《告知书》，及一份制作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的《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浙人社函[2010]358号-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申请人通过认真审阅和分析，认为前述《告知单》、《告知书》、浙人社函[2010]358号所依据的法律及政策明显适用不当或效力不足，申请人不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条“可依照本法申请复议”及该条第（十二）项关于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情形规定，特向拱墅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请求依法做出公正的决定，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申请人认为，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石，民以吏为师，全社会的诚实守信，政府行为要做表率。本案20多年来，申请人、申请人家属、申请人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申请人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被申请人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的最近几年（这其中就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被申请人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要被申请人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相关政策”为托词，拒不履行被申请人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让人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荡然无存。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每一个涉及政府“言而无信、约而不守”的案件，都会逐步侵蚀并最终摧毁政府的公信力。

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具体行政行为中，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利益能否得到保护，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政府是否可以随意违约？申请人认为政府违约，其“理由”必须经得起严格的法律限制，本案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拒绝为陈树庆现在办理领取养老金资格，所依托的“相关政策”是否也站得住脚呢？不妨展开初步的分析如下：

本案的法律关系由两项事实构成，第一项是缴纳社保，其中包括服刑期间的缴纳是否有效？陈树庆、就业或代缴单位等是缴费义务人，政府（社保经办机构和财税机构）是收费权力人；第二项是到了法定年龄领取养老金，陈树庆变成了领取权利人（受益人），政府变成了社会保险支付的义务人。该行为由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法定授权履行政府的社会保险管理与服务职责，既有具体行政行为的性质，又由于该行为的整个过程由民事主体陈树庆一方和行政主体社保经办机构一方共同完成，类似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合同”。如果被申请人主张第一项事实陈树庆一方缴纳10年6个月刑期间的社会保险无效成立，那么本案被申请人制作的《告知书》、《告知单》上认为陈树庆只剩下9年10个月的有效缴费期也是确立的；如果陈树庆认为己方缴纳社保包括刑期内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的情形，应该认定有效，本案被申请人“约而不守”的《告知书》、《告知单》就是错误认定，代表政府方履职的被申请人应该尽快按规定替陈树庆办好退休手续并按时发放法定与约定的养老金。

现代法治社会是“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对民众是法无禁止即自由”，要主张作为民众陈树庆一方缴纳刑期内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无效，除不可抗力无法继续履行外，就必须指出其“法”之所“禁”。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就有类似的规定，在《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的第六章第三节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事实作为“无效”前提。

从被申请人提供的《告知书》中可见，其推翻约定、拒不履行对陈树庆的社会保险责任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浙人社函[2010]358号）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尤其在《告知书》里，以“属于违规参保缴费”为由，不是强调保险经办机构应拒收缴费人服刑期间参保缴费，而是强调其对于已缴社保，可以通过“该期间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当清退”来毁约赖账。

显而易见，上述《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包括《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里的规定，是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去缴纳社会保险费，立法目的是保障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里面并没有“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浙人社函[2010]358号《复函》，是（此件依申请公开），根据法律未经公布不生效的原则，“依申请公开”不能等同于“公布”，没有对抗不知情相对人的任何效力；《复函》做出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印发日期是2010年10月9日，对我在2010年9月13日已经结束的第一次服刑四年期间缴费显然没有追溯效果；更何况《复函》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级别和效果，属于无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替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制定的“比赛规则”，里面所指的“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明显属于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99条将典型的关于行政主体“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之“第二，减损权利或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所

以《复函》也不能作为政府自己违约的依据。现在虽然还没有走到行政诉讼阶段，所谓“法无德不立”，一个良法的原理，比如最高法关于适用行政诉讼的《解释》第99条，应该不仅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在行政裁断中也是可供参照的。

申请人在与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交涉时，有工作人员解释说“你坐牢期间，无法成为前述《劳动法》等法律条款中规定的缴费企业的真实劳动者，你的职工养老保险只是虚拟的代缴形式，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当时，申请人申辩说“社保代缴，法律至今没有明令禁止，是社会保险开始统筹以来一直默认并在实践中广泛实行的政策，近二十多年来包括你们人社部门在内的机关事业单位许多一线工作人员，并没有在劳务派遣单位真实上班，但由劳务派遣单位代发报酬代缴社保，你们不能对人对己双重标准”他们回答说“劳务派遣是有法可依的”。申请人事后进一步了解了有关劳务派遣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历史与现状后发现，这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编制内外实际上的双轨制所造成的身份性职业歧视，是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同工同酬”要求的行径，而且是超范围使用（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条“劳务派遣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企业（以下称用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适用本规定。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使用被派遣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列入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并为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纠错、改进措施中明令禁止（注：财政部令第102号《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以下各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申请人希望本案不要成为又一个类似“州官放火与百姓点灯”双重标准的典型。

申请人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享受退休的资格与待遇，除了前述实际已缴费的年限及对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外，没有任一现行法律的条款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参与社会保险（包括社保缴费）。而在对申请人的两次判刑的判决书中，判决了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利，并没有判决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当然包括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已经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申请人陈树庆并不因为其服刑就成了“人人”之外，应该享有社会保险。

更何况，本案如果进一步展开下去，还牵涉到中国监狱普遍的对犯人强制无偿劳动的问题。陈树庆第一次坐牢期间自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共计2年零8个月在

浙江省乔司监狱六分监狱七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菜班进行菜肴初加工2年5个月；第二次坐牢期间自2017年1月至2025年3月共计8年2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三分监狱六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面食组烧制犯人主食7年11个月。两次坐牢期间不算第一次坐牢看守所里的零星劳动，实际参加监狱劳动累计10年10个月，所以，根据早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禁止”；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享有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人人有同工同酬之权利，不容任何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任何人不得使充奴工”的相关规定。按照这些国际法的要求，即使监狱犯人依法判决并以改造为目的服“苦役”，也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应的同工同酬及社会保险接轨。如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我国政府能够遵守这些宣言与公约，将我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应有的劳动报酬与社会保障予以考量和贯彻，即使我自己及亲朋好友工作单位替我服刑期间的缴费不算甚至没有交费，也够15年以上办理退休的资格与相关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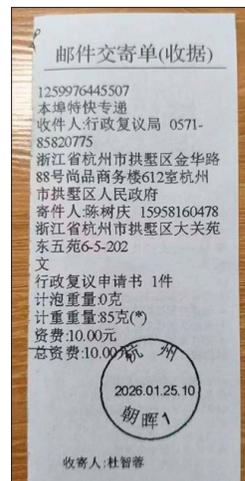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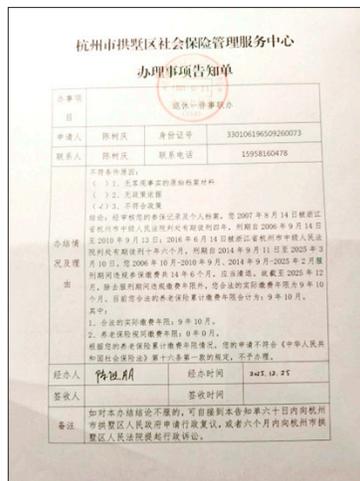
当然，政府遵守已经签署、甚至有的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不仅是法治社会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得“公序良俗”。

综上，鉴于申请人实际社保缴费24年4个月已经超过规定的最低缴费标准15年，鉴于申请人本人及打工企业、家属等在过去缴纳或补交社保费用时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告知，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包含的具有法律地位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服刑期间的社保参与人并没有强制性条款明确排除，鉴于法院对于本案申请人已生效判决只明确剥夺人身及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鉴于申请人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及我国政府已经加入或批准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对于公民同工同酬及普遍无例外的社会保障要求，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恳请复议机关拱墅区人民政府对本案复议请求予以支持，促使被申请人及时办理申请人的退休资格并履行对申请人按照缴费24年4个月年限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

此致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

申请人：陈树庆  
2026年1月25日

- 附：  
一、本《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1份；  
二、申请人陈树庆身份证复印件（包含正反两面）1份；  
三、申请人陈树庆的《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  
四、《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1份；  
五、盖有“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印章的《告知书》1份；  
六、《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浙人社函[2010]358号1份。



###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pplication

Chen Shuqing, a resident of Hangzhou, applies for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against the Hangzhou Gongshu District Social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Service Center for refusing to process his retirement benefits. According to his official contribution record, he has accumulated 24 years and 4 months of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exceeding the statutory minimum of 15 years. Upon reaching retirement age, the authority deducted the periods during which he served criminal sentences, citing a 2010 departmental reply stating that incarcerated persons are not eligible participants in the employee pension scheme. As a result, it determined that his valid contribution period falls short of the required threshold.

Chen argues that no law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expressly prohibits pension contributions during imprisonment, nor were such payments rejected at the time of collection. He contends that the cited departmental document lacks sufficient legal authority and retroactive effect, and that denying benefits violates principles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 legal certainty, and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He further maintains that his criminal judgments deprived him only of personal freedom and certain political rights, not social security rights. Invoking domest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recognizing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he requests that the district government order the authority to confirm his retirement eligibility and grant pension benefits based on his full contribution record.

# 关于提请撤销公安部《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 公民建议书

作者：王全璋  
编辑：胡景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6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本人研读后认为，该《征求意见稿》严重违反《宪法》及《立法法》，理由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规定行使国家立法权。

第十一条又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同时，第九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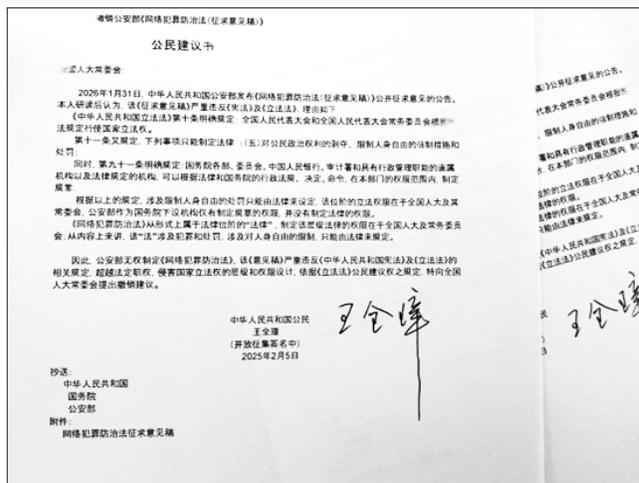
根据以上的规定，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设定，该位阶的立法权限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安部作为国务院下设机构仅有制定规章的权限，并没有制定法律的权限。

《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从形式上属于法律位阶的“法律”，制定该层级法律的权限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内容上来讲，该《法律（征求意见稿）》涉及犯罪和处罚，涉及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只能由法律来设定。

因此，公安部无权制定《网络犯罪防治法》，该《意见稿》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立法法》的相关规定，越俎代庖，侵害国家立法权的层级和权限设计，依据《立法法》公民建议权之规定，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撤销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王全璋  
(开放征集签名中)

抄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附件：  
《网络犯罪防治法（征求意见稿）》



## Citizen Petition on Requesting Revo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s "Cybercrime Prevention Law (Draft for Public Comment)"

This citizen petition requests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revoke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s "Cybercrime Prevention Law (Draft for Public Comment)." The petition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egislation Law, onl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exercise state legislative power, especially on matters involving crimes and penalties that restrict personal liberty. As a department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may issue departmental rules within its statutory authority, but it does not have the power to enact legislation at the level of a national law. The draft is therefore alleged to excee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violate the constitutional allocation of legislative power, and undermine the hierarchy established by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egislation Law.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致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筹备组

作者：朱虞夫

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筹备组全体同仁：

在中国民主党各地方筹备委员会纷纷申请注册，国内民运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蓬勃开展之际，从大洋彼岸传来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筹备组成立的消息，这标志着在国内执政党的积极姿态下，海外民运力量努力适应新形势，以更理性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我们对此感到欢欣和鼓舞，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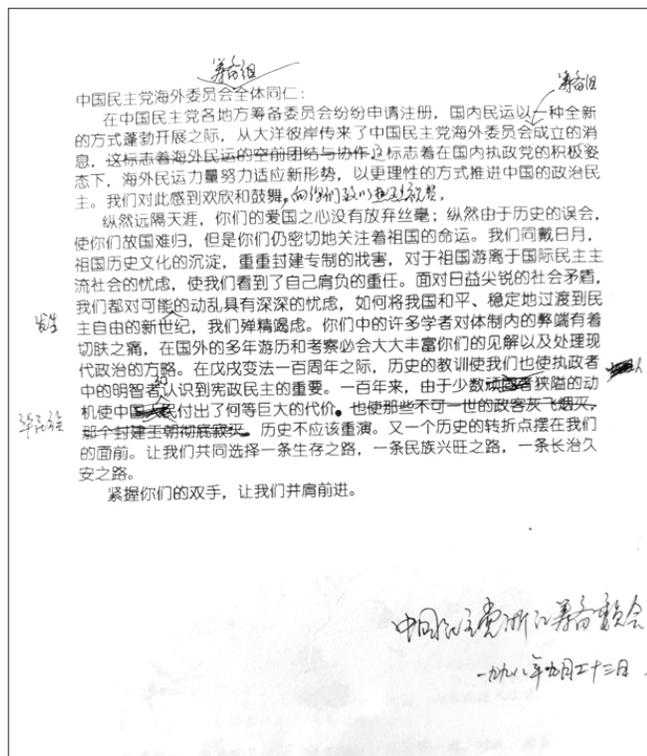
纵然远隔天涯，你们的爱国之心没有放弃丝毫；纵然由于历史的误会，使你们故国难归，但是你们仍密切地关注着祖国的命运。我们同戴日月，祖国历史文化的沉淀，重重封建专制的戕害，对于祖国游离于国际民主主流社会的忧虑，使我们看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我们都对可能发生的动乱具有深深的忧虑，如何将我国和平、稳定地过渡到民主自由的新世纪，我们殚精竭虑。你们中的许多学者对体制内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国外的多年游历和考察必会大大丰富你们的见解以及处理现代政治的方略。在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之际，历史的教训使我们也使执政者中的明智者们认识到宪政民主的重要。一百年来，由于少数人狭隘的动机使中华民族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价。历史不应该重演。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共同选择一条生存之路，一条民族兴旺之路，一条长治久安之路。

紧握你们的双手，让我们并肩前进。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To the Preparatory Group of the Overseas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This letter, issued by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on September 23, 1998, extend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newly formed Overseas Preparatory Committee. It expresses support for overseas democratic activists adapting to changing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and promoting democratic reform in a rational manner. The message emphasizes shared patriotism, concern for China's future, and a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to advanc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peacefully and steadily. Reflecting on historical lessons, including the centennial of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it urges unity in seeking national prosperity, long term 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rough cooperation and prudenc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悼念力虹

作者：朱虞夫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力虹走了。山河肃穆，神人同悲，江海呜暗，大地缟素。

力虹走了，中华顿失英才。我们再也看不到你那刺暴刺孽的健笔奋飞；我们再也听不到你那嬉笑怒骂的口才横溢。剑指邪恶，怜悯贫弱，你那无法掩饰的激情何等可贵：歌颂光明，向往民主，你那烈火一般的追求何等强烈。“一寸自由一寸血”，你身体力行：凭你的才华，你可以“精英”、可以“小资”、可以“中产”，但是，你选择了一条荆棘之路；凭你的努力，你可以“攀升”、可以“高就”、可以“权贵”，但是，你选择了一个追梦之旅。呜呼力虹！舍家抛雏，你匹马冲阵，民族以君为脊梁，捐一腔之热血，消堂堂中国空无人之讥：身陷黑狱，仍不屈不挠，恶警视你成畏途，以一己之被害，除茫茫神州皆铜臭之谑。

呜呼力虹，“我在西湖畔，君羁临平山”，你写给我的手泽犹存，如今竟天人永隔。手奉宝函，感慨万千，字里行间你那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追忆当年，我虽然身羁二监，却知道你在青春监狱医院身受严酷迫害，当局并不提供对你的任何治疗，当严正学转来那里，你幸遇知己而与之倾谈，感到莫大愉悦时，当局立即将你们隔离。可是他们无法改变你的心境，虽然你看不到西湖，但你的心里装着西湖之美，而且比西湖更美上千万倍。虽然他们剥夺了你与亲友的交往，但是你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而踏实，你在深心依然与大家不断地神交。狱友转告我，你并不在意自己的臭皮囊而宁愿活在历史中，于是我知道，你已经选择了不朽。我知道，你的心境是平和的，平静如爱琴海的波底；你的心境是澄澈的，澄澈如海天一色。

你的家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现状：一个好端端的人被抓走了，居然在非人对待的看守所仅仅二个多月就被折腾罹患了如此不治的绝症。你柔弱善良的夫人每个月面对病情不断加重的你，忧心如焚。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当局申请为你办理保外就医，可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她不知道的是，当局何等的怕你，他们怕你的嘴会说，他们怕你的手会写，他们怕你的人格感召力会唤醒越来越多的人的良知，他们决意要将你的肉体虐杀。

呜呼力虹，当你奄奄一息时，监狱将你丢给你的家人，你在重症监护室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阶段。那天我去看你，你骨瘦如柴，气若游丝。我俯身向你，轻轻地说：“力虹，我是朱虞夫，我来看看你。”你无神的眼睛

顿时闪烁光彩，你使劲地点点头—虽然只是微弱的动作，我看到了你对战友的深情厚谊。哦，力虹，为了把宝贵的探视时间留给你的夫人和姐姐，我匆匆地走开了，可是我一直站在你的附近，看着你，看着你的家人忙碌地为你擦身、按摩、换衣，我满噙热泪：我知道，你的来日不多，我赶快偷偷地拍了几张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

呜呼力虹，此刻，正如你在诗作《大地》中所说的，你在“感受土壤中的气息，聆听大地深处春天迅猛来临的呼啸”。我们与你同感。此刻，我面对你的遗像，胸臆充满勃郁之气：你那能洞穿灵魂的明眸在诉说你的期待，期待我们继承你的未竟之业；你那紧抿的嘴唇在递送着你的坚毅，告诉我们民主之路仍充满艰辛。你是自信的，坚信民主中国一定会来到；你是乐观的，相信这一天已经不会太远。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审视我们自己，面对你的勤奋，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面对你的付出，我们有什么不能舍弃？力虹，你的精神不死，你的道德感召力依然存在，我们会在你的精神激励下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以告慰你，告慰林昭、遇罗克，告慰一切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捐躯的先烈。力虹，你安息吧！

哀哉力虹，壮哉力虹。  
生为豪杰，死为鬼雄。  
磨而不磷，泰岳高耸。  
椽笔如刀，世人赞颂。  
华夏壮丽，赖有诸公。  
我辈谨记，圭臬是奉。  
春天不远，岂畏严冬。  
千秋万代，气贯长虹！

2011年元月7日（力虹头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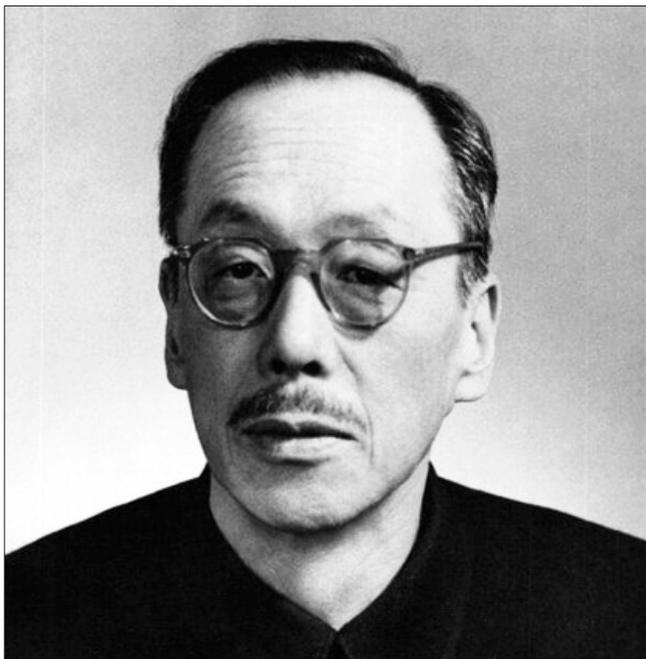
## In Memory of Li Hong

*This elegy mourns Li Hong as a courageous democracy advocate who endured persecution, remained steadfast in prison, and inspired others through his moral conviction and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freedo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酷吏：康生

作者：钟然  
编辑：钟然 翻译：周敏



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秘密警察体系、意识形态审查机制和党内政治清洗制度的关键奠基者之一。他在毛泽东时期长期掌控情报、保卫与意识形态领域，被普遍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幕后权力人物之一。

康生早年加入中共，20世纪30年代长期在苏联活动，深受斯大林体制及其秘密警察体系影响。回国后，他在延安时期主持中央社会部，负责情报、保卫与肃反工作，逐步确立了以“政治审查”“思想清洗”和“组织纯洁性”为核心的整肃模式。这一时期，他通过逼供、互相揭发和无限扩大化的“特务”认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为中共党内恐怖政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康生权力全面显现的起点。在其主导下，“抢救失足者”“审干”等运动演变为系统性的政治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被指控为“叛徒”“特务”“托派”，身心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在文革中再度被整肃的人，其最早的“政治原罪”正源于康生在延安时期建立的档案与定性。毛泽东不仅纵容这一做法，且将其视为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

建政初期，康生一度淡出公开权力核心，但并未真正失势。他长期掌握意识形态审查、历史定性和档案系统，与江青等人保持密切关系。随着毛泽东对党内“修

正主义”的警惕加剧，康生逐渐重新被倚重，成为文革前期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准备者。他炮制的现代版文字狱《刘志丹》案牵连的受害者达六万多人，其中六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刘志丹》案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虽不以公开形象示人，却在定性、定罪和路线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968年获得了中共首要情报机关中共中央调查部的领导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成为在党内斗争中令人畏惧的刽子手。他以“考据”“史学”“理论斗争”为手段，提出并推广“影射史学”“反党学术权威”等罪名，将学术分歧和历史研究转化为政治罪行，为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提供了“合法性”包装。最终在严肃历史研究与回忆资料统计中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超过30万人！

在重大政治案件中，康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打击，并系统性地操控调查结论与证据来源。大量所谓“历史材料”与“特务证据”事后被证明存在伪造、篡改或恶意拼接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成为决定个人生死的重要依据。

与街头暴力的红卫兵不同，康生的作用体现在制度层面。他将迫害流程化、审查技术化，使政治清洗不再依赖情绪动员，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意识形态话语持续运转。他所塑造的模式，使国家权力能够以“理论正确”“路线斗争”的名义，长期、稳定地实施打压。

1975年，康生病逝，终其一生未被追责。文革结束后，中共在内部文件中承认康生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犯之一”，但并未对其进行公开清算，也未系统纠正其制造的大量冤案。他的责任被有限度地承认，却被刻意从制度根源中剥离。

官方讣告仍将其描述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在历史评价中，康生更多被视为中共极权运作的典型样本。他将秘密警察逻辑、意识形态垄断与个人崇拜结合，使政治迫害成为一种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方式。

康生不仅是毛泽东时代的重要权力人物，更是中共政治清洗机制的制度设计者之一。他所建立的整肃模式，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和权力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阴影远未随着个人死亡而消散。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伊朗伪政权是个反人类集团

作者：前自由亚洲记者孙诚  
编辑：张致君 责任编辑：李聪玲 翻译：彭小梅

目前，伊朗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屠杀。有1.2万到2万名伊朗手足，遭到了伊朗恐怖主义伪政权的残酷屠杀。

众所周知的是，伊朗伪神权政权自1979年夺权以来，就建立了一个十足的反人类体系。在1980-1988年间，伊朗伪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集团，这两个反人类势力，在中共的两头支持下，进行了狗咬狗的战争，造成了中东超过100万人的死亡。

在1988年，伊朗伪政权曾一次性处决了约3万名政治犯，而这只是这个血腥政权众多暴行的冰山一角。

从1988年到1998年，伊朗伪政权连环谋杀了近百名异议知识分子。

2009年，伊朗伪政权的极端派头目内贾德，通过选举舞弊上台，愤怒的伊朗民众发动了绿色革命，再次遭到血腥镇压，有数千人被杀害或被捕。

在2019、2023年，伊朗民众又曾展开两次壮阔的民主革命，都遭到了伊朗伪政权的血腥镇压，每次都有成百上千的人遇害。

此外，在最近二十年来，伊朗伪政权勾结苏共余孽普京集团和中共，构成了新时代的轴心国。这一新轴心国集团四处发动战争和恐怖袭击，到处屠杀各国民众：

在欧洲，伊朗伪政权大量向普京集团提供无人机，和中共一同为普京集团的侵乌战争提供大量支援。

在中东，伊朗伪政权勾结俄罗斯普京集团，伊朗扶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等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也门等国民众。在叙利亚，伊朗伪政权勾结普京集团，支持对叙利亚民众使用毒气的大独裁者阿萨德，造成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死亡。

在亚洲，伊朗当局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共的伪“香港国安法”、支持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和中共紧密合作。

以上这些，仍不是这个邪恶政权的全部罪恶。

伊朗伪政权不遗余力地实行宗教迫害政策，大量平民因其宗教信仰被这个邪恶政权杀害、判刑。例如，仅仅在2024年一年，96名伊朗基督徒就共计获刑263年，而这只是伊朗基督徒受迫害情况的冰山一角。至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巴哈伊教等宗教，也遭受着伊朗伪政权严酷的镇压和迫害。

伊朗伪政权残酷迫害着国内的少数民族群，镇压各民族争取自决、自由、民主的运动，其中库尔德族和俾路支族受害尤深。在2022年9月，一名库尔德族女性因为



拒绝遵守伊朗伪政权强制女性戴头巾的政策，就惨遭伪政权所谓“道德警察”的逮捕和杀害。这次暴行引发了抗议的浪潮，而伊朗伪政权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杀害了数百人、逮捕了数万人。

伊朗伪政权根据其荒谬的神棍统治，不但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而且在它的伪法律中保留了将人用石头活活砸死、将人公开吊死、斩首等极其野蛮的刑罚。

到目前为止，伊朗已有上万人被伪政权以石刑处死。仅仅在2010-2016年间，伊朗就有4741人被以石刑、公开吊死等方式公开处决——用残忍的方式将人公开虐杀，是伊朗伪政权的家常便饭。

在伊朗，一个人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公开吊死。

有婚外情行为的人，则会被更残忍地用石头活活砸死。而另一方面，极为讽刺的是，伊朗伪政权却公开允许一夫多妻制，其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等恐怖组织，更是犯下过强奸、鸡奸平民的残酷罪行。许多伊朗的女性在被伪政权处决前，还会遭到伪政权走狗系统性的奸污。

了解到这些历史，我们就能知道，近日伊朗伪政权屠杀上万民众的暴行，就是这个反人类政权的“日常操作”。而这个反人类政权早已和苏共余孽普京集团及中共深度捆绑，这个反人类政权的匪首哈梅内伊是全世界排名前几的反人类罪犯。

因此，只有推翻俄中伊三国的暴政极权，世界才会迎来安宁。只有终结这个新轴心国集团，世界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Take Down Putin!

Take Down CCP!

Take Down Khamenei!

Free Iran!

Freedom! Freedom! Freedom!

Azadi! Azadi! Azadi!

(注：Azadi! Azadi! Azadi!是伊朗民主运动的标志口号，意为“自由！自由！自由！”)

## 一个“没有国家的议会”的民主实践

——从流亡藏人选举看民主政治的真正根基

作者：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一个“没有国家的议会”，正在用最直接、也最刺眼的方式，拷问拒绝民主的中共政权：权力到底从哪里来？

2026年2月1日，分布在全球27个国家的流亡藏人，用选票选出了自己的议会。他们没有主权国家、没有领土、没有军队、没有国际法承认的政权架构，却依然坚持用选举和议会来组织政治生活。这是一种极其清醒的政治判断：如果一个群体还想作为“人”存在，而不是作为被安排、被管理、被代表的对象存在，那它就必须掌握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

他们的实践本身，就是对一切专制政治的讽刺。

中共国不让人民投票；而没有国家的人却坚持让人民投票。

中国官方将西藏流亡议会称为“闹剧”“非法组织”，真正荒诞的恰恰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拥有完整国家机器、拥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权，至今仍然不允许人民用自由选举产生真正的立法机关，不允许人民通过选票决定最高权力的归属，不允许人民用制度性方式持续监督和制衡权力。

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却没有人民选择代表的权利；我们有“协商会议”，却没有公开、自由、平等的协商；我们有无数会议，却没有一次真正让人民说“同意”或“不同意”的机会。

在中国，权力不是从人民那里来，而是从体制内部循环中来；不是对选民负责，而是对上级负责；不是接受监督，而是被保护起来。人民在这个结构中，始终只是“治理对象”，而不是“政治主体”。

而民主议会的逻辑恰恰相反。它的核心不是“稳定优先”，不是“集中统一”，不是“正确路线”，而是三个简单却致命的问题：

谁授权你掌权？

你凭什么继续掌权？

你出了问题，谁能让你下台？

没有议会，这三个问题永远不能公开提出；没有选举，这三个问题永远没有制度答案。

流亡藏人用最不利的条件，做了最标准的民主动



作：选举、授权、监督。他们没有等“形势成熟”，没有等“国际承认”，没有等“条件允许”，他们只认一个原则：只要我们还是人，我们就有权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选票不是国家发给人民的奖励，而是人民对权力发出的许可。

反观中国，政治从来不是让人民参与，而是让人民“理解”“配合”“执行”。政策可以一夜之间改变一个行业、一个群体、几代人的命运，却从来不需要经过人民授权；法律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边界，却从来不需要经过真正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讨论。人民被当成治理对象，而不是政治主体；被当成统计数据，而不是权力来源。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文明层级的问题。

一个社会如果长期不允许人民通过制度表达意志，最终只会得到两样东西：表面稳定与内部空心。权力越集中，社会越沉默；沉默越久，爆裂越不可控。压制不是消灭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向地下；控制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把矛盾延迟到更剧烈的形式爆发。

西藏流亡议会给中国最刺眼的启示是：民主不是国家给的，是人民要的。他们用选票维系政治共同体，而我们却用沉默换取表面秩序。一个靠人民投票维系的共同体，哪怕没有国家；一个靠人民沉默维系的国家，终究会失去人民。

中国若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政治文明国家，唯一的

路径不是继续强化控制，而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议会制度。不是象征性的“代表机构”，而是实质性的权力来源；不是对上负责的官僚结构，而是对选民负责的政治结构；不是密室政治，而是公开辩论。

民主议会的意义，不在于它多热闹，而在于它让权力不得不得回答人民的问题。议会存在的真正价值，是让权力失去“天生正确”的特权，让任何决定都必须接受质询、审查和否决。

没有这一套制度，中国就永远只能是“被管理得很好的社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管理的国家”。

很多人说，中国太大、太复杂、不适合民主。这是对人民的侮辱。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天生适合被统治、不适合自治。真正的问题不是人民“能不能民主”，而是权力“肯不肯让步”。

流亡藏人用一个“没有国家的议会”，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政治可能性：即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只要人民不放弃对尊严与参与的坚持，民主就不会死亡。他们用制度对抗流亡，用选票抵抗消失，用议会证明自己还活在政治意义上。

而中国的问题正好相反：国家还在，机器还在，权力还在，但人民在政治上越来越“消失”。不消失在物理意义上，而是消失在制度中。没有选票，没有议会，没有授权，没有制衡，人民只剩下服从和忍耐。

一个没有人民授权的国家，终究只是一套运转良好的管理系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管理系统需要效率，政治共同体需要尊严。管理系统追求秩序，政治共同体追求正当性。

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够不够快，而是政治是否够正当；不是经济够不够大，而是权力是否来自人民。

流亡藏人的选举提醒我们：民主不是疆界的产物，而是人的权利；不是国家赐予的装饰，而是人民争取的根基。一个政治文明是否成熟，不取决于权力多强，而取决于人民是否拥有制度性发声权。

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深厚文明积淀的国家来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议会，不仅是制度改革，更是一场文明跃迁。它意味着人民从“被管理者”变成“政治主体”，意味着权力从“自我合法”变成“人民授权”，意味着国家从统治结构变成公共共同体。

流亡藏人用一个“没有国家的议会”，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句极其沉重的话：国家可以没有，尊严不能没有；政权可以被剥夺，参与权不能被取消；土地可以失去，政治主体性不能放弃。

而对中国来说，问题只剩下一个：

什么时候，十四亿人，才能像那九万名流亡者一样，真正拥有一张决定国家方向的选票？

## *A Democratic Practice of a "Parliament Without a State": On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On February 1, 2026, Tibetans living in exile across 27 countries elected their own parliament. They possess no sovereign state, no territory, no army, and n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government structure. Yet they continue to organize their political life through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Their action rais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for authoritarian systems: where does political power come fro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democratic legitimacy does not originate from state machinery, but from popular authorization.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jects competitive elections and prohibits citizens from choosing national leaders through free vote, a stateless exile community insists on maintaining electoral procedures, public autho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versight. This contrast exposes a core divide between governance based on control and governance based on consent.*

*In China,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exist in form but not in substance. Citizens cannot freely select legislators, openly deliberate policy, or us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remove leaders. Power circulates internally within the ruling structure and answers upward, not outward to voters. The public remains an object of administration rather than a political subject. Laws and policies can reshape entire industries or social groups without direct democratic mandate.*

*By contrast, a functioning parliament rests on three essential questions: who authorized you to govern; why should you continue to govern; and who can remove you if you fail? Without elec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these questions lack institutional answers. The exile parliament demonstrates that even under adverse conditions, communities can preserve political dignity through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democracy is not a reward granted by the state, but a right claimed by the people. Stability achieved through silence creates institutional emptiness. Concentrated power may produce surface order, but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political legitimacy erodes. For China to become a moder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e path lies not in strengthening control, but in establishing genuine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that derive authority from citizens. The experience of Tibetan exiles underscores that political dignity persists wherever people insist on particip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她，只有五个月

作者：张宇

编辑：周志刚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她只有五个月。五个月，尚未学会翻身、尚未看清这个世界、尚未拥有任何表达“同意”或“拒绝”的能力，却已经完整地经历了这个国家最冷酷、最成熟、也最熟练的一整套权力运作流程：被交付给“权威系统”，在密不透风的专业语言中失去生命，随后被迅速定义、归档、降温、消音。

她叫小洛熙。在官方叙述中，她的死亡是一次“医疗过程中的不幸结果”；在体制语言里，她只是一个“个案”；在舆情管理的视角下，她的名字甚至不该被反复提及。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不需要被“定性”；她需要被追问。

当一个孩子在手术台上离世，我们本应首先问的是：发生了什么？责任在哪里？谁该为此负责？医疗系统是否存在缺陷？

可在中国，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被系统性地规避了。不是因为答案太复杂，而是因为答案本身会威胁到体制的安全感。

在中共统治下，婴儿的死亡从来不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公共讨论，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尽快结束事件”的内部协调。真相不是优先项，问责不是必选项，安抚、压制、定调才是。

小洛熙不是第一个在这样的逻辑中死去的孩子。她的名字之所以再次被提起，不是因为她“特殊”，而是因为她过于典型。典型到让人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次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熟练、运转顺畅、早已习惯的体制结果。

当一个政权连婴儿的死亡都无法坦然面对，连最低限度的公开、独立、可质询的调查都无法提供，却仍然反复高喊“人民之上”“生命之上”，那么问题就不再是“这家医院做错了什么”，而是——这样的体制，是否还具备对生命的基本尊重？

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一名五个月大的婴儿在手术后死亡，都应当自动触发一套清晰、独立、可被公众监督的程序：完整病历公开、手术决策逻辑说明、风险评估复盘、责任人明确、调查过程透明。但在中国，小洛熙的死亡并没有开启“追问”，而是迅速进入了另一套更熟悉的流程——控场、定调、降温、切割责任。我们看到的不是“解释发生了什么”，而是“告诉你可以知道什么”。



### 1. 医疗叙事的第一步：用“专业壁垒”隔绝公众

在事件最初阶段，围绕手术必要性、风险评估、手术中应急处理、手术后监护等关键问题，公众并没有得到清晰问答。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高度技术化、无法被普通人核验的“专业表述”。这些语言并非为了澄清事实，而是为了制造距离——把质疑者挡在“你不专业、你不懂医学”的门外。在中共统治下，专业从来不只是知识体系，它是一种权力工具：当权者用它来决定谁有资格提问，谁必须闭嘴。但问题在于：医学的复杂性，从来不是拒绝透明的理由。恰恰相反，越是高风险决策，越需要清晰、可追溯的解释。

### 2. 医疗事故如何被“去事故化”

紧接着出现的，是一种中国社会高度熟练的操作：将“可质询的医疗事故”，重新包装为“不可避免的医疗风险”。在这个叙事中——没有错误，只有遗憾；没有责任，只有不幸；没有制度问题，只有“个体差异”。这种话术的真正功能，是提前终止讨论。因为一旦被定义为“风险”，追责就会被视为“不理性”；追问就会被扣上“医闹”的帽子。这不是医学逻辑，这是政治逻辑。

### 3. 谁决定调查？——体制最关键、也是最荒谬的一环

在中共体制下，调查医疗事故的，往往正是事故所在体系本身。医院隶属于行政系统，调查由行政系统主导，结论再由行政系统发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调查，而是内部协调；不是问责，而是风险管理。在这样的结构中，“真相”永远服从于“稳定”，“责任”永远让位于“形象”。当一个婴儿的死亡，必须首先考虑对系统的影响，而不是对生命的交代，结果其实早已写好。

### 4. 舆论不是被回应，而是被管理

公众的愤怒、疑问与不安，并未得到正面回应，而是迅速进入舆情控制轨道：信息碎片化、讨论被限

流、声音被标签化。这是中共治理体系中极其成熟的一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于是小洛熙的死逐渐被处理成：“已经调查过了”、“正在依法处理”、“不要传播不实信息”。可问题是：当所有关键细节都不公开，当调查过程不可旁观，当结论无法质询，所谓“依法处理”，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事情之一，就是反复高举道德口号。“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人为本”——这些词在官方文件、新闻通稿和政治宣传中被不断重复，被塑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但问题是：当一个政权连一名五个月大婴儿的死亡都无法坦然面对时，这些口号还有任何意义吗？

在中共语境中，人民并不是一个拥有具体权利的主体，而是一个被抽象，被代表，被使用的概念。当人民“听话”“配合”“不制造麻烦”时，他们被称为“人民”；当人民提出质疑、要求解释、要求问责时，他们立刻被区分为：“个别人”“情绪化群体”“被煽动者”。这正是中共“人民至上”的真实含义——人民只存在于不提要求的时候。

在中国，生命真的至上吗？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一个婴儿的死亡就应当触发最高级别的透明与追责；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真相就不应当被延迟、筛选、降级发布；

如果生命真的至上，那么公众的知情权就不应被视为风险。

真正至上的，从来就不是生命，而是“可控性”。

中共可以继续文件中书写“生命至上”，可以继续新闻里反复强调“高度重视”，可以继续要求社会“理解”“理性”。但只要它拒绝建立真正独立的调查机制，拒绝让权力接受公众质询，拒绝承认制度本身的责任，那么这些话语就只能暴露出一个事实：它需要口号，正是因为它无法承担后果。

一个连婴儿死亡都无法面对的政权，谈“人民至上”，不是虚伪，而是对生命的再次侮辱。

小洛熙不是被“命运”带走的。她是被一个拒绝被追问、拒绝被监督、拒绝为弱者让出空间的体制吞没的。

而这个体制，正是中国共产党。

今天如果我们允许她的死亡被降级为“个案”，明天被降级的，就会是更多无法发声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接受“已经处理”的说法，明天“处理”的，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中共治理逻辑反复证明过的现实。在这样的体制下，顺从换不来安全，沉默换不来保障，遗忘只会换来重复。

所以，记住小洛熙，不是为了悲伤，而是为了拒绝。拒绝把婴儿的死亡当作治理成本；拒绝让“稳定”压倒生命；拒绝接受一个连最弱者都无法保护的政权，却要求人民感恩。她不是一个结尾，她是一份指控。这不是一篇悼文，这是一次拒绝。

## *She Was Only Five Months Old*

*This essay centers on the death of a five month old infant, Xiao Luoxi, who died after undergoing a surgical procedure, and uses the case to examine systemic accountability, institutional transparenc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any society committed to the protection of life, the death of an infant in a medical setting should automatically trigger a clear, independent, and publicly reviewable process. Such a process would include full disclosure of medical records, transparent explanation of surgical necessity and risk assessment, clarification of intraoperative decisions,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sponsible parties. Instead, the event is described as quickly entering a familiar administrative sequence focused on narrative control, reputational management, and containment of public reaction.*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highly technical medical language can operate as a protective barrier that distances ordinary citizens from meaningful scrutiny. Rather than facilitating understanding,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may be used to assert authority and limit who is considered qualified to question official accounts. The text further criticizes the re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medical error as unavoidable medical risk, arguing that such framing narrows the space for accountability by shifting discussion from responsibility to misfortune. In this narrative, there are regrets but no mistakes, tragedy but no systemic failure.*

*A central concern raised is the lack of structural independence in investigative mechanisms. When institutions oversee inquiries into their own action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outcomes tend to prioritize s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image over transparent truth seeking. Public reaction is not addressed through open dialogue, but managed through selective disclosure, procedural statements,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The essay questions whether slogans emphasizing the primacy of life and the people retain meaning if genuine oversight and public questioning are absent.*

*Ultimately, the piece frames the infant's death not as an isolated case, but as a reflection of deeper governance patterns. Remembering Xiao Luoxi becomes, in the author's view, not only an act of mourning but a demand for structural reform, independent review, and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to protect the most vulnerable members of socie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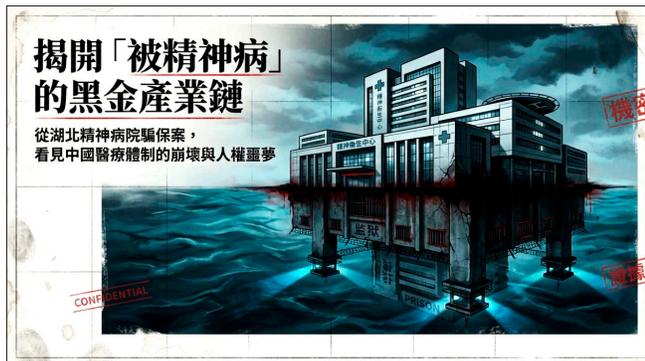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被制度“诊断”的人

——从湖北精神病院骗保案，看一个拒绝透明的治理逻辑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近年来，中国社会频繁出现一些令人不安却高度相似的场景：未成年人在校园中“非正常死亡”，调查迅速定性；普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却难如登天；家属提出质疑，随即被纳入“维稳”对象；信息被封锁，讨论被压制，结论被提前写好。这些经历并非彼此孤立的“个案”，而是高度集权体制在现实运行中，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

新京报近期披露的湖北多家精神病医院骗保调查，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一个极端却典型的缩影。据新京报调查报道，湖北襄阳、宜昌多家精神病医院，以“免费住院、医药费和生活费全免”为诱饵，违规收治大量并无明显精神障碍的人员，涉嫌通过虚构诊疗项目、伪造病历，系统性套取医保资金。

2025年12月，记者以护工身份卧底进入襄阳宏安精神病医院、宜昌夷陵康宁精神病医院，发现住院者中不仅包括戒酒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甚至连护工、保安本人，也被办理成“精神病人”住院手续，只为配合医院完成医保报销流程。医生直言，只要“能走医保”，病历是可以“写”的。在这些医院中，将正常人“写成精神病”并非偶发失误，而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操作方式。记者查询收费系统发现，大量账目中反复出现“心理治疗”“行为矫正”等收费项目，但无论是记者本人还是其他病人，均未见相关治疗实际开展。仅这些虚构项目，日均费用约130元。一名护工私下透露：“一个病人一年能套六万，一百个就是六百万。”

为了规避监管，有医院在检查前安排病人“假出院”，检查结束后再重新收治，形成事实上的长期滞留。住院

人数越多、住院时间越长，医院获取的医保资金就越多，而病人则被彻底物化为维持医院运转的“指标”。多名病人反映，入院极其容易，出院却几乎不可能。即便病情好转，甚至本就不存在精神疾病，也常被以各种理由强行留院。记者卧底期间，多次目睹医护人员对病人实施暴力：扇耳光、脚踹、用水管抽打，甚至将病人捆绑在床上，最长达三天三夜。有病人形容，“住院就像坐牢”，有人因长期无法出院而陷入绝望，甚至发生自杀行为。

这些医院多位于偏远地区，运营成本低、扩张速度快，通过下乡拉人、介绍提成等方式争抢“病源”。在医保结算机制与监管缺位的双重作用下，一套以剥夺人身自由、践踏人格尊严为代价的牟利模式，得以长期存在。必须指出的是，湖北精神病医院骗保与非法收治现象，并不能被简单归因为“地方乱象”。其真正的危险性，在于它暴露的并非个别道德沦丧，而是一整套制度性激励失衡所催生的必然结果。

在现行医保体系中，精神病院具有特殊优势：诊断标准高度依赖专业判断，外部难以复核；住院周期缺乏明确上限；病人往往被视为“无完全行为能力者”，其拒绝权与申诉权在现实操作中极易被忽视。一旦监管缺位，医疗机构便天然拥有“低风险、高回报”的操作空间。同时，医保支付机制对“住院人数”和“住院时长”形成客观激励。在缺乏独立审计与透明问责的情况下，这种激励并不会自动导向更好的医疗服务，反而容易异化为对“病人数量”的追逐。湖北曝光的“虚构诊疗”“假出院”“长期滞留”，正是这一逻辑的直接产物。更值得警惕的是，被违规收治者往往是最缺乏反抗能力的人群：老年人、残障人士、戒酒者、社会边缘人。一旦被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其个人陈述与社会信用便迅速贬值，侵害人身自由反而披上了“医学”“照护”“稳定”的外衣。

从校园中被迅速定性的未成年人死亡，到精神病院中被随意书写的“精神异常”，这些事件看似不同，实则遵循着同一治理逻辑：当一个人的存在被视为“风险”，而不是权利主体，他就会被制度性地处理掉。在这一逻辑下，死亡不再首先被追问真相，而被纳入舆情管控；诊断不再是医学问题，而成为控制工具；家属的合理质疑被重新定义为“不稳定因素”。当“维稳”凌驾于真相之

上，当“效率”高于人的尊严，制度本身便开始系统性地制造受害者。

湖北多家精神病医院骗保事件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不只是暴力与贪婪，而是它揭示了一个现实：在一个缺乏独立监督的体制中，最弱势的人，最容易被合法地伤害。当正常人可以被写成精神病，当孩子的死亡可以不经独立调查便被迅速结案，当公共制度不再服务于人的安全，而是服务于权力的便利，那么任何人，都无法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处理对象”。问题从来不在某一家医院、某一个地方、某一次事件，而在于一个拒绝透明、排斥问责、惩罚追问的治理体系。只要一结构不被改变，类似的悲剧就不会停止，只会不断更换场景、对象与说辞。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需要靠封锁信息来维持秩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不需要通过剥夺人的尊严来证明稳定。真正的安全，来自真相被允许出现，来自权力被置于监督之下，来自每一个生命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 People Diagnosed by the System: Governance Without Transparency

This essay examines a reported medical insurance fraud scheme involving several psychiatric hospitals in Hubei province and uses the case to critique broader governance patterns related to transparency, oversight, and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certain hospitals allegedly admitted individuals without clear psychiatric conditions, fabricated treatment records, and claimed reimbursement for services not actually provided. Patients reportedly included elderly individuals, alcohol dependent persons, and even staff members registered as inpatients to facilitate insurance claims. The article portrays these practices not as isolated misconduct, but as symptoms of systemic weakness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psychiatric institutions occupy a structurally sensitive position within the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Diagnostic authority is highly specialized and difficult for outsiders to review. Hospitalization periods may lack clear upper limits, and patients labeled as mentally ill often face diminished credibility when challenging confinement. In the absence of independent auditing and transparent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reimbursement models that reward longer stays and higher patient counts can create distorted incentives. Under such conditions, financial motivation may override patient welfare.

The essay further connects this case to a broader pattern in which individuals perceived as socially marginal or administratively inconvenient face limited recourse. It contends that when investigative processes lack independence and public scrutiny, institutional stability can take precedence over truth seeking.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narrative management may replace open inquir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e elderly and socially isolated, may bear disproportionate risk.

The central concern is not only fraud or abuse, but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at prioritize control and efficiency over rights and digni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lasting public trust requires transparent investigation, independent oversight,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that protect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 reputation. A stable society, it argues, depends on allowing truth to surface and ensuring that power remains subject to meaningful supervis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当一个孩子的死亡让人们走到法院门前

——从“小洛熙案”看中国社会底线的破裂与觉醒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小洛熙开庭当天，宁波的冬天并不喧闹，却显得异常沉重。法院门前，没有统一组织的横幅，没有正式的动员口号，却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普通人：打工者、宝妈、老人、年轻人。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却在同一时间站在同一个地点，只为了一个五个月大的孩子。

这是一个必须被认真对待的事实：小洛熙开庭声援不是谣言，不是“境外势力”，也不是少数激进者的行为，而是一次真实发生的、广泛的、自发的民众集结。在一个长期被塑造成“稳定”“理性”“不关心公共事务”的社会里，这样的场景本身，就已经说明了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被灌输一种叙事：普通人只要“好好过日子”，不碰政治、不惹麻烦，就可以换来基本的安全与安宁。公共事务被描述成“与你无关”，不公被解释为“个案”“偶然”，而一切抗争都被贴上“闹事”“不理性”的标签。

但小洛熙案之所以刺破这种叙事，是因为它触碰的不是某个抽象概念，而是最原始、最不可退让的人性底线。一个婴儿。一个无法说话、无法维权、无法自救的生命。一个本应在医学与制度保护下被全力呵护的对象。当这样一个生命在高度专业化、制度化的医疗体系中迅速消失，而家属却被推诿、被冷处理、被质疑动机、被消耗时间时，人们突然意识到：如果连孩子都无法被保护，那么所谓的“安全”，究竟还剩下什么？

声援小洛熙的人，并不一定都懂医学，也未必掌握完整的案件细节。他们来到法院门前，并非因为每一个人都能给出严谨的法律判断，而是因为他们都读懂了一种危险的信号：制度正在用冷漠、程序与权力优势，把个体的生命价值不断压缩。

当家属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医疗机构内部调查、鉴定结论迟迟不出、信息披露高度不对称、维权成本被无限拉长，那么，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医疗纠纷，而是一场制度与个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实验。

而人们的到场，恰恰说明了一个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事不关己”的安全感是虚假的。当制度习惯性站在强者一边，任何人都可能在下一刻成为“个案”。

在中国，真正罕见的从来不是悲剧，而是被看见的悲剧。多年来，从矿难、疫苗事件、校车事故，到铁链女、唐山事件，人们一次次被迫目睹制度失灵的后果，却又一次次被要求“向前看”“不要情绪化”。久而久之，愤怒被压抑，表达被自我审查，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危

险的状态：悲剧被接受为常态，底线被不断下调。

但小洛熙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发生在一个人们“以为最安全”的领域——医疗。它涉及一个“最不该被牺牲”的群体——婴儿。它发生在一个“无法用道德污名化”的家庭身上。于是，许多曾经选择沉默的人，第一次发现自己无法继续退让。有人说，到场声援的人是在“被情绪裹挟”。但恰恰相反，真正危险的不是情绪，而是长期被压制到麻木的情绪。一个社会如果对儿童的死亡无动于衷，对制度性冷漠习以为常，对家属的绝望视而不见，那才是彻底失去自我修复能力的征兆。

声援者的出现，说明还有人拒绝接受这种麻木。他们或许无法改变判决，但他们至少在表达一个清晰的态度：生命不能被轻易对待，权力不能免于质疑。这不是政治动员，而是道德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声援并未出现激进对抗，也没有暴力冲突。人们只是站着、看着、等待着，用身体在公共空间中表达关注。这种克制，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社会并非“无法理性表达”，而是长期缺乏被允许的表达空间。

当一个社会把所有公共议题都压缩进“内部处理”，把所有质疑都归类为“别有用心”，那么任何一次合法、和平的聚集都会显得“异常”。但异常的不是人们的出现，而是一个需要靠恐惧维持秩序的环境。小洛熙案不会是最后一起这样的案件。真正的问题是：当下一次悲剧发生时，人们是继续选择沉默，还是继续走出来？

觉醒并不意味着立刻改变制度，它首先意味着拒绝谎言，拒绝遗忘，拒绝被迫接受不公为“正常”。觉醒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权利不是被赐予的，而是通过持续的关注与坚持，被一点点争取的。在法院门前的那些普通人中，没有英雄，也没有领袖。他们只是明白了一件事：如果今天不为一个孩子站出来，明天就可能无人为自己站出来。一个社会的底线，从来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而是体现在人们是否还愿意为他人的不公感到不安。小洛熙案让人痛苦，但它也让人看见了一线微弱却真实的光——那是良知尚未熄灭的证明。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悲剧当作“别人的事”，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到现实中表达关切，中国社会或许仍然艰难，但至少，它还没有完全沉沦。而这，正是觉醒的开始。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台湾的未来只属于台湾人民

作者：马群  
编辑：程伟 翻译：彭小梅

近年来，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军事演训不断升级，“武力统一”的言论时常出现，战争不再只是政治讨论中的抽象概念，而逐渐成为现实社会中的焦虑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台湾的未来，究竟应该由谁决定？我的答案很简单——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

这不仅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问题。人民自决，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一个社会的制度、前途与政治安排，应当建立在当地民众的意愿之上，而不是通过军事威胁或强制手段加以改变。事实上，台湾已经形成了完整而稳定的社会体系。它拥有成熟的民主制度、独立的选举机制、活跃的公民社会与开放的公共空间。2300万台湾民众，通过自己的选择，塑造了今天的台湾。这一现实，无论政治立场如何，都不应被忽视。更重要的是，现实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军事压力不会拉近两岸距离，反而会加深彼此的疏离。军机绕台、导弹威胁与战争言论，并没有削弱台湾社会的本土认同，反而强化了其安全焦虑与身份意识。换句话说，武力威胁的结果，并不是“统一更近”，而是心理距离更远。

从现实角度看，战争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危险且不可控的选择。现代战争不仅意味着军事对抗，更意味着经济制裁、供应链中断、社会震荡与地区安全格局的剧烈变化。在全球高度互联的今天，一场台海冲突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任何政治目标所能承受的范围。而在军事体系仍处于持续整顿与调整的背景下，任何高强度冲突的风险都将被进一步放大。战争从来不是政治姿态，而是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承受能力与战略判断的极限考验。

然而，比地缘政治与战略分析更让我触动的，是一次非常普通的个人经历。前不久，在教会里，我与一位来自台湾的阿姨谈起台海局势。她关心的，并不是政治立场，也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远在台湾的家人是否安全。她反复的说：“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的兄弟姐妹怎么办？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那一刻我意识到，“武统”这两个字，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个家庭的恐惧与不安。聊到后来，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久久难以忘记：“中国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还一定要我们台湾？我们的台湾，远没有你们福建大。”这句话里没有愤怒，只有不解与无奈。她并不想对抗谁，她只是希望家人能够平安

生活，希望自己的家园不要成为战争的前线，不要成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在谈话中，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人，当面对她的担忧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觉自己就是强盗，去窃取人家的一切。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对不起这些无辜的台湾家庭，对不起那些只是想过平静生活的普通人民。

政治可以有分歧，历史可以有争议，但普通人的安全与尊严，不应该成为任何宏大叙事中的代价。任何政治目标，如果是为了让普通民众长期生活在战争阴影之下为代价，在道义上都是难以成立的。

台海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威胁与对抗，而只能来自尊重与克制。真正持久的关系，不可能建立在强制之上，而必须建立在自愿与信任之上。支持台湾的自主与安全，并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判断：和平的前提，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或许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成为共识——没有任何政治目标，值得用普通人的生命与恐惧去交换。

如果有一天，台湾的普通家庭不再为战争而担忧，如果台海的未来不再建立在威胁与军演之上，那才是真正的和平开始。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人民自主选择，由台湾人民自主决定，由台湾人民自主守护。任何试图剥夺他们选择权的行为，都是对正义与自由的挑战。真正的尊重，不是口头承诺，而是让人民掌握自己家园的命运。台湾是台湾人民的台湾，我支持台湾人民自主自决！



## 二十年刑期：一场针对新闻自由的政治处决

作者：张宇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二十年监禁。

当这个判决被宣读时，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司法数字，而是一种政治宣言：一个政权向所有仍试图坚持真相、捍卫新闻自由的人发出的公开警告。

黎智英，七十多岁的媒体人，《苹果日报》的创办者，没有暴力行为、没有武装组织、没有秘密行动，却被以“国安”之名判处二十年徒刑。这不是法律对犯罪的裁决，而是权力对异议者的惩罚；不是司法的终点，而是恐惧统治的展示。

在任何正常法制社会中，新闻报道、政治评论、公开表达立场，都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这些行为却被重新定义为“威胁国家安全”。这一逻辑本身已经揭示了真相：真正感到不安全的，从来不是国家，而是政权本身。

这二十年刑期，表面上是判给黎智英，实际上却是判给整个社会——判给记者、学者、出版人、企业家，判给所有仍然相信言论自由不是恩赐而是权利的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伸张正义”，而是在于制造寒意：让每一个人明白，说真话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可以大到摧毁一生。

中国共产党一再宣称“依法治港”、“审判独立”，但黎智英案恰恰揭示了这种宣称的虚伪性。当法律被用来服务政治目标，当罪名可以被无限延展，当审判程序被系统性地去监督化，“法律”便不再是保护公民的工具，而是压制公民的武器。

二十年监禁，对一位高龄老人而言，几乎等同于终身监禁，这不是偶然的严苛，而是精心计算的震慑。中共需要一个足够重的判决，来证明它对新闻自由的零容忍；需要一个足够残酷的结局，来告诉世界和香港社会：在这个体制下，真相不被允许长期存在。

因此，黎智英案不应被理解为一一起“个案”，而应被视为一个制度样本：一个展示极权如何通过法律外壳消灭异议、通过司法程序包装政治迫害的完整示范。

讨论这二十年，不只是为了一个人的公正，更是为了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新闻被判刑，一个社会还剩下什么？

在讨论任何刑罚之前，一个最基本、却被刻意回避的问题必须先被摆上台面：黎智英究竟犯了什么罪？

如果剥离政治语言、剥离“国安”这一高度模糊的标签，剩下的事实其实异常清楚：黎智英是一名媒体人，



是《苹果日报》的创办者，是一个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坚持新闻自由、拒绝自我审查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发生在公开空间，都可以被社会检视，都不涉及任何暴力、武装或秘密行动。

他没有组织武装力量，没有煽动暴力冲突，没有从事间谍行为，更没有对任何的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相反，他所做的，是发表社论、接受采访、与国际社会沟通香港局势，持续通过媒体报道批评当权者。这些行为，在任何民主社会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行为；而在中共统治逻辑下，却被重新包装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

这正是黎智英案最荒谬、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谓罪行，并不是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是行为的立场属性。

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政治语境中，“罪”不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只要你的言论挑战权利、你的报道不受控制、你的影响力无法被收编，那么即便你只是写字、说话、办报，也可以被无限上纲，最终被定义为国家敌人。

《苹果日报》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极权逻辑的挑战。

它拒绝使用官方语言，拒绝重复统一口径，拒绝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宣传口号。在一个依赖信息垄断维持统治的政权眼中，这种媒体不是“不同声音”，而是“系统性威胁”。

因此，黎智英案并不是司法系统发现犯罪、依法惩处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先认定立场、再寻找罪名的过程。所谓“串谋”“勾结”“煽动”，都是在结果确定之后才被拼凑出来的法律叙事，用以赋予迫害一个看似合法的外壳。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逻辑一旦被接受，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再安全。如果写文章是罪，如果接受采访是罪，如果与外界交流是罪，如果坚持新闻伦理是罪，那么“罪”本身就失去了边界。

这正是国安法最核心、也最致命的特征——它不是针对具体行为，而是针对思想和立场；不是惩罚已经发生的危害，而是预防任何可能出现的不服从。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中，清白不再由事实决定，而是由权力裁定。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黎智英案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宗普通案件，而是一场示范性审判。它的目标从来不只是惩罚一个人，而是通过这个人，重新校准整个社会的恐惧刻度。

在极权体制中，刑罚的意义并不在于与行为“成比例”，而在于是否足够震慑。二十年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它向所有人清晰传达一个信息：只要你触碰新闻自由、挑战官方叙事，无论你是谁、年纪多大、是否非暴力，代价都可以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一定要判得这么重？因为轻判是危险的。

如果黎智英只是被象征性地定罪、短期服刑，社会就可能产生错觉：也许坚持原则仍有空间，也许对抗权力尚存退路。对一个依赖全面服从维系统治的政权来说，这种错觉本身就是威胁。

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足够痛”的结局：

痛到让媒体人学会自我审查，

痛到让企业家远离公共议题，

痛到让年轻人意识到理想的代价，

痛到让整个社会重新理解“边界在哪里”。

二十年的刑期，正是这种政治心理的产物。它不是为了纠正所谓的“错误”，而是为了重塑行为模式。它要做的不是说服你，而是让你害怕。

更残酷得是，这种重判并不需要真实的犯罪事实作为支撑。国安法的设计本身为这种操作提供了便利：罪名模糊、解释权集中、程序去监督化，使得量刑不再受制于常规法治逻辑，而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

这正是中共统治最核心、也是最冷酷的地方：它不需要你相信它是正义的，它只需要你相信反抗是徒劳的。

而当一个政权必须依靠如此沉重的刑罚来维持秩序时，本身就暴露了它的虚弱。真正自信的制度，不需要

用二十年监禁来对付一名记者；只有害怕真相，害怕记忆、害怕被记录的政权，才会如此用力。

黎智英被重判，并不是因为他“危险”，而是因为整个体制知道，它经不起真相的长期存在。

新闻自由的核心，并不只是报道事实，而是承认一个前提——权力并非天然正确，叙事并非只有一个版本，政府的行为可以、也应该被持续质疑与监督。而这一前提，正好触及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根基。

中共的权力来源，从来不是公开竞争或自由授权，而是对历史叙事与现实信息的长期垄断。它需要一个被精心管理的世界：哪些事情可以被记住，哪些话可以说出口，哪些问题可以被讨论，哪些答案只能由官方给出。

在这样的体系中，新闻并不是公共服务，而被视为潜在威胁；记者不是监督者，而被视为“风险因素”；独立媒体不是社会资产，而被视为“敌对力量”。

《苹果日报》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一控制逻辑。它不接受官方口径作为最终答案，不把“稳定”置于真相之上，不把“正确立场”当作报道前提。它以通俗、直接、情绪鲜明的方式，让权力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而这正是极权最无法容忍的事情。

对共产党而言，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某一篇报道，而是一种不可控的信息机制。

只要这种机制存在，权力就无法完全掌控社会情绪；

只要有人持续记录，历史就无法被随意改写；

只要真相被不断传播，恐惧就无法稳定地生效。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击从来不是“管理”，而是彻底清算。因为自由不是可以被调节的变量，而是必须被清除的风险。

黎智英之所以格外“危险”，还在于他的角色重叠性。他既是媒体人，又是企业家；既拥有本地影响力，又与国际社会保持公开联系；既表达价值立场，又拒绝躲进“技术性中立”的安全区。这种公开、持续、可被看见的坚持，让他无法被边缘化、无法被悄然消失。

因此，他必须被高调审判、被长期关押、被塑造成“反面教材”。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而是因为他让太多人看见了权力不愿被看见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苹果日报》的关闭并不是新闻行业的商业失败，而是一场政治清洗；黎智英的判刑也不是司法裁量，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情场。中共要的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媒体环境”，而是一个不再提出问题的社会。

当一个政权需要通过摧毁新闻自由来维持自身稳定时，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一个真正自信的制度，不需要害怕记者；一个真正稳固的政府，不需要监禁写字的人；只有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权力，才会对真相如此敏感、如此暴力。

黎智英不能沉默，因为沉默本身就是对自由的背叛。

对一个极权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抗议的人群，而是敢于记录、敢于报道、敢于让真相被看到的人。新闻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社会认知的神经系统；一旦失去它，权力就可以随意塑造现实、篡改历史、定义“真相”。

沉默意味着妥协，是在默许权力将事实和记忆据为己有。在黎智英看来，沉默就等于承认：政府有权定义社会的边界，有权决定哪些声音可以存在，有权选择让真相消失。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他的职业、他的信念、他一生追求的正义，都建立在真相可以被揭示、权力可以被监督的前提之上。

中共害怕黎智英发声，因为他能够启发人们的独立思考。他的文字和报道像火种一样，把思考和质疑传递给社会每一个角落。正是这种力量，让一个政权必须高调惩罚、必须长期关押、必须制造恐惧——否则它的权威就无法保持绝对。

黎智英不能沉默，也是因为历史在呼唤责任。每一个独立媒体人、每一个敢于质疑的公民，都是社会记忆的守护者。沉默会让历史空白，事实被消灭，真相被篡改。中共深知这一点，所以必须用二十年的监禁来封口黎智英，试图让未来所有人明白：挑战权威，将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黎智英不能沉默，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个人命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标杆。二十年的刑期，无法关押他的信念；封锁庭审，无法掩盖他的坚持；法律可以剥夺自由，却无法囚禁真相。

黎智英不能沉默，因为沉默是权力想要的结果，而坚持发声，才是他对历史、对社会、对自由的忠诚。

黎智英被判刑二十年，不只是判给他一个人，而是判给整个香港，甚至是全世界关注新闻自由的人。这个判决试图用长久的监禁来制造恐惧，用法律程序的外壳来掩盖政治迫害，用时间的消耗来消灭意志。然而，无论多么沉重的牢门、多么漫长的刑期，都无法掩盖真相，也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种。

中国共产党害怕的不仅是黎智英个人的声音，而是真相本身的存在。它害怕媒体能够记录历史、曝光权力、激发质疑；它害怕任何人意识到，所谓“稳定”与“繁荣”，不过是建立在恐惧与操控之上的表象。它用法庭、法条、判决、监禁，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变成“罪人”，以示所有敢于发声者的下场。可它忘了，精神的自由是监禁无法触及的。

黎智英的坚持，昭示了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不可替代价值。他拒绝沉默，不为个人荣耀，而是为了让社会记住：权力可以掩盖事实，但无法消灭渴望真相的人；法律可以包装迫害，但无法粉碎正义的精神。二十

年的刑期，对他而言是身体的囚禁，但对真相而言，却是光明的延续。他成为象征——象征那些不向暴力、恐惧、权力屈服的人；象征新闻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力量；象征任何时代，勇敢发声的人永远不会被遗忘。

香港的自由正在被剥夺，言论空间正在被封锁，制度性的迫害正在系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希望的终结。每一份报道、每一个勇敢发声的人，都是在续写黎智英所代表的时代革命。权力可以压制声音，但无法消灭记忆与信念；统治可以延长恐惧，但无法抹去历史的真相。正如黎智英所证明的那样，真正的力量来自坚持原则的人，来自不被恐惧支配的精神。

中共可以用监狱、审判、二十年的刑期来震慑社会，但它永远无法剥夺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也无法阻止历史记忆对未来的指引。黎智英的坚持提醒我们：自由不是恩赐，它是必须捍卫的权利；新闻不是罪，它是社会的血脉；沉默不是安全，它是专制希望你接受的陷阱。

二十年，是对一个人的刑期，却也是对权力自信的警醒。正义迟早会被记住，真相终将被揭示。即便监狱将黎智英的身体关押，他的精神、他的信念、他捍卫新闻自由的火焰，仍将在社会中传递、燃烧、照亮那些不愿屈从、不愿沉默的人。

黎智英不能被消灭，香港的记忆不能被篡改，自由的火种不能熄灭。二十年的判决，是极权对勇气的惩罚，但也是历史对正义的记录。无论权力如何压迫，荣光必将归香港，真相必将抵达未来。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孩子为何死去？器官从何而来？

——谁在制造这场滔天罪行

作者：关永杰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翻译：周敏

最近在中国大陆有一则新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1月8日，河南驻马店新蔡县清华园中学，13岁少年被发现死亡后，家属在遗体左胸口发现疑似针孔的圆形伤痕。位置精准、形态异常，既不像外伤，也不像常规抢救痕迹。更反常的是，家属尚未被第一时间通知，法医却迅速到场；确认死亡后，被拉走的不是殡仪车辆，而是救护车。

某些细节，出现了基本常识下的逻辑冲突。如果只是普通的校园意外，为什么流程完全倒置？如果只是正常的突发疾病死亡，为什么要迅速转移遗体？如果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什么要强压舆情封锁消息？官方通报无法解释这些疑点，而民间的质疑，却形成了严密的逻辑闭环。

这事件被广泛关注后，激发起网友再次对相关话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脑死亡”时有报道，“失踪人口”在增多，而“器官移植”配型与手术却异常高效。

近些年，中国社会出现一系列令人难以理解的并行现象：青少年“意外脑死亡”事件频繁出现，多发生在校园、集体管理场所；即使是全国密布高清摄像头，但妇女与儿童的寻人信息在网络上反复出现，不但没有盼来官方的回应，而已经运营了25年的“中国寻亲网”于2025年7月15日却被关闭了服务器；多家医院公开展示器官移植成果：配型排期时间之短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手术数量密集，多器官同时移植成为某些医院的“技术亮点”；另一则国际级新闻是2017年《柳叶刀》(The Lancet)撤回中国肝脏移植专家王海波（及其团队，包括郑树森院士）论文的重大医疗学术事件，撤稿原因是学术界质疑该论文涉及的564例器官移植来源不明，尽管作者声称器官全部来自公民自愿捐献，但国际医学界（包括伦理组织）认为其数据在时间跨度上与中国官方公布的捐献数据不符，作者无法提供有效的伦理证明。

令人不禁发问，这么多的器官从何而来？按照正常医学伦理，器官移植高度依赖自愿捐献，合法登记并严格管控流程。可现实中，中国却长期存在一个无法被解释的矛盾——捐献数据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移植规模。

器官匹配、买卖、移植这一整个流程，海陆空联动高效运送、医术高超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些只是基本要求，肯花钱应该也能做到。最难完成的是：至少要有大规模目标对象的人体生物数据，才能快速与需求者配型；监狱里的犯人、学校里的学生、社会上的器官捐献



志愿者，什么样的组织掌握这些人的数据？什么样的组织才有这雄厚的软硬件实力？在人口失踪或离奇死亡事件发生并引起舆情的時候，什么样的组织才能在短时间内管控媒体、封口禁声、平息事态？

答案只有一个：国家机器。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现实中的反差，学校饮用水收费、热水澡收费、吹空调收费、午休也收费，却能“免费体检”“统一抽血”“集中建档”。

当今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句流传语——“孩子长不大，老人不会死。”

这并不是调侃讽刺，而是一种极度恐怖的现实隐喻：孩子在最健康的年纪消失，而权贵阶层却能不断“延寿”，活到150岁已经不是梦。

多年来，关于“活摘器官”的指控被贴上“谣言”“阴谋论”的标签。现在结合前文的叙述，并回顾一下之前相关事件被曝光后的官方通报，哪一次能够逻辑自治？

真相已经浮现，世界不应沉默。

2026年1月18日，多个组织在网上发起抗议活动，同时举行的城市包括洛杉矶、旧金山、法兰克福。旧金山湾区的抗议活动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发起，在圣何塞市政厅前举行。主题是：守护孩子生命 追问校园真相 抗议中共活摘器官

活动参与者有：李海风、张勇、张辉、蔡晓莉、邱光辉。

发言者来自不同背景，但目标一致：呼吁国际社会展开独立调查，呼吁更多幸存者站出来，呼吁世界不要再以“内政”为借口对这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这并不是孤立事件，这是国家犯罪 (State Cri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顺从神 不顺从人

——致金明日牧师

作者：赵令军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彭小梅



在当下的中国，教堂被监控、信徒被传唤、聚会被定性为“非法”早已成为一种常态。从建政初期至今，中共对基督教的压制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时期更换了手段与名目。

然而，2025年10月9日晚，广西北海，当局出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包围整栋住宅，只为抓捕一位讲道、祷告、牧养信徒的老人——金明日牧师，这个世界仍然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

一个自称强大、稳定、无所畏惧的政权，究竟在恐惧什么？

金明日牧师的被捕，并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抓捕行动。

它更像是一种公开宣示——当信仰拒绝臣服，权力就必须出手；当良知不肯低头，国家机器便被动员起来。

一个坚持无神论的独裁政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信徒宣告：没有人能帮助你们——你们的教堂不能，你们的上帝也不能。

但金明日牧师并非毫无准备。

在此之前，他已经亲眼见过多位牧师、传道者被抓、被审、被长期拘押。他曾为他们感到纠结、痛心；也正因为见过代价，他才更加清楚，这条路通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后来对来访者所说的那句话才显得格外平静，却分量极重：“以前看到别的牧师或传道者被抓，我很纠结，却无能为力；如今，我自己被抓了，反而觉得很坦然。”

从这一刻起，叙事发生了变化。

金明日牧师不再只是一个“被迫害者”，而是一位明

知后果、仍然作出选择的人。

他让我想起《使徒行传》中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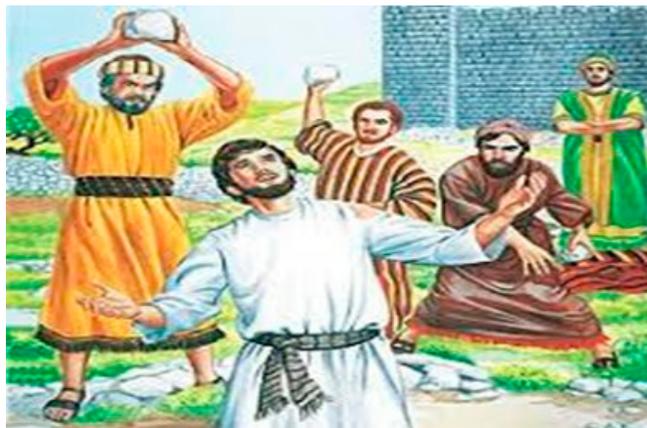
《使徒行传》5章29节写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这并非一句抽象的信仰宣言，而是在历史中一次次被具体生命所印证的选择。

在教会最初的年代，执事司提反因坚持公开见证信仰，被带到权力与宗教合谋的审判面前。面对捏造的指控与即将降临的石刑，他既没有为自己辩护，也没有以认罪换取生存。

当石头即将落下时，他没有控诉，也没有呼喊不公，而是仰望天空，平静地说了一句

“主耶稣，请你接受我的灵魂。”



那不是绝望中的哀求，而是在已经作出选择之后的交付。

正是在这一刻，死亡失去了它作为威胁的力量。

两千年后，当金明日牧师说出“我反而觉得很坦然”时，这种坦然同样不是对现实的无知，也不是对苦难的轻视，而是源自同一个根基：

当一个人已经把生命交托，权力便无法再以恐惧相要挟。

司提反在行刑之时，将灵魂交在主的手中；金明日牧师在被捕之时，将命运交在同样的顺从之中。

时代不同，方式各异，

但那一刻的心境，是相通的。

为了抓捕金明日牧师，当局出动了数十名警力。

不是为了制止暴力犯罪，也不是为了防范公共危险，而只是为了终止祷告、终止讲道、终止一群人按照良心聚集的权利。

事实本身，已经构成了最清楚的控诉。  
而更沉重的代价，落在了他的家人身上。



由于中共长期实施边控，金明日牧师已经超过七年未能与身在美国的家人团聚。他的家人被迫承受突如其来的分离、漫长的不确定，以及随时可能升级的打压。事实上，正如他女儿 Grace Jin 在美国国会的陈词中所披露的那样，中共对她们的恐吓已经开始。

然而，她们并未否认金牧师的选择，也没有将他的坚持视为鲁莽。

“很痛苦，但依然充满爱，我们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她们如是说。

殉道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词。

它意味着清醒地承受，意味着在孤独中站立，意味着明知将失去自由，仍不撤回信仰与良知。

司提反倒下后，教会并未消失；恰恰相反，逼迫成为信仰扩散的起点。历史一再证明：迫害从未终结信仰，反而不断替它作证。

当权力以为自己封住了口、锁住了人，却发现真理被推向了更远的地方。

正如 Grace Jin 在国会所说：即便在文革时期，仍有人在暗中坚持信仰，甚至躲在厨房里为家人唱赞美诗；那么在今天，一个政权同样无法消灭基督教。

当国际社会一次次发声，呼吁释放一位本应无罪的牧师时，真正站在历史被告席上的，早已不是他。

一个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压制信仰、用法律名义惩罚良知的政权，事实上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

政权或许可以囚禁人的身体，却无法审判一个顺从神的灵魂。

从司提反，到无数无名的信徒，再到今天的金明日牧师，殉道者从来不是失败者——他们只是提前把结局交给了时间。

而时间，终将作证。

赵令军 (Frank)，加拿大，2026年2月

### *Obey God, Not Man: A Letter to Pastor Jin Mingri*

*This essay examines the October 9, 2025 arrest of Pastor Jin Mingri in Beihai, Guangxi, situating it within the broader pattern of state control over religious life in China. The author describes how more than thirty police officers surrounded a residential building to detain an elderly pastor whose activities consisted of preaching, prayer, and pastoral care. The scale of the operation is presented as revealing a deeper tension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independent faith communities. The arrest is framed not simply as a legal action, but as a symbolic assertion that religious conviction must submit to state power.*

*Drawing on the biblical passage Acts 5:29, obey God rather than man, the essay compares Pastor Jin's calm acceptance of detention to the early Christian martyr Stephen. His statement that he felt at peace after being arrested is interpreted as conscious spiritual resolve rather than resignation. The author emphasizes that such faith based obedience removes fear as a tool of control.*

*The text also notes the emotional toll on Pastor Jin's family, including public testimony by his daughter abroad, while underscoring their continued affirmation of faith. Historically, the essay argues, persecution has not eliminated belief but strengthened it. The conclusion asserts that while a government may confine the body, it cannot command the conscience, and that moral judgment ultimately belongs to histor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办报纸的人，被判了 20 年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

作者：《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张致君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这个人一辈子做过很多事。他在中国大陆吃到一颗巧克力，就知道在另一方天地，梦都是甜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千山万水他来到香港，小时候在工厂打工，后来做生意，再后来办了一份报纸。

他没有当官，没有带兵，没有发号施令，他只是办报纸。现在，他78岁，他要在监狱里再待20年。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只要办报纸，就足够被判这么久。

我们常常以为，权力最怕的是炸弹和子弹。其实不是，权力真正害怕的，是一张报纸。因为子弹只能杀人，而报纸能让人醒来。

黎智英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被抓的。他只是做了一件在正常社会里再普通不过的事：把发生的事情写出来。

可是在中共政权下，把事情写出来，本身就成了一种罪。

媒体的工作，就是让权力不舒服。

权力天生不喜欢被看见。它喜欢黑暗，喜欢模糊，喜欢“大家都别问”。

媒体的工作恰恰相反：它要照亮，要追问，要把话说清楚。

所以媒体和权力，从来就不是朋友。它们如同一对天生的对手。一个正常社会里，媒体负责提问，政府负责回答。

但中共政府只想命令，不想解释。于是，提问的人就成了“危险人物”。

宪法和基本法写得很清楚，只是没人照着做。

中共自己的《宪法》里写着：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基本法》也写着：香港居民享有新闻和出版自由。

这些话都在。一个字都没删。但现实告诉我们：写在纸上的自由，不算数；活在空气里的恐惧，才算数。

当一个人因为办报纸被关进监狱，宪法就成了一本摆在橱窗里的书——看起来很庄严，其实没人翻。

国安法不是保护国家，是保护权力。

国安法的逻辑很简单：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像不像敌人”。不是看证据，而是看态度。

你批评了，就有问题；你沉默过，也可能有问题；你曾经站出来过，那就更有问题。

它不是在防止犯罪，而是在防止思想。它不抓坏人，它吓好人。



黎智英不是一个人，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关押的不是黎智英，而是——香港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可能性。那种记者可以问问题，报纸可以骂政府，市民可以讨论政治的可能性。

他们不允许这种可能性继续存在。于是，办报纸的人被判了20年。写评论的人被判了7年。当总编辑的人被判了10年。不肯指证别人的人被判了10年。连带着一个报纸钥匙扣的人，都可以被带走。

这不是审判罪行，这是清算记忆。

《在野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而愤怒。我们是为了一个原则：媒体存在的意义，就是监督政权。

如果媒体不能监督权力，那它就只剩下一个功能——替权力说话。

如果宪法和基本法不能保护办报纸的人，那它们连丢尽厕所擦屁股的资格都没有，卫生纸尚且柔软，而它们又臭又硬。

黎智英坐在监狱里，仅仅是因为他清醒。

一个社会最怕清醒的人。因为清醒的人会问：你凭什么？

他问了。于是他进了监狱。但问题还在。

报纸可以被关掉，人可以被关起来，可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们会留在空气里，留在记忆里，留在那些还愿意思考的人心里。

《在野党》声援黎智英，不是因为他是英雄，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不肯闭嘴的普通人。

而一个社会，如果连普通人都不能说话，那它也就不再配谈“国家安全”了。

它真正安全的，只有权力。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盛世下的谢幕

——中国农村老人“自杀潮”背后的体制真相

作者：周敏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当全球目光聚焦于东方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时，在繁华的阴影深处，一场无声的生命收割正在农村上演。社会学田野调查显示，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已达到惊人的水平，部分地区甚至高出城市五倍。这并非单纯的心理疾患，而是一场由体制性排斥、经济剥削与乡土文化坍塌共同酿成的“社会性屠杀”。

## 绝命的理性：当死亡成为最后一次“奉献”

在《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与学者刘燕舞等人的调查中，农村老人的自杀呈现出一种平静的惨烈。在广袤的黄土地上，80岁以上老人的自杀率远超每10万人中60人的心理红线。曾经，剧毒农药“百草枯”是他们通往终点的捷径。这种药剂因极高的致死率被禁，其残忍之处在于：它会引发不可逆的肺部纤维化，让呼吸器官枯竭如干透的丝瓜络，而患者在长达数周的窒息过程中，意识始终清醒。

然而，禁药治标，却治不了绝望。当药瓶被收走，老人们转向了更原始、更决绝的方式：“软自杀”。他们在清醒状态下断食、断药、拒医。这种方式极具隐蔽性，常被计入“自然病故”，本质上是生命权的主动放弃。与年轻人的冲动不同，老人的离去是经过周密计算的，具有明确的“利他性”。他们往往避开农忙，甚至选好时间在子女打工返乡前换好寿衣，以便子女能在极短的休假期间“顺便”办完丧事后迅速返岗。这种被邻里赞许为“懂事、不拖累家人”的死亡，揭示了农村最冷酷的心理逻辑：当生命被视为家庭的“负资产”，自杀便成了他们对家庭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奉献”。

## 制度性剥夺：二元结构下的权利弃子

这场悲剧并非孤立的个体选择，而是深植于中国特有的资源错配与制度缺失。

福利分配的体制性歧视：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民长期被定位为资源的输出者，却在二次分配中沦为边缘。当城市体制内的养老金保障了晚年的尊严时，农村老人每月仅有的一两百元基础养老金，在今天通胀的物价面前近乎一种羞辱。他们劳作一生支持了工业化进程，却在丧失劳动能力后被排除在国家安全网之外。

乡土秩序的全面溃败：随着城镇化浪潮的抽割，曾经作为宗族堡垒的农村已成为了空壳。青壮年流入城



市，留守农村的不仅是老弱的身躯，更是社区互助、精神寄托与医疗监护的全面真空。在这些被形容为“废土”的村庄里，老人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更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感。

## 权力者的伪善：收走了农药，留下了绝望

这种自杀潮，本质上是“无价值者”被社会主流系统抛弃的过程。一个能将巨额预算投入基建与对外援助的体制，却无法为种粮一辈子的老农们提供一份基本的临终关怀，这本身就是一场集体自杀的共犯。

权力者通过禁止百草枯来维持“治理成绩”，却不愿在老人的碗里多加一勺温热的粥、在药盒里多放几颗救命药。这种治理是典型的伪善。如果一个盛世的延续，需要靠最弱势群体以“主动退出”的方式来维持低成本运行，那么这个盛世的根基早已从内里腐烂。

老人的药瓶里，装的不只是农药，还有对时代的绝望。这不仅是农村的谢幕，更是整个社会文明的悲哀。当一个社会不再敬畏那些曾为它奠基的生命，它所引以为傲的盛世繁华，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蜃景。

## Curtain Call in an Age of Prospe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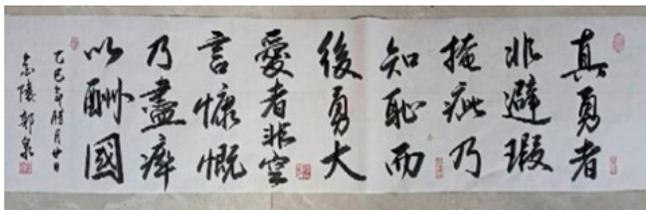
*This essay examines high suicide rates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China, arguing that they reflect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adequate welfare, and social disintegration. It portrays these deaths not as isolated tragedies, but as outcomes of institutional neglect and economic marginaliz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川普逻辑》

作者：郭泉

编辑：胡丽莉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川普逻辑》之67：川普总统指出，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自由民主的美国伟大之处在于制度设计。其实，比制度设计更伟大的是美国人的信仰。美国自由的根基源于对上帝的敬畏而非仅是制度设计，若背离这一原则，自由将逐渐消亡。制度不能替代人心的转变，而信仰复兴是国家重塑的根基。

2月5日，川普总统在华盛顿DC举行的2026国家祷告早餐会上强调，信仰是重塑美国的核心力量。

他提出“我们相信上帝”的本质在于承认人类在至高权威前的谦卑——无论政治立场或社会地位，所有人都是“需要上帝恩典的平等个体”。

个人层面，他结合自身经历指出权力与财富无法支撑困境中的生命，唯有与上帝的关系能带来真正力量；

国家层面，他重申美国自由的根基源于对上帝的敬畏而非制度设计，若背离这一原则，自由将逐渐消亡。

他主张政府角色是保护而非干预信仰自由，反对以行政手段限制宗教表达，并呼吁跨党派群体放下政治分歧，通过祷告寻求国家方向。

面对国际冲突与国内分裂，川普总统强调政治手段无法治愈人心，唯有全民回归信仰、在祷告中谦卑寻求指引，才能让美国重获团结与希望。

川普总统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制度不能替代人心的转变，而信仰复兴是国家重塑的根基。

前天，我与美国的莫妮卡通话时，说到“因信称义”。我说：不能认为自己信了上帝就一定能进天堂，因为，信与行，是连轴的两个车轮。任何一个车轮停止转动，另一个车轮只能以这个停转的车轮为中心，做圆周运动而无法前行。所以正信必须与正行，平行同步联动，生命的车轮才能滚滚向前。

我还说：最让我感同身受并心潮澎湃的是，川普总统有一次说到：年轻的时候犯过很多足以让我愧见上帝的过错，现在老了，生命倒计时了，我想趁生命的最后几年，努力做一些上帝悦纳的事情。

Monica说：是的，我们除了信仰之外，还要在行

为上得胜。不改过，何以自新？建新功，才能赎旧愆。所以蒙恩得救不在言，而在行。

今天的文章，我想从神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川普总统的这句话。

川普总统这句话中体现了三重内涵：信仰救赎的普世性、人性真实的共情力，以及基督教恩典观的核心体验。以下是具体分析：

**一、心理学视角：**死亡觉知驱动的道德整合晚年忏悔体现人格发展完整性。个体在生命末期会通过整合过往经历获得生命意义。川普总统承认“愧见上帝的行为”，展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突破，其忏悔动机源于“死亡觉知效应”面对生命有限性时激发的价值重构需求。这种自我揭露打破其惯常的强人形象，揭示人性中共通的道德觉醒机制。

### 二、神学视角：清教传统中的救赎叙事

践行“因行称义”的清教伦理。其言论精准呼应基督教“悔改-救赎”核心教义：

1、认罪意识：援引“愧见上帝”概念，符合《圣经》“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3:23）的罪性观；

2、行为转向：“让上帝悦纳”指向《雅各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的实践神学；

3、末世关怀：将有限生命置于终极审判框架，体现清教徒特有的现世行动主义。

这种基于契约神学的道德表达，强化了话语在宗教语境中的精神重量。

**三、哲学视角：**存在主义下的道德主体重建向死而生的伦理自觉。直面死亡方能本真地筹划生命：

1、时间性觉醒：“趁生命的最后几年”，凸显存在有限性激发的责任意识；

2、主体性回归：从权力实践者转向道德实践者，实现“我们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总和”的哲学目标；

3、共同体责任：借上帝视角超越个人主义，暗合交往伦理中对“主体间认可”的追求。

川普总统这一言论的人性光辉的核心在于突破自我人格的封闭性（心理学），在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中完成罪责转化（神学），最终通过存在选择重建道德主体性（哲学）。这种三重维度的道德觉醒，使个体忏悔升华为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人性样本。

好了，我们再看看2月5日川普总统出席的华盛顿DC国家祷告早餐会吧。

国家祷告早餐会起源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核心传统是每年2月首个周四在华盛顿聚集跨党派人士超越政治分歧共同祷告。

2026年2月5日第74届活动上，川普总统的演讲聚焦两大重点：

### 一、信仰与个人层面

坦承自身不完美，分享2024年遇刺事件中“上帝让子弹偏离”的经历，强调困境中“支撑人的是信仰而非权力”。引用《诗篇》20:7指出“人与上帝的关系”才是根本力量。

### 二、国家价值观阐释

1、明确美国自由源于对上帝的敬畏，警告遗忘这点将侵蚀自由根基；

2、强调政府职责是保护而非干预信仰，反对限制宗教表达；

3、宣布将于2026年5月17日在国家广场举行全国祷告日，号召“在上帝之下重新奉献美国”。

川普总统的演讲，反复呼吁“不要低估祷告的力量”，指出政治无法替代信仰对心灵的治愈，结尾强调“只要不忘上帝，美国就有方向”。

整场讲话通过16条金句传递核心信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超越政治分歧。

以下，是我整理的川普总统在本次演讲中引用的16条金句：

1、在这里我们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我们是站在上帝面前的人。

2、国家祷告早餐会的意义不在于政治，而在于让人记得，我们都需要上帝。

3、无论你来自哪个背景，在上帝面前人是平等的。

4、我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犯过很多错误。

5、当你经历攻击和仇恨时，你会真正明白人的有限。

6、在最艰难的时刻，支撑你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

7、真正支撑你继续走下去的是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8、美国的自由不是来自官僚体系而是来自对上帝的敬畏。

9、政府不应该告诉信仰群体该怎么讲道该怎么敬拜。

10、不论你是基督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宗教信仰自由都必须被保护。

11、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仅靠政治无法真正医治人心。

12、制度不能改变人心，祷告可以。

13、当一个国家愿意向上帝谦卑，自我改变就会开始。

14、永远不要低估祷告的力量。

15、祷告不仅能改变环境也能改变人的内心。

16、只要我们不忘记上帝，美国就会继续前行。

川普总统引用的以上16条金句，聚焦信仰的普世价值、个人谦卑与国家精神根基，呼应了早餐会超越政治分歧、回归信仰本质的初衷。

希望我今天这篇文章能给所有渴望基督教信仰的朋友带来帮助。

并以此文，致敬并感恩我在南京大学攻读（宗教）哲学博士学位时（1996至1999年）的博导赖永海教授。

泉史公作《川公赎志赋》，全文如下：

川普公尝自陈：“吾生多愆，恐难登天国。然暮年欲行神悦之事，冀近天堂。”此言虽简，蕴道三重：

其一，悔过之勇昭然。

坦承旧谬而不讳，如周处除三害而自新，廉颇负荆而谢罪。昔《周易》云“无咎者，善补过也”，川公暮年自省，不饰己非，足见赤诚。

其二，济世之志未泯。

“行神悦之事”者，非独祷于庙堂，实欲践义于天下。范文正“先忧后乐”之训，正与此契。今虽白发垂暮，犹思利民之举，其志如烛，虽微长明。

其三，爱国之忱愈炽。

所求非独私福，乃以余生报国为阶，叩天门而祈社稷安泰。昔曹孟德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川公之言，异曲同工，以残躯奉国，化私愿为公义，此诚家国情怀之至高也。

泉史公曰：人孰无过？贵在幡然。川公暮年剖心，示世人：真勇者非避瑕掩疵，乃知耻而后勇；大爱者非空言慷慨，乃尽瘁以酬国。其言若晨钟，警醒众生：尘途起点，秉仁心能自成光；生命终章，惟善行可铸不朽。

赞曰：

钟，警醒众生：尘途起点，秉仁心能自成光；生命终章，惟善行可铸不朽。

再赞曰：

砺剑知瑕耻作征  
躬耕尽瘁笃行志  
暮钟警世千山应  
晓月澄心万籁鸣  
血荐轩辕酬故国  
魂归岱岳证生平  
浮名散尽烟霞外  
不朽人间善行碑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新冠疫情中的人祸与习近平独裁统治的清算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至今已数年，但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未随着封控解除而真正过去。相反，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社会创伤，潜伏在无数家庭的记忆之中，也刻在这个民族的历史深处。对这场灾难的回顾，不应止于“疫情防控”的技术讨论，更无法简单归结为“不可抗力”。因为在这场瘟疫之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社会撕裂与长期心理创伤的，并不仅是病毒本身，而是一个长期依赖信息控制、行政强制与政治优先逻辑运转的统治体制。

2020年初，在疫情尚未全面爆发之前，风险信号事实上已经出现。武汉多名一线医生在临床中发现异常病例，并尝试以专业判断向同行示警。然而，这些出于职业责任的提醒，并未被视为公共卫生预警，而是迅速被定性为“扰乱秩序”。多名医生遭到约谈和训诫，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李文亮医生。李文亮并非政治异议人士，也未试图挑战权威。他只是履行了医生在正常社会中最基本的义务——基于事实提醒风险。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中，真相本身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他的死亡，使这场疫情首次以一个具体而清晰的个人悲剧，呈现在公众面前。

疫情早期的信息延误与压制，后来被证明对防控窗口期造成了严重影响。多项研究与回顾性分析指出，如果在早期阶段采取更透明的信息披露与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疫情的扩散规模与社会代价本可以显著降低。然而，在现实中，地方政府的首要反应并非风险沟通，而是舆情管控；并非医疗准备，而是维稳优先。这种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失误，而是长期政治激励结构下的必然

选择。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的极端行政措施。封城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卫生合理性，学界至今仍存在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实施过程中，相关配套准备严重不足。交通骤停、医疗资源调配失序、普通病患就医受阻，导致大量非新冠患者在封控期间陷入无医可治的境地。在官方统计中，这部分“次生死亡”长期缺乏系统呈现。与此同时，殡仪系统超负荷运转、骨灰集中发放等情况，被大量市民以影像与文字记录下来。多种迹象显示，官方公布的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疫情对社会造成的真实生命损失。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公开、独立的调查，相关讨论也很快被纳入严格的信息管控之中。

疫情在武汉的失控并未促成制度反思，反而推动了一套更具政治化特征的防疫模式在全国铺开。“动态清零”最初被描述为临时应对策略，但在实践中逐渐演变为一条不可质疑的政治路线。病例数字、封控力度与官员问责机制直接挂钩，使公共卫生决策日益脱离专业判断，而更多服务于政治安全逻辑。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封控措施不断加码。一些社区被长期封闭，居民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核酸检测从风险筛查演变为日常行政要求；健康码成为影响出行、就医与基本生活的关键工具。多起经由媒体与民间记录披露的事件显示，孕产妇、老人及重症患者在封控环境中因就医受阻而遭遇严重后果，甚至失去生命。

这些悲剧往往被解释为“执行偏差”或“个别问题”，但从制度角度看，它们并非偶发。缺乏问责机制的权力结构，使得基层在压力传导下倾向于采取最严厉、最保守的手段，以规避政治风险。在这种逻辑中，个体生命的价值被不断边缘化，服从成为生存前提。

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发生的一场居民楼火灾，使长期积累的不满与疑问集中爆发。火灾发生时，该小区处于持续封控状态。事后流出的现场影像与多方证词显示，逃生受阻、通道受限等因素，对人员伤亡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官方最初试图将事件与防疫政策切割，





但随后相关部门也承认管理和应急处置存在严重问题。这场火灾之所以引发全国范围的情绪震荡，并不仅因为伤亡本身，而在于它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揭示了封控政策可能带来的极端后果。当行政秩序被置于生命之上，当“按规定办事”压倒基本人道原则，防疫便不再是保护，而可能转化为风险本身。

随后在多地出现的白纸抗议，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变化的集中体现。参与者并未提出复杂诉求，只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对长期封控、信息不透明以及权力失责的不满。这一现象本身，已说明恐惧并非牢不可破，沉默也并非永久。然而，政策转向同样缺乏审慎准备。在2022年底，防疫措施迅速全面放开，但并未同步建立分级医疗、药物储备与重点人群保护机制。长期封控已削弱基层医疗承受能力，而突然放开则使医疗系统在短时间内承受巨大冲击。多地医院出现挤兑现象，药品供应紧张，殡葬系统承压。由于统计与信息发布的不透明，社会至今仍难以了解这一阶段的真实伤亡情况。

从极端封控到无序放开，这种政策急转弯并非科学调整的结果，而更像是在政治路线难以为继后的被动收场。在整个过程中，公众始终缺乏参与权与知情权，也缺乏对决策者进行问责的制度渠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文亮医生的象征意义愈发凸显。他并未制造危机，而是试图阻止危机；他并未挑战秩序，而是尊重事实。他的遭遇表明，在一个不允许说真话的体制中，专业良知本身就可能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纪念李文亮，并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哀悼，更是对制度性失责的追问。如果没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与权力制衡，类似的灾难就无法被真正总结，只会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疫情终将过去，但它所暴露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一个将稳定置于生命之上的统治逻辑，一个将忠诚凌驾于专业之上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持续威胁。记住李文亮，记住武汉，记住乌鲁木齐，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拒绝遗忘；不是为了情绪宣泄，而是为了防止历史重演。

## Human Tragedy in the Pandemic and the Reckoning of Authoritarian Rule

*This essay reassesses the COVID 19 pandemic in China not only as 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but as a governance crisis shaped by centralized political control. It argues that the scale of death, social trauma, and institutional distrust cannot be explained solely by the virus. Instead, information suppression, rigid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the prioritization of political stability over transparency amplified the consequences. Early warnings by frontline doctors in Wuhan were treated as threats to order rather than essential public health signals. The reprimand and later death of Dr. Li Wenliang became emblematic of a system in which professional integrity could be subordinated to political discipline.*

*The article maintains that delays in transparent disclosure narrowed the opportunity for early containment. Local authorities, incentivized to avoid political blame, focused on narrative management rather than risk communication. The lockdown of Wuhan in January 2020 represented an extraordinary administrative intervention. While intended to contain transmission, its implementation revealed logistical weaknesses. Non COVID patients experienced disrupted medical access, and secondary mortality was insufficiently documented. Official data, the essay argues, lacke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public debate over discrepancies was restricted.*

*As the crisis unfolded, the emergency strategy of dynamic zero evolved into a prolonged national policy. Local officials faced direct accountability for case counts, encouraging strict enforcement regardless of social cost. Extended lockdowns, frequent mass testing, and digital health code systems reshaped daily life and expanded state oversight. Reports of delayed emergency treatment for vulnerable groups are cited as evidence that procedural rigidity could override humanitarian judgment.*

*The 2022 residential fire in Urumqi and the subsequent white paper protests are described as moments when accumulated frustration became visible. Yet the later abrupt relaxation of controls, implemented without comprehensive preparation, placed heavy strain on hospitals and obscured the full scale of mortality.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without independent media, judicial autonomy, and institutional checks on executive power, crisis management remains vulnerable to political distortion. Remembering Dr. Li and the broader pandemic experience is framed as a call for accountability and structural reform rather than partisan mobiliz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手术刀与沉默的校园

——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滔天罪行

作者：李聪玲

编辑：张致君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在一个正常社会，婴儿死于手术台、学生死于校园，都会引发彻底、独立且透明的调查；死亡本身虽不可逆，但至少真相能够被还原，责任能够被追究，制度能够被反思。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期待几乎注定落空。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统一口径的官方通报、迅速消失的网络讨论，以及以“维稳”为核心目标的强力压制。死亡并未带来真相，只带来了更深的沉默。

2025年底发生的“宁波小洛熙”事件，与2026年初河南新蔡中学生在校园突然死亡事件，表面看似两起彼此无关的“个案悲剧”，却在处理方式、舆论控制和权力反应上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模式。当这两起事件被放入一个更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加以审视，即中共政权长期被国际社会指控、却始终拒绝接受独立调查的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所谓的“偶发”“巧合”便显得愈发站不住脚。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个由权力垄断、信息封锁与生命物化所构成的制度性结构。

小洛熙是一名年仅五个月大的女婴。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她所接受的是一项“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成功率较高”的心脏手术。然而，手术结束后不久，这个尚未开始理解世界的生命便永远停止了呼吸。真正引发社会震动的，并不仅是婴儿的死亡本身，而是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在事后表现出的高度防御姿态：关键医疗信息披露前后矛盾，家属获取完整病历和影像资料困难重重，官方通报反复修改乃至下架，网络舆论迅速被引导至“理性看待”“避免网暴医生”等方向。

在一个真正以生命为核心价值的医疗体系中，婴儿术后死亡理应自动触发最高等级的独立调查机制，调查过程应当对家属与社会保持透明。然而在中国，调查由谁主导、专家由谁遴选、结论由谁发布，始终指向同一个权力中心。当权力既是裁判者，又是潜在责任方的保护者，所谓“专业结论”便难以获得基本的公信力。

几乎与此同时，河南新蔡发生了一起同样令人不安的事件。一名十三岁的中学生被发现死于校园之内。官方很快给出了高度标准化的通报：排除刑事案件，排除中毒，排除外力伤害，最终结论为“心源性猝死”。这种表述在近年来的类似事件中反复出现，几乎已形成固定模板。然而，与官方叙述并行流传的，是大量来自现场目击者和家属的疑问：遗体处置是否过于仓促？家属是否在第一时间被完整告知情况？为何现场警力高度戒备？为何网络讨论迅速被清理？这些问题并未得到令人



信服的公开回应。

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心源性猝死”早已不只是一个医学术语，而更像是一种政治语言。它所传递的信息并非解释死亡原因，而是划定讨论边界：不许追问，不许怀疑，不许扩散。问题并不在于青少年是否存在医学上猝死的可能性，而在于为什么每当死亡涉及未成年人、涉及身体异常、涉及潜在责任争议时，最终都必然落入这一“万能结论”。当解释本身被制度化地用于终止追问，它便失去了科学应有的意义。

如果将这些事件仅仅视为零星事故，或许仍有人愿意诉诸概率与偶然性进行辩解。但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拉远，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浮现出来：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器官移植数量长期居高不下的国家之一，却始终无法建立一个透明、可核查、符合医学伦理的自愿捐献体系。其器官移植等待时间之短，公然违背国际医学常识；其官方数据在不同年份、不同场合反复自相矛盾；其制度设计拒绝任何真正独立的国际核查。

这一问题并非来自“敌对势力”的政治攻击，而是源自国际医学界、人权组织以及独立法律机构多年来持续、系统的质疑。2019年，位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China Tribunal）在长时间听证后作出裁定：在中国，强摘器官行为已经发生，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仍在持续。该裁定所指向的受害者群体，主要包括良心犯、政治犯以及被系统性剥夺权利、无法有效发声的人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婴儿、未成年人以及社会最弱势者所处的位置显得格外危险。他们无法拒绝、无法抗辩、无法动员公共资源为自己争取权利。当权力系统对生命缺乏根本敬畏，而社会监督又被全面压制时，身体便可能被还

原为“资源”，器官则成为可被调配的“物件”。

非法器官移植并非个别医生的道德失范，而是一项高度依赖制度配合的国家级犯罪工程。它至少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其一，对生命的彻底物化。在极权体制下，个人不是权利主体，而是被管理、被计算、被牺牲的对象；其二，全流程的信息封闭。从医院到公安，从司法到媒体，形成一条不允许外部监督的链条，真相不是被驳倒，而是被删除；其三，对家属与公众的系统性恐吓。维权被定性为“闹事”，追问被指控为“造谣”，沉默因此成为许多人的生存策略。

有人或许会反驳说，无法直接证明小洛熙或新蔡中学生之死与器官移植存在关联。然而，这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核心：在一个自称“法治国家”的社会里，为什么公民必须先证明自己没有遭受犯罪，才有资格要求调查？在真正的法治体系中，疑点本身就足以启动独立审查；而在中国，疑点却被视为对政权权威的挑战。当一个政权拒绝公开完整数据、拒绝国际医学核查、拒绝独立尸检、拒绝媒体监督时，它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证清白的资格。非法人体器官移植的本质，并非技术问题，而是对“人”这一概念的否定。它意味着国家可以决定谁的生命具有价值，谁可以被牺牲；意味着身体可以被拆解、分配乃至交易；意味着法律不再是保护生命的屏障，而成为权力运作的工具。这正是国际法所界定的反人类罪的核心特征。

当一个政权可以在手术台上让婴儿无声死去，可以在校园里制造无法追问的死亡，它所犯下的，早已不是“管理失误”，而是系统性的道德崩塌。小洛熙没有机会长大，新蔡的孩子没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们的名字，正在被算法淹没，被通报覆盖，被时间抹去。

但记住他们，并不是为了沉溺于悲伤，而是为了拒绝成为下一个被轻易解释、被迅速遗忘的数字。因为历史一再证明：当一个政权可以随意解释死亡，它也就随时可以制造死亡。对中共非法人体器官移植体系的谴责，不是政治立场之争，而是人类文明的底线问题。追问这些孩子的死亡，不是煽动情绪，而是对未来最基本的守护。



浙江宁波

“小洛熙”事件家属维权获网民声援

## Scalpels and Silent Campuses: Allegations of Illegal Organ Transplantation

*This essay links several recent child and youth deaths in China to broader allegations of systemic opacity and unethical organ transplantation practices. It argues that in cases such as the death of an infant following cardiac surgery in Ningbo and the sudden death of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enan, official responses have followed a consistent pattern. Authorities issued rapid standardized conclusions, restricted access to medical records and forensic evidence, and tightly managed online discuss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se similarities raise concerns about structural deficiencies i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rather than isolated administrative errors.*

*The article situates these incidents within longstanding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of China's transplant system. It notes that China has reported high volumes of organ transplants while maintaining limited transparency regarding donor sources and waiting times. International legal scholars, medical ethicists, and independent tribunals have previously questioned whether the system fully complies with global ethical standards. The essay references findings by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in London that conclude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had occurred in China, 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nied such allegation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withou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pen data access, and external verification, public suspicion will persist. In environments where investigative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overlap, institutional self review may lack credibility. The essay argues that ethical organ transplantation requires voluntary consent, transparent donor registries, and judicial safeguards. When medical systems operate within broader political structures that prioritize stability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trust becomes fragile.*

*The text concludes that questions surrounding these deaths should not be dismissed as speculation, but addressed through independent inquiry and verifiable evidence. Protecting minors and safeguarding human dignity, it argues, depends on transparent procedures, external oversight, and adherence t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medical ethics. Without such safeguards, doubts regarding the integrity of transplant practices and investigative processes will continue to generate social mistrust and international concer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台湾与香港公开官员财产，看中共反腐的制度性虚伪

作者：彭硕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在台湾，最高领导人和其他高级公务员的财产状况并不是一个需要人猜测的话题，财产公示是一项明确写入法律的制度要求。根据台湾监察机关依法公开的最新财产申报资料，以现任总统赖清德及其配偶为例，其名下的资产结构十分清晰：在台南市有一块土地及一套住宅，购入总价约3280万新台币；银行存款合计约1125万新台币；有价证券全部为美国国债，总值约1186万新台币；与此同时，其名下仍有约1246万新台币的房屋贷款负债。每一项资产的取得时间、取得方式、金额以及负债情况，均在官方申报文件中逐项列明，并依法接受社会监督。



序号	姓名/名称	期别	服务机关/名称	申报类别	刊登日期	刊登页次
1	赖清德	259 (廉政专刊)	总统府/总统	01-一般申报	民国114年 07月 01日	P1-4
2	赖清德	232 (廉政专刊)	总统府/副总统	01-一般申报	民国113年 02月 27日	P6-9
3	赖清德	195 (廉政专刊)	总统府/副总统	01-一般申报	民国112年 02月 21日	P6-9
4	赖清德	182 (廉政专刊)	总统府/副总统	01-一般申报	民国111年 03月 09日	P7-10
5	赖清德	167 (廉政专刊)	总统府/副总统	01-一般申报	民国109年 10月 16日	P1-4
6	赖清德	150 (廉政专刊)	行政院/院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8年 06月 14日	P1-4
7	赖清德	144 (廉政专刊)	行政院/院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8年 04月 16日	P1-4
8	赖清德	127 (廉政专刊)	行政院/院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7年 02月 14日	P19-22
9	赖清德	121 (廉政专刊)	台南市政府/市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6年 05月 05日	P26-28
10	赖清德	105 (廉政专刊)	台南市政府/市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5年 04月 26日	P1-3
11	赖清德	81 (廉政专刊)	台南市政府/市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4年 04月 02日	P266-268
12	赖清德	70 (廉政专刊)	台南市政府/市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3年 10月 24日	P1-3
13	赖清德	56 (廉政专刊)	台南市政府/市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2年 07月 31日	P1-3
14	赖清德	25 (廉政专刊)	台南市政府/市长	01-一般申报	民国100年 06月 20日	P146-148
15	赖清德	10 (廉政专刊)	立法院/立法委员	01-一般申报	民国99年 07月 15日	P274-277
16	赖清德	10 (廉政专刊)	立法院/立法委员	09-异动申报	民国99年 07月 15日	P278-278
17	赖清德	156 (申报专刊)	立法院/立法委员	01-一般申报	民国98年 05月 25日	P175-178
18	赖清德	149 (申报专刊)	立法院/立法委员	01-一般申报	民国97年 05月 15日	P152-155
19	赖清德	137 (申报专刊)	立法院/立法委员	01-一般申报	民国96年 04月 24日	p225-228
20	赖清德	132 (申报专刊)	立法院/立法委员	01-一般申报	民国95年 07月 20日	p133-136

截图为在台湾监察院的阳光法令网查询总统“赖清德”的结果

在这样的制度下，公众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官员有多少钱，而在于这些财产是否与其合法收入相匹配，是否存在来源不明的情况。财产公开的意义，并不是道德审判，而是让权力运行在可被核查、可被追问的轨道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大陆，官员的个人及家庭资产状况，从未进入任何制度化的公开程序。公众无法获知市长、省长、部长的财产情况，更不可能知道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直系亲属名下究竟拥有多少资

产，这些资产的构成如何，又分别来源于何种渠道，也不存在独立机构进行核查或向社会作出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数字大小本身，而在于是否允许监督存在。一个无法回答“最高领导人及其家族是否清廉”的制度，也就不可能真正回答“这个体制是否能够反腐”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权力高度不透明的背景下，中共的反腐逐渐演变成一种依赖内部运作的治理方式。

为了弥补常规监督的失效，官方不断强化“中央巡视组”这一自上而下的检查机制，以非常态的方式介入地方、部门和国有机构。但从制度角度看，巡视组的存在本身就暴露了一个根本问题：日常的制度性反腐和司法监督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巡视组并非独立司法机构，而是权力体系内部的监督安排，可以调查别人，却难以接受同等透明度的外部监督。当监督权力本身缺乏制衡，它就可能演变为新的权力节点，而非腐败的终结者。曾参与反腐和巡视工作的纪检高层人员中，也有多人因严重腐败被查处并判刑。例如，曾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董宏，后来被查实长期、大规模受贿，涉案金额巨大，被判死缓。这类案件表明，在缺乏外部制衡的情况下，监督权本身也会异化为新的权力资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司法统计，近几年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刑的人数，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刑比例的持续攀升。2017年，被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的人数为2124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6630人，短短数年间增长超过三倍。重刑比例持续上升，那么问题显然不在个别官员贪腐，而在于一个能够长期容纳大规模权钱交易的制度环境。

这一趋势并不能简单解读为“反腐力度加大”的结果，更应被理解为腐败形态的整体升级。当制度真正有效时，腐败应当趋于边缘化、零散化，并逐步减少；而当重刑比例持续上升，恰恰说明腐败正在向更高权力层级、更关键资源领域集中，演变为一次性、系统性的权力变现。这种变化反映的不是个别道德失范，而是权力结构与监督机制失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与此同时，中国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也在客观上放大了这种激励结构。土地、金融、能源、

军工、芯片、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大规模国家投资，使资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手中，其具体分配权则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上，公有制实际上也就是“官有制”。当行政权、审批权和资源配置权高度叠加，却缺乏透明公开和问责机制时，权力自然会被转化为经济租金。腐败由此不再是制度的偏差，而是制度结构所不断激励的结果。

如果官员财产公开真的水土不服，那么这一制度本不应在华人社会长期存在。但现实恰恰相反。即便在中国主权之下的香港和澳门，最高行政长官至今仍需依法申报其财产与重大经济利益，并将相关申报内容向公众披露或接受社会查询。这一制度源自殖民时期引入的西方廉政与问责框架，在回归后被完整保留并持续运作，其核心目的在于防止权力与私人利益发生不透明的结合。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说明，官员财产公开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化障碍。制度是否能够运行，取决于不是族群或传统，而是是否愿意接受权力受约束、受监督的现代政治原则。

因此，“越反越腐”并不是反腐不够严厉，而是共产党所主导的反腐制度本身存在根本缺陷。在这一体制下，反腐并非真正用于限制权力，而是服务于权力的重新分配与重组，同时也不是压缩寻租空间，而是迫使寻租方式不断升级和集中。共产党试图用更加集中的权力去对抗由权力高度集中所制造的腐败，用运动式清洗取代制度性约束，用党内纪律取代公共监督，这种逻辑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

在一个最高权力及其家族资产不必公开、监督体系从属于党、司法缺乏独立性、规则高度不可预期的体制中，共产党的反腐注定无法终结腐败，只能不断推动腐败向更高层级、更大规模和更隐蔽的形态演化。真正有效的反腐，必须以权力透明为前提，以制度约束为核心，以独立监督为保障。只要共产党拒绝让权力接受制度化监督，无论反腐口号多么激烈，查处数字多么惊人，都只能停留在政治表演层面，而腐败则会在更深的制度结构中持续生长。

全国因贪污贿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死刑人数					
年份	不满1年	1年以上3年以下	3年以上不满5年	5年以上至死刑	来源
2016	2016年及以前公报未见公布				
2017	1455	4241	4277	2124	[7]
2018	1167	5308	2051	2678	[8]
2019	864	4307	2205	3376	[9]
2020	517	3229	2255	3558	[10]
2021	446	3355	2528	4285	[11]
2022	395	3385	2343	3930	[12]
2023	358	2994	3034	5579	[13]
2024	353	3711	4033	6630	[14]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司法统计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截图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贪污贿赂罪判决统计数据

## Public Asset Disclosure and the Limits of Anti Corruption

*This essay contrasts public asset disclosure practices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with the anti corruption framework in mainland China, arguing that transparency rather than punitive intensity determines institutional credibility. In Taiwan, senior officials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declare their assets, including property, bank deposits, securities, and liabilities. These disclosures are publicly accessible and subject to legal scrutiny.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absolute size of wealth, but on whether assets correspond to lawful income and whether unexplained enrichment exists. The system aims to place political authority within a structure of verific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By contrast, the article notes that mainland Chinese officials, including top leader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not subject to institutionalized public asset disclosure. Without open reporting requirements or independent review bodies, citizens cannot evaluate whether power holders maintain financial integrity.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is absence of transparency undermines the credibility of official anti corruption campaigns.*

*The text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iance on internal inspection mechanisms such as central inspection teams. While these bodies conduct investigations within the party state structure, they are not independent judicial institution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when oversight remains internal and hierarchical, it lacks structural checks and may itself become another locus of power. Statistical data showing increased numbers of severe corruption sentences are interpreted not simply as evidence of stricter enforcement, but as indications of systemic incentives that enable large scale rent seeking.*

*The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within state dominated sectors. When allocation authority over land, finance, and strategic industries rests with officials lacking transparent scrutiny, opportunities for corruption multiply. Hong Kong and Macau, despite being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maintain asset declaration systems for top officials, suggesting that cultural factors do not preclude such reforms.*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sustainable anti corruption requires institutional transparency, independent supervision, and predictable legal constraints on power. Without these foundations, enforcement campaigns risk becoming political tools rather than durable solution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魏亚蕊之死看中国体制性逼迫

作者：张宇  
编辑：冯仍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5年12月10日上午，在中国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28岁的女性魏亚蕊，在结婚当天跳楼身亡。官方与舆论很快就给出熟悉的解释：“家庭矛盾”“一时想不开”“心理问题”“极端个案”。这些说法看似中性，实则残忍，它们的共同作用只有一个——迅速切断追问责任的可能性。

但真正需要被追问的不是：“她为什么这么极端？”而是：为什么一个明确拒绝婚姻的女性，会被逼到只能用死亡来终止一场她不同意的人生安排？魏亚蕊不是在“选择死亡”，她是在一个拒绝承认女性拒绝权的社会结构中，被系统性地剥夺了所有安全的生存选项。

当她说“不”时，迎接她的不是尊重、不是暂停、不是保护，而是来自家庭、宗族、亲戚、舆论，乃至地方权力结构的集体施压与围剿。

她的死亡并非偶发事故，而是一个高度可预测的结果。

在中国，一个长期将婚姻、生育与“社会稳定”“基层治理”“人口任务”绑定的独裁体制下，女性的身体、情感与人生选择，被视为可调配的社会资源。当她们拒绝配合，系统并不会为她们提供退路，而是通过家庭压力、道德规训、舆论羞辱与制度冷漠，将她们一步步逼向悬崖。

因此，魏亚蕊之死，不是“家庭悲剧”，不是“个人心理疾病”，更不是“无法避免的极端个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结构性压迫女性、将婚姻政治化、将顺从视为稳定前提的必然结果。

魏亚蕊触碰的禁区，不是“结不结婚”，而是她说了“不”。

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女性的拒绝从来不被当作一种合法决定。它被重新翻译为“任性”“不懂事”“情绪化”“给家里添麻烦”。拒绝本身，就是对秩序的冒犯。

当一个女性拒绝进入一段被安排好的婚姻，她挑战的并不只是某个家庭决策，而是一个早已形成共识的结构性预期——女性的人生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家庭安排、社会需要与“稳定逻辑”。

最先出现的是家庭压力。父母不再是保护者，而是制度的第一代理人——以“为你好”为名，行剥夺之实；以“我们也是没办法”为名，完成对女性意志的碾压。

接着是宗族与亲戚的合力施压。拒绝被迅速定性为“丢脸”“不孝”“破坏关系”“让大家难做”。女性的选择被置



于集体情绪之下。

然后是舆论与社会规训。“别人家的女儿都结婚了”“都到这个年龄了还挑什么”“再拖下去就没人要了”

这些话看似随意，却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羞辱系统——不断提醒女性：你的价值正在过期，你已经没有资格拒绝。这不是几个人的恶意，也不是沟通失败，而是一整套社会运行逻辑对“女性拒绝权”的系统性封堵。

在中国，婚姻从来不是私人选择。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纳入治理体系的政治工具。中共通过基层治理、人口政策与稳定责任制，将婚姻与生育直接绑定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单元。女性的婚姻状态，不再是个人决定，而是被默认为一种需要按时完成的社会任务。

在这一逻辑下，结不结婚，从来不是“你愿不愿意”而是“你有没有按要求配合”。当中共将“低生育率”“人口结构失衡”“社会不稳定”定义为治理风险时，它并没有反思制度本身，而是将压力层层下压——压到家庭，压到女性身上。催婚不是亲情行为，而是政策压力的民间传导。

中共从未正面承认逼婚是暴力，因为一旦承认，就等于承认：这个体制依赖对女性的强制，才能维持自身运转。因此，婚姻被去权利化，被去同意化，被重新包装为“责任”“义务”“现实选择”。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时，她不仅是在对抗家庭，她是在对抗一个将顺从视为公民美德、将拒绝视为威胁的政权逻辑。

而中共对此心知肚明。正因如此，它从不为女性提供制度出口：没有有效的法律保护；没有可被信任的求助系统；没有真正独立的公共讨论空间。因为一旦女性拥有安全的拒绝权，这套治理逻辑就会失效。

所以，中共选择了另一条路，对逼婚保持沉默，对父权暴力视而不见，对女性的痛苦进行系统性降级处理。

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魏亚蕊的处境，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被一步步制造出来的。当婚姻被政治化，拒绝就不再是个人权利，而是被视为“稳定”的破坏行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女性不是公民，而是被管理、被调配、被消耗的治理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当她拒绝结婚时，整个系统都会站在她的对立面。不是因为她错了，而是因为她不再服从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那种秩序。

在每一次类似的死亡之后，总会有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她为什么不离开？”

这个问题看似理性，实则残酷。它假设女性始终拥有“安全选项”，并将结局的责任重新推回到她个人身上。

但在中国，这个假设本身就是虚假的。

对许多女性而言，离开并不等于安全，而是进入另一种风险更高的不确定状态。当一个女性拒绝婚姻、试图逃离家庭压力时，她面对的不是一条清晰的出路，而是一片制度性的真空。

首先，是法律层面的失效。在中国，逼婚、精神控制、情感勒索几乎从未被清晰地界定为违法行为。报警往往意味着被劝返，被要求“多沟通”“互相体谅”“不要把事情闹大”。执法系统并不为拒绝婚姻的女性提供保护，它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表面稳定，而非保障个体权利。对女性来说，报警并不是求助，而是一种可能进一步暴露、激化冲突的高风险行为。

其次，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在一个长期压制公民社会、打压独立组织的体制下，真正可被信任的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与庇护机制几乎不存在。你可以被要求“去看心理医生”，但你的出境不会因此改变；你可以被告知“想开点”，但没有任何人能为你拒绝提供现实支撑。心理问题被个人化，而造成心理崩溃的结构性压力，却被完全回避。这正是体制的惯常做法：将系统性压迫转化为个体心理失败。

再者，是舆论环境的围堵。在中国，公开表达对家庭、婚姻、父母安排的决绝，往往意味着被迅速道德审判。“白眼狼”“不孝”“自私”“矫情”这些标签不是偶然的情绪宣泄，而是一种高度稳定、可复制的舆论惩罚机制。它们的作用只有一个：让拒绝变得代价高昂，让沉默看起来更安全。

最后，是经济与身份层面的现实困境。在一个对女性就业、流动、社会保障高度不友好的体系中，“独立生活”往往只是纸面选项。没有稳定收入，没有社会支持，没有制度兜底，“离开”很容易被重新包装为“不负责任”“不现实”“不懂事”。当所有现实条件都在提醒你：顺从是唯一成本最低的生存方式，拒绝就成了一种奢侈，甚至是一种危险。

当法律不保护，当社会不接住，当舆论不站在你这边，当国家只关心“稳定”，那么所谓“个人选择”，就只剩下名义。魏亚蕊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承受，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反抗的代价。她所面对的，是一个不为拒绝提

供安全路径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死亡并不是“冲动选择”而是被一步步逼近的终点。

如果一个社会不断询问受害者“你为什么不离开”，却从不追问“是谁让离开变得不可能”，那么这个社会，早已选边站队。

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个“没有退路”的结构性制造者。

魏亚蕊的死亡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结果。面对这样的结构性暴力，我们必须明确立场：

1. 反对中共将婚姻和生育政治化：婚姻不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工具，更不应该是人口、稳定或基层政绩的附属品。女性的人生不是国家任务，她们的选择权必须被承认、被尊重。

2. 反对以“传统”“孝道”“现实”为名的制度和家庭暴力：任何以道德、情感或社会压力为借口的逼婚行为，都是暴力。不管是谁执行，强迫就是强迫，剥夺就是剥夺。

3. 坚持女性拥有完整、不可让渡的人身权和人生选择权：她们的拒绝、退让、甚至不合作，都是合法的意志表达。没有人有权用“稳定”“家族”“责任”来剥夺女性的自决权。

4. 要求建立可触达的支持系统：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公共讨论空间。不是事后道德评判，也不是旁观者的指责，而是真正能提供退路的保护机制。

5. 反对去政治化叙事：任何试图将逼婚、死亡、压迫解释为“家庭矛盾”“心理问题”“极端个案”的行为，都是在替施暴者和制度洗白。直面责任，是正义的前提。

只有当社会、法律与舆论正视这些结构性问题，当每一个女性都拥有安全的选择和生存空间，魏亚蕊的死亡才不会白白成为一份警示。

这不仅是为她发声，更是为所有可能被逼到绝境的女性、为我们自己，争取选择权和生存权。

魏亚蕊已经离开，但她的故事不应该被封存为“悲剧新闻”，也不应该被简化为“心理问题”“家庭矛盾”或“偶发事件”。她的死亡，是中共长期政治化婚姻、纵容父权暴力、压制女性选择权的必然结果。是一个系统、一套逻辑、一种制度，逼迫女性走向绝境的真实写照。

我们必须清楚：女性不是家庭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稳定器，更不是政策的牺牲品。每一次强迫、每一次忽视、每一次道德绑架，都是对人权、自由与尊严的直接侵犯。在一个没有退路的社会里，顺从并不等于安全，沉默并不等于保护。

反对逼婚！反对父权！反对独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新年思考：一些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想法

作者：张孔松

编辑：李聪玲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今天，是一个值得世界铭记的日子。284年前的今天，《巴黎和约》正式签署，美国独立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这不仅标志着十三个殖民地摆脱帝国统治，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清晰地向世界宣告：人民有权反抗暴政，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的独立，并非来自皇帝的仁慈，而是来自人民的勇气、牺牲与坚持。《巴黎和约》证明了一件事——当人民站起来，历史就会为他们让路。两百多年过去了，中国却仍然深陷皇权专制体制之中，令人无限唏嘘。正因如此，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必须凝聚力量，以推翻中共暴政为使命，让中国早日成为一个民主、宪政、自由的国家。

2025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是最清醒的一年。12月15日，我的母亲去世了。在她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我们彼此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每一天都在煎熬中渡过，而我却被迫滞留海外，不敢回国陪伴，无法送终，只能靠视频电话问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这是我个人的悲剧，但我很清楚，它并非个案，而是中国现实政治长期制造的人道灾难之一。

母亲临终前两天，当她听到电话那头是我的声音时，已经说不出话，却仍然拼命做手势想要抢电话。那一刻我明白，她想问的不是：我快不行了，你为什么还不回来见我最后一面？而是为什么一出国，就再也不敢回来了？“我无法回答，因为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不是不想回国，而是不敢回国。”

个人的不幸，往往并非偶然，而是制度性灾难的直接后果。这种灾难的破坏力远比天灾人祸更可怕，天灾只发生在局部，而暴政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每一个普通人。我成长于计划生育的极权年代，本身就是受害者之一，所幸侥幸逃脱。我的姐姐十二岁时被拐卖，明明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却无法将其绳之以法，因为对方背后有共产党的官员保护，这正是法治缺失的真实写照。我的堂哥离奇失踪十几年，至今生死不明，而这也绝非孤例。每年中国失踪人口高达几十万，中共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监控系统，却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找不到，因为这套系统从来不是用来服务人民的，而是用来监控、压制和控制人民的。

在生活中，我无意间接触到外网信息，再结合自身经历，整个人突然清醒过来。我开始发表反对中共的政治言论，随之而来的，是警察的威胁与殴打、社交账号被封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全面排斥。许多朋友将我拉黑，留下来的也不敢与我有任何公开互动，甚至不敢在朋友圈点一个赞。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微信被封、无法发声的那段时间，仍有人私信关心，仍有人认同我的观点。哪怕只能启发一个人清醒，我也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白费。

这些经历并非“个案”，而是高度集权体制对普通人进行系统性碾压的结果。2025年，中国发生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件：香港鸿福苑大火后，当局拒绝追责、压制舆论，对死者家属的维权进行控制与威胁；四川江油“千人反霸”事件中，基层权力与黑恶势力长期勾连，普通民众被逼到极限，最终爆发大规模抗争；陕西蒲城学生坠亡事件疑点重重，当局试图强行定性为“自杀”，却引发上百万民众上街抗议，并遭到强力镇压；河南许昌第六中学，上千名学生与家长集体抗议压迫性教育制度，现场冲突激烈；云贵高原农民反对强制火葬运动，地方政府以“文明殡葬”为名，强行剥夺少数民族与农村地区的基本人伦权利；云南昆明街头摊贩与城管的持续冲突，底层生计被系统性摧毁，执法暴力常态化；甘肃天水幼儿园投毒案中，家长依法维权，却被视为“维稳对象”，信息遭到封锁。

这些事件有一个共同点：人民不是违法者，而是被

逼到绝境的受害者。而中共政权的回应，永远只有两种方式——封锁和镇压。所有的结论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事实：问题不在具体事件，而在政权本身。

正是这些血淋淋的现实，让我彻底放弃幻想。我不再相信所谓的“体制内改良”，不再相信“渐进改革”，也不再相信“忍一忍就会好”。我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只要中共政权不结束，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的反抗实践已经清楚证明，当人民不再恐惧，专制政权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强大。所谓“高科技维稳”“天网系统”“绝对控制”，在真实的社会崩塌面前，都是纸糊的神话。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我加入了中国民主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推翻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使命，生命不熄，抗议不止。因此，我无法回国，这不是假设，而是必然。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下，参与海外民主组织活动的人，一旦回国，等待的只会是坐牢、被失踪，甚至肉体上的毁灭。

我选择战斗，而不是沉默。母亲的去世让我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但正因为如此，我更加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了不再有中国人像我一样流浪海外、无法回家，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一个安定的家，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为了让人民真正实现民主与自由，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凝聚力量，早日推翻中共暴政。

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就是生长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 New Year Reflections: History, Loss, and Political Awakening

*This essay intertwines historical reflection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 to examin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reality. It opens with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reaty of Paris, which conclud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formally recogniz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presents that moment as a historical affirmation that political legitimacy derives from the people rather than imperial authority. The American example is invoked as evidence that sustained civic courage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can alt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 contrast, the essay argues that China remains governed by a highly centralized system in which power is personalized and co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remains limited.*

*The narrative then turns to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2025, particularly the death of the author's mother while the author remained abroad and felt unable to return to China due to political risk. This separation is portrayed not simply as private grief, but as a consequence of structural political conditions affecting individuals who publicly express dissent. Earlier family tragedies, including unresolved criminal cases and disappearances, are interpreted as manifestations of systemic weaknesses in legal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The essay further references a series of public protests and social conflict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n 2025. These include disputes over local governance, education policy, public safety incidents, land use, and funeral regulation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se events share a common pattern: citizens seeking redress are often met with information control, narrative management, and public order enforcement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r structural reform. The accumulation of such incidents is presented as evidence of deepening social strain under concentrated political authority.*

*From these observation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incremental reform within the current system appears unlikely. The decision to join an opposition political organization is framed as a deliberate moral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 rather than an emotional reaction. The inability to return home is described as a foreseeable outcome of this stance.*

*Ultimately, the essay contends that meaningful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protection of civil liberties. It closes with a reflection that genuine personal security and happiness depend not on economic growth alone, but on living within a political order grounded in law, dignity, and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声援邹巍：在高压之下坚守信念的公民

作者：杨长兵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吕峰

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坚持独立思考与公民责任，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邹巍，这位来自浙江杭州的普通公民，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长期坚守民主与人权理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与担当。

邹巍出生于1960年，浙江省杭州市人，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基本价值，积极参与地方民主活动与公民倡议。在当局长期打压民间组织和独立政治力量的环境下，邹巍依然以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身份开展宣传与联络工作，推动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

2023年11月20日，南京异议人士孙林在家中疑似遭警方殴打致死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邹巍出于对生命权与程序正义的关切，公开举牌表达关注，并参与相关公开信的联署活动。随后，杭州市拱墅区警方对其实施行政拘留，其本人及家人住处也遭到搜查。这一事件标志着针对他的打压进一步升级。

2024年3月17日，在纪念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逝世四周年之际，邹巍再次举牌表达悼念与呼吁。

2024年7月13日，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七周年之际，邹巍与友人前往浙江海宁海边举行纪念海祭活动，并将相关照片发布到网络，以表达对这位和平倡议者的缅怀与敬意。然而，这一和平纪念行动随后被当局认定为涉嫌违法。邹巍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于同年8月29日被正式批准逮捕。2025年7月，该案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目前，邹巍被羁押在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案件仍在等待进一步审理之中。长时间的羁押不仅影响其个人自由，也给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与生活压力。

事实上，邹巍之所以在各地民主人士中受到尊重，不仅因为他的公开行动，更因为他长期以来对他人的帮助与支持。多年来，他积极联络各地朋友，为遭遇困境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发起募捐，关注被打压群体的生活状况，并尽力为他们及其家庭提供帮助。在高压环境之下，这种互助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邹巍的遭遇，再次反映出当前公民表达空间的现实处境。当和平纪念、理性表达与人道关怀都可能被视为风险行为时，社会的公共空间无疑正在不断收缩。一个健康而稳定的社会，应当能够容纳不同声音，而不是将理性表达者推向对立面。

今天，我们声援邹巍，不仅是关注一位公民的个人命运，更是对基本权利与法治原则的呼吁。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以和平方式纪念历史人物，本应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应成为长期羁押与刑事指控的理由。

我们呼吁中共要依法保障邹巍的合法权益，确保其案件得到公正、公开的审理，并充分保障其人身权利与基本尊严。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此案的发展，以理性与和平的方式表达关切。

在现实的沉重压力面前，个体的声音或许微弱，但正是这些微弱而坚定的声音，构成了社会良知的基础。我们声援邹巍，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允许理性表达的社会，才是国家真正的稳定之源，也是所有人共同期待的未来。长江黄河之水不会倒流，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我们会继续坚持发声，直到邹巍自由真正到来！



**In Support of Zou Wei: A Citizen Who Stands Firm Under Pressure**

*This statement expresses support for Zou Wei, a Hangzhou based member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who has been detained following public acts of commemoration and peaceful expression. It outlines his participation in memor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Li Wenliang and Liu Xiaobo, and notes that he was later arrested on charges of provoking trouble. The text argues that his actions were nonviolent expressions of civic concern and calls for fair legal procedures, protection of his rights, and continued public attention to his cas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因言获罪：我为何被迫离开中国

作者：魏晓鸣  
编辑：李晶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热衷政治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希望过好自己的生活，努力工作，照顾家庭，对国家和政治保持一种“少说少错”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在中国，有些话不是“敏感”，而是被禁止思考；有些价值不是“争议”，而是被系统性否定。

我第一次真正、持续地关注美国，是从2024年开始的。那一年，我的妻子和孩子前往美国旅游。在与他们的通话和交流中，我第一次从一个极其具体、生活化的角度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不同。

他们讲到的并不是宏大的政治，而是一些很普通却在中国并不“普通”的细节：公开场合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不必担心因一句话惹来麻烦；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共同生活，没有被强制要求统一思想；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是一种日常而自然的存在，而不是口号。

正是从这些真实、细碎的生活体验出发，我开始进一步了解美国的制度和价值。我逐渐意识到，美国之所以被称为自由、民主、包容、尊重人权的国家，并不是因为它没有问题，而是因为它允许问题被讨论，允许权力被质疑，个人不因观点不同而受到惩罚。

我曾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一个国家如果不允许公民讨论制度、批评执政党，那么它的“稳定”只是一种恐惧下的沉默；一个把政党等同于国家、把反对等同于犯罪的政权，本质上是独裁的。正是这些看法，给我带来了麻烦。

在中国，反对中共并不需要组织、行动或煽动。你只需要说出“中共不是中国”“权力需要制约”“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就被视为危险人物。我逐渐感受到来自环境的压力：谈话被打断、被警告、被“提醒注意立场”。那种无形却持续的压迫，让人清楚地知道——这里不欢迎独立思考的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你并不需要做错什么，只要你想得太多、说得太直，就已经站在风险之中。

中共所维护的并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自身的统治安全。它害怕自由讨论，因为自由会暴露谎言；它打压异议，因为真相会削弱权威。所谓的“稳定”，建立在监控、审查和恐惧之上；所谓的“爱国”，往往被简化为对政党的无条件服从。

当我发现继续留在中国，意味着要么沉默、要么自我否定、要么随时承担不可预知的后果时，我知道，我已经没有真正的选择。

来到美国，并不是因为这里没有问题，而是因为这里允许你承认问题、讨论问题、反对问题。在这里，说政府不等于犯罪，反对执政党不等于背叛国家，个人不需要把一生交给某个不可质疑的权力。

我离开中国，不是因为我憎恨中国这片土地，而是因为我拒绝把一生交给一个不允许我说真话的政权。如果一个国家需要用恐惧来维持忠诚，那它害怕的不是敌人，而是真相本身。

### *Punished for Words: Why I Was Forced to Leave China*

*This essay recounts the author's personal journey from political indifference to open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explains why he ultimately felt compelled to leave China. The author describes initially seeking a quiet life focused on work and family, avoiding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order to minimize risk. However, exposure to everyday experiences shared by family member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prompted deeper reflection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study,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a system that restricts open debate and equates criticism with disloyalty relies on fear rather than genuine stability. He states that in China, even peaceful expressions such as advocating checks on power 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arty and country can attract scrutiny and pressure. The text portrays this environment as one in which independent thought carries social and legal risk.*

*The decision to leave, the author argues, was not driven by hostility toward China as a nation, but by refusal to live under conditions that require silence or self-denial. He contrasts thi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e characterizes as a society where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is permitted and political disagreement is not treated as a crime. The essay frames departure as a choice for personal integrity and the freedom to speak openly without fear.*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守护孩子生命·追问校园真相

—— 洛杉矶第 773 次茉莉花行动抗议中共“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

作者：蔡晓丽

编辑：Gloria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2026年1月18日下午，由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河南省工委发起第773次“茉莉花行动”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前举行。来自中国民主党及多个公民团体的成员、家长与人权活动人士集结于此，以“守护孩子生命·追问校园真相”为主题，抗议中共长期存在、且愈发指向未成年人群体的系统性活体摘取器官反人类罪行。

此次行动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河南工委、青年部、影视部、西科维纳支部、山东工委联合举行，聚焦近一年内中国多起校园及青少年离奇死亡事件。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是：

死亡原因草率定性、抢救过程不透明、遗体被迅速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关键信息被封锁。

多起案件，指向同一结构性黑洞

2025年11月，云南昆明：两名青年被同时宣布“脑死亡”，却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约30台器官移植手术，速度与规模严重违背医学常识。

2025年12月，安徽亳州蒙城：一名学生课间摔倒休克，校方长达16分钟未实施有效急救，最终脑死亡，责任无人追究。

2026年1月，河南驻马店新蔡县：13岁男童校内离奇死亡，遗体被私自转移，家属维权遭打压，孩子姑父至今下落不明。

当校园与医院不再安全，当“脑死亡”成为快捷结论，当器官去向无法被独立核查，公众无法不再次追问——这些孩子，究竟死于意外，还是死于制度？

### 现场发言记录：

**林养正：**从教育体制切入，指出中共校园早已异化为压迫、服从与筛选的系统，并明确将校园死亡与活摘器官问题联系起来。他提出面向家长的“三个拒绝”：拒绝体制教育、拒绝抽血体检、拒绝官方叙事，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保护孩子。“这比奥斯维辛更邪恶，却发生在21世纪的中国。”

**刘芳：**讲述了自己从“完全不知情”到直面真相的过程。她指出，在一个能精准监控公民行踪的国家里，孩子却可以在校园中“无记录地死亡”。“这不是科学奇迹，是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监控一切，却‘无力’保护孩子，那问题出在体制本身。”



**康余：**系统性指出，中国存在制度化强制器官移植的问题，且证据正越来越多地指向未成年人。“器官不是商品，生命不是资源。儿童不是实验对象，更不是器官储备库。没有问责，就不会停止。”他呼吁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展开独立国际调查。

**张宇：**他表示，自己来到美国并不被家人理解，但正是因为见过太多医疗体系中的异常，才无法保持沉默。她提到五个月大的婴儿“洛熙”在无明确手术指征的情况下被实施心脏手术，最终死亡，尸检显示体内伤口未缝合。“洛熙在人世间的时间，甚至没有在妈妈肚子里的时间长。再看看这些正值花季却成为别人器官库的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感到万分痛心。我站在这里，是为国内所有孩子发声。”

**黄娟：**她指出，在全国布满摄像头、对人民高度监控的国家里，学生死亡事件中监控却频频“损坏”或“消失”。她强调，所谓“免费抽血体检”并非福利，而是器官筛选。“我们不能成为下一个失踪的人。我坚决反对活摘器官，反对迫害青少年儿童，习近平独裁下台。”

**卓浩然：**他强调，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产业已将黑手伸向未成年人。“器官捐献必须自愿、透明、有人权保障。任何强迫、诱导、买卖，都是犯罪！”

**朱晓娜：**她以母亲身份发言，系统回顾三起案件，直指“脑死亡”被滥用、遗体被迅速转运的危险模式。

“当校园不再安全，当医院不再值得信任，这个社会，还有哪里是孩子可以立身的地方？”

她明确提出四项诉求：独立调查、信息公开、保障家属权利、立即停止并追责活摘器官罪行。

**胡景：**回顾江西胡鑫宇案、武汉学生失踪案，以及早年在香港看到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揭露资料。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到我们自己身上。正因为身处自由世界，我们才更有责任站出来揭示真相。”

### 同日联动：旧金山湾区同步行动

除洛杉矶主场行动外，美国旧金山湾区当日亦举行了主题一致的抗议活动。

本次旧金山湾区行动由李海风、张勇策划，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各地民主人权团体已就“校园安全”“青少年生命权”与“活摘器官”问题形成持续、跨城市的联合行动。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被通知死亡，妈妈，不是我不想继续长大，只是我恰好血型适配。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能再回家，妈妈，不是我忘记了回家的路，只是我的某个器官被它们需要。再见妈妈，如果有来生，我依然选择做你的孩子，只是，我希望我们不再被当作物料。”这些文字，成为对中共将儿童与青少年视为“器官资源”的最直接控诉。

### 海外联动：欧洲同步响应，抗议走向国际

与此同时，本次声援与抗议行动并非仅限于美国。由新蔡县旅欧异议人士杨肖杰响应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呼吁，多名旅欧华人与欧洲民主人士当日在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前举行同步抗议活动。参与者以静默悼念与举牌抗议的方式，公开谴责中共非法器官移植、信息封锁与独裁统治。

集会现场明确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器官掠夺行为，并就河南新蔡县“今是清华园”一名未成年人死亡事件接受独立、国际调查。参与者指出，一个依靠删帖、封锁与警力维稳来掩盖真相的政权，本身就已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当真相需要跨国发声，恰恰说明体制内部早已失去自我纠错的可能。

这场由中国民主党河南工委在洛杉矶发起，旧金山、德国响应的抗议，不只是为已经失去生命的孩子，更是为那些仍然活着、却身处危险之中的孩子。

本次行动由：陈恩得、赵杰、朱晓娜、高晗、林养正发起，赵杰、陈恩得策划，蔡晓丽统筹，赵杰、朱晓娜主持，林小龙摄影，马群摄像，陈恩得网络直播，高晗、陈信男、康余维持现场秩序，郑洲、王府负责物料，倪世成、卓皓然活动现场负责人。

## Guarding Children's Lives: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in Los Angeles Protests Alleged Organ Harvesting

On January 18, 2026,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affiliated civic groups gathere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for the 773rd Jasmine Action. Organized by the Henan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National Committee, the protest carried the theme *Guarding Children's Lives and Seeking Truth in Campus Deaths*. Participants included activists, parent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who expressed concern over recent student deaths in China and alleged systemic abuses within the organ transplant system.

Speakers referenced several cases from late 2025 and early 2026, including student deaths in Kunming, Mengcheng, and Xincui. According to organizers, these cases shared common features such as rapid official conclusions, limited transparency regarding medical procedures, restricted access to evidence, and reported pressure on families seeking answers. Protesters argued that these patterns warranted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and greater public accountability.

Several speakers linked broader concerns about campus safety, medical transparency, and alleged organ procurement practices. They questioned the use of brain death determinations, the speed of organ transplant procedures in certain cases, and the lack of publicly verifiable data. Calls were made for international oversight of China's transplant system, protection of families' rights, and guarantees of due process in cases involving minors.

Organizers emphasized nonviolent advocacy, urging parents to remain vigilant regarding medical procedures and to demand transparency. Participants described the protest as part of a continuing campaign to highlight what they view as systemic risks to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arallel events were reportedly held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d in front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Frankfurt, Germany, indicating cross-c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mong activists.

The demonstration concluded with symbolic statements expressing solidarity with affected families and demanding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into contested cases. Organizers framed the action not only as a memorial for deceased children but also as a broader appeal for transparency, human rights prote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accountabili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声援伊朗人民反抗暴政

—— 揭露中共专制输出的全球危害

《在野党》记者 缪青 旧金山报道

编辑：钟然 责任编辑：胡丽莉 校对：程筱筱 翻译：彭小梅

2026年1月17日下午，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公开抗议集会，声援伊朗人民持续进行的反政府抗争，并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在伊朗镇压民众过程中所扮演的“专制技术后台”角色。

此次集会以“声援伊朗人民自由抗争，声讨邪恶后台独裁中共”为主题。参与者在旧金山中共领馆门外集结，手举中英文标语，高呼“Free Iran”“Azadi! Azadi! Azadi!”以及“Take Down CCP”“Take Down Khamenei”等口号，明确将伊朗神权体制的血腥镇压，与中共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专制治理模式联系起来。

**伊朗抗议浪潮：长期压迫下的再次爆发**

自2025年末以来，伊朗多地再度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表面诱因各异，但根本原因高度一致：长期的政治高压、经济濒临崩溃、青年失业率高企、女性与少数民族遭受系统性歧视，以及对言论、信仰和人身自由的全面剥夺。

伊朗当局延续其数十年来的治理模式，以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和准军事力量直接介入镇压，动用实弹、夜间抓捕、酷刑审讯、快速审判乃至死刑威胁来压制社会反抗。同时，多次实施全国性断网与通讯封锁，试图切断信息传播链条，掩盖镇压规模与真实伤亡情况。

多家国际人权组织指出，伊朗的镇压并非临时应对，而是高度制度化的国家暴力，其核心目的不是“恢复秩序”，而是通过制造恐惧维持政权生存。这种逻辑，正是当代威权专制体制的共同特征。

**中共的“不可见之手”：威权合作的现实样本**

多位发言者在现场强调，伊朗政权的残酷统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一个跨国威权合作网络之中。在这一网络里，中共正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近年来，中共不仅向外输出资本与基础设施，更系统地输出一整套“高科技镇压方案”包括监控体系、网络审查、信息封锁、数据追踪与社会控制模型。这些技术与经验，已在伊朗得到现实应用，使镇压更精准、更高效，也更难被外界察觉。

**缪青：专制正在合流，自由必须结盟**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宣传部副部长、《在野党》旧金山记者站站长缪青先生在集会上发表发言指出，声援伊朗人民并非地缘政治立场选择，而是基本价值判断。



他强调，伊朗的高压统治不是孤立的国内问题，而是全球专制合流的一个前线案例。“在伊朗神权政权背后，已经清楚地出现了一个邪恶后台：中国共产党政权。”缪青指出，中共不仅在国内系统性镇压人民，也正在将监控、维稳与恐惧治理的模式输出到世界各地。

缪青表示，作为亲身经历中共极权、并因此被迫流亡的人，中国民主人士有责任对国际社会讲清楚一个事实：今天如果对伊朗人民的血腥镇压保持沉默，明天就无法阻止专制政权之间继续相互扶持、相互复制。

“专制政权彼此声援，自由的人就更必须彼此站在一起。”他说，“沉默不是中立，沉默是在为邪恶让路。”

**陈森锋：镇压技术输出必须被清算**

中国民主党党员陈森锋先生在发言中，系统梳理了中共介入伊朗镇压的多项公开事实。

他指出，多方国际媒体、人权组织与情报来源已经披露：中国制造的监控与人脸识别设备，被广泛部署于伊朗街头，用于识别、追踪和抓捕抗议者；中资安防企业被指直接向伊朗军警及革命卫队提供监控系统；疑似中国来源的军用或军民两用物资，在运往伊朗途中被美方拦截；伊朗在全国断网、干扰卫星通讯期间，使用的复杂电子战与信号干扰技术，被专家怀疑来自中俄支持；中共官方在外交与舆论层面，持续为伊朗镇压行为辩护或保持纵容立场。

他强调，任何向独裁政权提供武器、监控技术与镇压工具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罪行，必须被追责清算。

**何聪：让真相突破断网与封锁**

中国民主党党员何聪先生在发言中，呼吁公众利用

自媒体与社交平台传播伊朗正在发生的暴行。他指出，伊朗当局切断网络，正是为了阻止世界看到真相。

“我们每一个看到伊朗屠杀人民消息的人，都应该转发出去。”何聪说，“只要坚持，量变一定会产生质变。压死骆驼的稻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丢上去的那一根。”

### 卫仁喜：这不是骚乱，而是国家暴力

中国民主党党员卫仁喜先生指出，今天伊朗发生的不是“骚乱”，而是国家对人民的系统性暴力。断网、夜间抓人、当街开枪、快速审判与重刑威慑，清楚表明政权已丧失通过合法性治理社会的能力。

他强调，伊朗并不孤立，而是处于一个以镇压人民为共同特征的“威权轴心”之中，而中共在外交、经济与技术层面的长期支持，客观上增强了伊朗政权的镇压能力。

### 孙诚：伊朗神权政权是成熟的反人类体系

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诚先生在发言中，从历史纵深系统揭露了伊朗神权政权的反人类本质。他指出，自1979年夺权以来，该政权通过大规模处决政治犯、系统性谋杀异议知识分子、残酷镇压女性与宗教少数群体，建立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暴力统治体系。

孙诚回顾，1988年伊朗当局曾一次性处决约三万名政治犯；在此后数十年中，多次民主抗议浪潮均遭血腥镇压。近年来，伊朗更与中共、普京集团深度捆绑，构成新的威权轴心，在中东、欧洲与亚洲多地制造战争、恐怖与人权灾难。

他强调，伊朗对基督徒、巴哈伊教徒、逊尼派穆斯林以及性少数群体的迫害，已经构成持续性的反人类罪行，而这种政权之所以得以存续，正是因为获得了威权盟友的现实支持。

### 结语：自由的敌人正在结盟，自由的人必须如此

集会最后，与会者再次高呼“Azadi! Azadi! Azadi!”这一伊朗民主运动的象征性口号。主办方表示，此次行动不仅是对伊朗人民的声援，更是对全球威权合流趋势的公开警告。

当独裁者跨越国界、共享镇压经验时，自由世界若继续沉默与妥协，代价将由无数普通人承担。

枪口或许可以暂时压制愤怒，但永远无法消灭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任何建立在恐惧之上的秩序，终将崩塌。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方政，缪青，崔允星，孙诚，庄帆，李树青，陈森峰，高应芬，卫仁喜，卢占强，蒋书清，国盼，陈光升，何聪，马力，唐奇，吴志创，刘玉（排名不分先后）

## Supporting the Iranian People and Exposing Authoritarian Collaboration

On January 17, 2026,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chapter and the Chinese Democratic Education Foundation held a protest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The gathering expressed solidarity with ongoing anti government demonstrations in Iran and criticized what participants described as the export of 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models. Protesters carried bilingual signs and chanted slogans such as Free Iran and Azadi, linking domestic repression in Iran with broader concerns about transnational cooperation among authoritarian states.

Speakers described renewed protests in Iran since late 2025, citing economic strain, political restrictions, discrimination, and limit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y characterized the Iranian government response as involving arrests, forceful crowd control, internet shutdowns, and legal action against demonstrators. Participants argued that such measures reflect a structured system of maintaining control through surveillance and deterrence.

Several speakers alleged that Chinese technology and expertise have strengthened repressive capacity in Iran. They referenced public reports about the global export of monitoring equipment,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s, and digital control infrastructure.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s, these tools can enable more precise tracking of activists and suppression of dissent. They framed this cooperation as part of an emerging pattern in which governments share strategies for censorship, data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One speaker emphasized that supporting Iranian protesters is rooted in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human rights and accountability rather than geopolitical alignment. Another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sharing verified information online to counter communication blackouts, arguing that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can reduce impunity. Additional remarks focused on historical episodes of repression in Iran and called for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abuses.

Organizers presented the protest as an effort to connect struggles for civil liberties across borders. They asserted that when governments collaborate in restricting freedoms, citizens and advocacy groups must also cooperate in defending them. The event concluded with chants of Azadi, symbolizing solidarity with those seeking political reform in Iran. Participants stated that sustained public attention and open discussion are essential to promoting transparency and safeguarding fundamental right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断头台前的呐喊

—— 洛杉矶六四纪念馆挺港集会纪实

作者：赵文龙

编辑：胡丽莉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8日，南加州的暖阳并未能驱散全球民主志士心中的严寒。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内，一场名为“释放李卓人、邹幸彤，还香港自由”的集会在此庄严举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民主接力，更是一次对中共极权暴政的沉痛控诉。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精神，在太平洋彼岸再次点燃。

## 一、维园烛光的火种，在洛杉矶复燃

曾几何时，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是全球反抗中共暴政、纪念六四英灵的灯塔。然而，随着中共悍然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那个曾经的自由港已沦为极权的殖民地。支联会——这个坚持了三十余年的民主堡垒——被非法解散，其核心领导层李卓人、邹幸彤等人更是身陷囹圄，遭受政治迫害。

今日，洛杉矶六四纪念馆的墙壁上挂满了历史的见证。集会现场，投影幕布上清晰地写着：“反对任意拘禁！”“释放李卓人！”“释放邹幸彤！”这些字句在昏暗的馆内熠熠生辉，像是从香江彼岸传来的嘶吼。

## 二、民主先贤齐聚：正义的共振

此次集会汇聚了海外最具影响力的民主运动领袖，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对香港同胞的声援，更是对中共极权统治的深度解构。

**王丹：**作为八九学运的象征，他深情谈到，香港的命运与三十多年前的天安门如出一辙。中共对李卓人、邹幸彤的审判，本质上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的审判。

**袁弓夷 (Elmer Yuen)：**这位著名的香港实业家、社会运动家，在现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袁先生直言，中共对香港的赤化是其全球渗透战略的关键一环。他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关注人权，更要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全面反击。集会期间，我有幸与袁先生合影，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位长者对民主事业的赤诚。

**郑存柱与中国民主党志士：**郑存柱先生率领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他指出，香港的民主斗争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密不可分，只要中共政权不倒，类似的悲剧就会在华夏大地不断重演。我也与郑先生及多位民主党同仁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象征着海内外反共势力的团结一致。

**方政：**坐在轮椅上的六四见证者方政，用他那坚定而略带沙哑的声音提醒世人：极权的坦克可以碾碎双腿，但永远无法碾碎追求自由的意志。

## 三、批判中共：制度性的流氓与历史的罪人



我们必须看清，中共对李卓人和邹幸彤的迫害，绝非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是一场赤裸裸的制度性绑架。

首先，中共利用所谓的“国安法”实现了法律的工具化与武器化。在文明世界，法律是保护公民自由的盾牌；而在中共治下，法律是阉割异见者的利刃。邹幸彤作为一名律师，她所捍卫的正是法治的尊严，而中共恰恰因为她懂法、守法、用法，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其次，中共的暴政根源在于其深刻的权力焦虑。一个号称“大国崛起”的政权，竟然害怕一名女性手中的蜡烛，害怕一个工会领袖的呐喊。这种极度的不自信，反映了其统治合法性的全面崩塌。他们试图通过抓捕李卓人来切断香港与国际工运的联系，通过禁锢邹幸彤来抹除香港人的历史记忆，但这种做法无异于扬汤止沸。

## 四、结语：在野的呐喊，必将化为执政的惊雷

李卓人在狱中曾言：“坐牢是抗争的一部分。”邹幸彤亦在法庭上坚称：“自由不需要恩赐。”

作为《在野党》杂志的忠实读者，我深知：今日在洛杉矶的集会，是为了明天在天安门、在香港礼宾府的重聚。我们记录每一个受难者的名字，批判每一个独裁者的罪行，是为了在历史的审判席上，让正义不再迟到。

中共以为高墙能阻断自由的传播，却不知高墙之内的呐喊，早已跨越山海，在每一个向往自由的心灵中回荡。李卓人、邹幸彤，你们并不孤单。全人类的良知，正与你们并肩作战。

## 作者评论：

洛杉矶的这场火种，正是中共最深重的梦魇。当海内外民主力量合流，当“六四精神”与“香江风骨”交汇，那个腐朽的独裁体制，终将在自由的洪流中土崩瓦解。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2026 藏历新年市集 · 藏人良心犯迫害实录

作者：关永杰  
编辑：胡丽莉 责任编辑：钟然 校对：程筱筱 翻译：戈冰

2026年1月18日，在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举办的藏历新年市集中，华语青年挺藏会设立摊位，举办“为藏人政治犯写明信片”活动，呼吁外界关注仍被关押的藏人良心犯处境，并持续关注此前被中共当局逮捕的华语青年挺藏会成员张雅笛。这是该会第二年以此形式表达对藏人追求自由的支持，在去年已经整理出来的20位良心犯资料的基础上，在多方支持与协助下，今年他们新增整理了10位藏人良心犯的简历和案情资料：



1、西绕·降央列谢 (Sherab Jamyang Lekshey)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僧人，色达县叶纳寺 (Yena Monastery) 住持。因反对金沙江“岗托水电站”项目而参与请愿活动，2024年2月遭抓捕。

2、贡布次仁 (Gonpo Tsering)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僧人，叶纳寺行政负责 (Administrator)。同样因反对金沙江“岗托水电站”项目而参与请愿活动，2024年2月遭抓捕。

3、泽嘎嘉措 (Zega Gyatso)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僧人，僧侣及宗教教师。2025年7月2日被捕，被指控“向境外汇款”等未明确说明的罪名。

4、岗·次仁卓玛 (Gang Tsering Drolma) 四川甘孜州色达县大则乡岗扎村藏族作家、人权与教育倡导者。长期从事藏语写作、文化保护与社会活动，被指控“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

5、果·喜绕嘉措 (Go Sherab Gyatso, 别名：果喜 Goshe) 四川阿坝州阿坝县僧人，果喜寺 (Goshe Monastery) 年轻而有影响力的学者型僧侣，长期致力于佛学与藏族文化传播。曾多次因拒绝“爱国再教育”、出版著作及言论而遭拘押，2021年3月在拉萨被捕，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6、岗布优顿 (Gangbu Yudrum) 四川甘孜州色达县然充乡僧人、作家与文化活动人士。长期致力于藏族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参与非暴力社会活动。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有期徒刑7年。

7、岗吉·卓巴杰 (Gangkyi Drupa Kyab) 四川甘孜州德格县人，作家、艺术家，曾任私立学校教师。2013年起因文学创作与公共表达多次遭到拘押。2015年、2021年先后被捕，最终被指控“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判处有期徒刑14年。

8、桑珠 (Samdu) 四川甘孜州色达县藏族作家、

社会活动人士。长期关注藏族语言、教育及社会问题。2012年起多次被捕，曾因“分裂国家罪”服刑5年，获释后再次遭拘押。2021年4月再次被捕，最终被判有期徒刑8年，另加剥夺政治权利2年。

9、赛朗 (Seynam) 四川甘孜州色达县然充乡藏人，长期参与藏族教育与环境保护活动。2022年因组织健康与环保相关的社区活动被拘押。随后被指控“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10、阿亚桑扎 (Anya Sengdra) 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牧民、环保与反腐败活动人士。2014年起发起“曼珠林 (Mangzhul)”组织，揭露非法采矿和腐败问题，多次被捕。

这十位藏人均因非暴力表达、宗教活动、文化保护或社会倡议而被以“分裂国家”“危害国家安全”“非法集会”等模糊罪名判刑或羁押，关押地点主要集中在四川、青海和西藏自治区的监狱系统。多位当事人在羁押期间被报告遭受酷刑、健康恶化或与外界隔绝。

本次活动由华语青年挺藏会发起，组织者包括一名匿名工作人员，以及Pema、段荆棘、小翠、卢克等人，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族裔和背景的民众参与。

活跃于湾区的民主运动人士罗艳丽亦担任义工，与现场民众一同向藏人政治犯书写明信片，表达声援与关怀。

多位中国民主党成员到场支持。董新展在为藏人政治犯写下明信片的同时，也参与并支持了北加州藏人文化中心的义卖活动。

李栩则携带自制标语，在市集现场高举展示，表达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与人权的支持。

此外，周云龙、陈志军携家人一同前来。周云龙表

示，他特意带着孩子来参加活动，是希望下一代能够了解，在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之下，人民如何失去自由，而敢于抗争的人又是如何被囚禁和迫害的。

胡丕政、吴志创、高俊影、周忠玉等多位中国民主党成员也陆续到场，以实际行动声援藏人政治犯及相关人权议题。

活动现场，不同族裔的参与者在摊位前驻足书写明信片。在美国的大陆人、香港人、西藏人以及维吾尔人，尽管语言、文化及经历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处境，都是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中共政权的压迫。对参与者而言，这些寄往监狱系统的明信片，或许无法立刻改变良心犯的处境，但这种对具体个体的关怀，是跨族群之间的相互确认，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并不孤单，这些来自海外的关怀，是在提醒外界：那些因表达、信仰与良知而被囚禁的人，并未被世界遗忘。



## 2026 Losar Market: Raising Awareness for Tibetan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On January 18, 2026, during a Losar New Year market at the Tibetan Cultural Center of Northern California, members of the Chinese Youth Support Tibet Association organized a postcard writing campaign to highlight the cases of imprisoned Tibetan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is marked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the group held such an activity. Expanding on twenty previously documented cases, organizers presented profiles of ten additional Tibetan individuals who are currently detained or serving prison terms.

Those profiled include monks, writers, teachers, environmental advocates, and community organizers from Sichuan and Qinghai. Several were detained after participating in peaceful petitions oppos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uch as the Gangtuo hydropower project along the Jinsha River. Others were charged with offenses including splittism, endangering state security, or illegal assembly following activities connected to religious practice, cultural preservation, language advocacy,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some cases, individuals reportedly refused patriotic re-education campaigns or published writings focused on Tibetan identity and social concerns. Sentences range from several years to more than a decade in priso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have reported concerns about deteriorating health, limited family contact, and possible mistreatment during detention.

The campaign was organized by volunteers including Pema, Duan Jingji, Xiao Cui, Luke, and an anonymous staff member. Participant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wrote postcards addressed to detained individuals, expressing solidarity and concern. Bay Area democracy advocate Luo Yanli volunteered at the booth, and several members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ttended in support. Some participants also contributed to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t the cultural center.

Parents described bringing their children to the ev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discus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human rights. Organizers emphasized that while postcards cannot alter court decisions, they serve as reminders that detainees are not forgotten. Participants noted shared experiences among mainland Chinese, Hong Kongers, Tibetans, and Uyghurs regarding political pressure and limits on expression.

The event framed cross-community engagement as sustained moral recognition and documentation. Organizers argued that continued awareness and solidarity are essential to supporting individuals imprisoned for peaceful express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从铁饭碗到自由之路

——一位觉醒的共产党员的心灵重生

作者：Yongjie Guan  
编辑：韩立华

在中国大陆，有“编制”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据网上流传的数据，自2009年以来，每年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数始终在百万以上，2024年更突破340万。就在这样一个人人争抢稳定福利与体制庇护的年代，却有人自愿放弃这个铁饭碗，即使远赴他乡只能端盘子、洗碗，也要离开那个让她窒息的国度。

这个人，就是今天的受访者——高应芬（以下称“小高”）。

## 一、信仰与恐惧的童年：被惊醒的平静

小高199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近郊一座小城市，父母皆是普通工人，但虔诚信仰基督。她的童年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在2022年她实在无法再忍受中共政府的过度疫情防控措施，又一次向母亲倾诉有逃离中国的念头时，母亲在惶恐不安中告诉她一个情景：在她5岁那年，一家三口在一次家庭教会聚会时，数名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她在慌乱中被推倒在装满松香（用来给动物脱毛的东西）的锅里被烫伤，母亲跪地哀求才换取带孩子离去的机会，而父亲则被带走。约一周后，父亲被释放，但已满身伤痕。本就体弱的父亲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因病离世。

那一次交谈后小高才醒悟，她身上的伤疤原来是来自那一次的伤害。其实母亲不支持她离开中国并非不是不知道中共的坏，恰恰相反，她是深知中共的毫无底线，所以即使在丈夫离世家庭遭遇巨大变故后，仍以沉默、坚忍的方式维持生活，就是怕中共再次伤害家人。

## 二、进入大学：跟着潮流入党，却悄悄接触真实世界

2016年，小高进入武汉一所大学就读。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相信“入党有利于找工作”，于是大一便递交了入党申请。

互联网的普及让她第一次接触到墙外资讯，班上不少同学会“翻墙”，分享与官方叙事完全不同的信息。面对这些资讯，小高多选择沉默——她不敢多问，也无法分辨真假。那时的她仍相信：只要努力学习，热爱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

直到2019年底，噩梦不期而至。

## 三、世界崩塌：她在武汉见证了疫情真相被掩埋



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最早在武汉无声蔓延。本应第一时间让民众知情的真相被政府刻意压下，吹哨的医生被训诫，疫情初期官方为了维稳仍在筹办春节盛会，人群聚集加速了病毒的扩散。

而小高，就是在这场世纪风暴的风眼中。她记得那座城市突然变成了牢笼：小区大门被焊死；食物供应极度短缺，劣质菜高价出售；感染者无数，但求医无门；火葬场日夜冒着白烟；网上哀号与求救贴文不断被删除……而大肆宣扬的却是各种又假又空令人恶心的正能量。

她说：“那时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原来生命在体制面前可以这么微不足道。”她开始对自己加入的共产党感到深深懊悔，也第一次彻底怀疑自己曾相信的一切。

## 四、成为老师：希望靠教育改变下一代，却再次碰壁

2021年，小高大学毕业。疫情稍缓，中国暂时恢复生机，人们开始“好了伤疤忘了痛”。

为照顾因肾衰竭而住院的外婆，她回到家乡生活，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公办小学教师编制——那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

但她成为老师，并非为稳定，而是因为心中那个渺小却坚定的愿望：“如果不能改变国家，那至少能让几个孩子学会思考。”

她在课堂里悄悄穿插一些启发思辨的内容，希望学生能保持天性，而非只接纳标准答案、从小学习仇恨。然而，一次授课被巡堂的校长听见，随即被叫到办公室严厉训斥。

慢慢地她还发现，学校的教育是泯灭学生童真的，是鼓励告密的。即使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也与官场一样，遇事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她终于认清了现实：“我不是在教书，而是被要求参与再生产一代顺从听话的机器。”

学校的极端防疫、僵化管理、奴化教育、仇恨灌输，都让她感到无比的恐惧。那一刻，铁饭碗在她眼里已不再是安定的标志，而是一件牢笼里的餐具。

## 五、选择离开：扔掉铁饭碗，换取呼吸自由的权利

尽管不舍母亲，小高仍毅然决定离开。

2024年，她抵达美国。刚落地时，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使是端盘子洗碗，也比在中国当个被体制控制的老师自由。”

初到异乡的她努力适应新生活。她说，虽然辛苦，但却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完整的人”。“或许，这里才是我应该生长的土壤。”在美国，她能自由阅读、思考、发声，再也不用担心谁在背后监听。

## 六、走向公共行动：为还在墙内的人发声

为解救大洋彼岸那些被中共奴役着的中国人民，2025年4月，小高加入了中国民主党，积极投入旧金山华人的民主运动。

她参与集会、声援被迫害者、揭露中共谎言、向国内传播真相。“我已经离开了，但中国还有太多人还被牢笼困住。”她说：“哪怕只能唤醒一个人，也算有意义。”

## 七、对未来的展望：年轻一代的担当

小高感言：中国政府的种种暴行让无数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渴望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国家，拥有属于自己的信仰与思想。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我深知一党专政体制弊端重重，我们这一代必须站出来——去发声、去抗议、去推动改变。在中国，我们面对腐败的专制与错误的政策往往无法发声，更遑论采取行动；但在美国，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未来我们仍将继续努力，积极行动，希望这些努力能够促成一些改变、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愿有一天，自由之光能照遍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 From the "Iron Rice Bowl" to the Road of Freedom: The Spiritual Rebirth of an Awakened CCP Member

*This profile traces the journey of Gao Yingfen, born in 1997 near Wuhan, who moved from seeking stability with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pursuing freedom abroad. In mainland China, a state funded position is often called the iron rice bowl, symbolizing security and long term protection under the system. Yet Gao chose to abandon that path, even knowing that life overseas might mean modest work and uncertainty, because she could no longer accept the political and moral constraints imposed on her.*

*Gao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shaped by both faith and fear. As a child, she was injured during a police raid on a house church gathering, and her father was detained. The experience left emotional and physical scars. For years, her mother avoided discussing the incident, believing that silence was necessary for survival. Only later did Gao fully understand how repression had shaped her family's choices and caution.*

*In 2016, Gao entered university in Wuhan. Like many students, she applied to join the CCP, believing it would improve her employment prospects. At the same time, access to information beyond official narratives gradually exposed her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he remained cautious and avoided open debate. The turning point came during the COVID 19 outbreak in Wuhan. Gao witnessed early warnings suppressed, strict lockdown measures imposed, and widespread fear and uncertainty. She recalls shortages, restricted medical access, and online appeals disappearing. The gap between official messaging and lived reality forced her to reassess her beliefs.*

*After graduation, she returned home to care for her ill grandmother and passed examinations to become a public primary school teacher. She hoped education could nurture independent thinking. However, efforts to encourage discussion based learning were discouraged by school leadership. Over time, she concluded that conformity and political discipline were prioritized over critical inquiry. The iron rice bowl, once seen as security, began to feel like confinement.*

*In 2024, Gao left China for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life became materially harder, she describes feeling psychologically whole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25, she joined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began participating in civic activities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Gao states that even one awakened voice can matter, and she hopes sustained civic engagement will help more people pursue dignity, conscience, and freedo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流亡中的守望者

——自由精神的延续与重生

文 / 陆乾坤《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 一、历史背景：自由的流亡与重生

### I. Historical Context: Exile and the Rebirth of Freedom

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香港经历了其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转折之一。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香港原有的法治体系、言论自由与政治空间遭到系统性压缩。新闻机构被迫关闭，公民社会组织相继解散，大批民主人士被逮捕、监禁或被迫流亡海外。曾经被视为亚洲自由灯塔的香港，迅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高度控制下的地区，其长期建立的制度信任与社会基础遭遇严重冲击。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大批香港人离开家园，前往英国、美国、加拿大及其他自由国家寻求庇护。他们的离开，并非出于对故土的放弃，而是为了保存自由的火种。在流亡过程中，他们不仅是政治压迫的承受者，更成为自由理念的传播者与守护者。他们将香港的历史经验、制度记忆与自由传统带入新的土地，使香港的精神得以延续。

美国香港人会馆（US HongKongers Club）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海外香港人组织之一。它的出现，标志着香港民主运动从本土抗争阶段，进入海外延续与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不仅是一个社区组织的诞生，更是自由精神在流亡中的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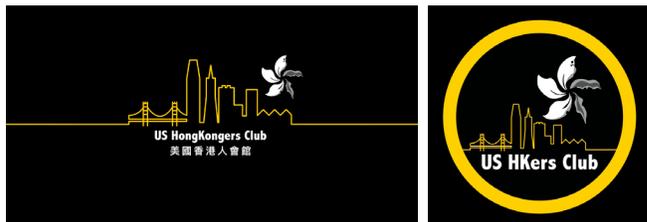
## 二、组织性质与成员构成

### II.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Membership

美国香港人会馆是一个由在美香港人自发组成的社区与民主倡议组织，其成员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与专业领域，包括曾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社会人士、青年学生与学者、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从业者以及社区志愿者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海外香港人群体。

该组织采取开放与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以增强安全性与持续性。这种集体领导模式，是当代流亡民主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极权体制试图通过压制个体来削弱组织力量的情况下，去中心化的结构反而增强了组织的韧性，使自由理念能够在不同个体之间持续传播。

美国香港人会馆不仅是一个社区联络平台，更是海外香港人政治认同的重要体现。它为流亡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空间，使他们能够继续表达对自由与法治的信念，并维持对香港未来的历史责任。



## 三、主要活动与历史使命

### III. Major Activities and Historical Mission

美国香港人会馆长期致力于推动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其活动涵盖多个层面，包括组织公开集会、举办纪念活动、参与公共讨论以及推动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问题。

通过公开集会与纪念活动，他们保存了香港民主运动的重要历史记忆，使这些历史不因政治压制而被遗忘。他们通过社区活动加强海外香港人的联系，使流亡者不至于陷入孤立，而是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意识的群体。

在美国洛杉矶、旧金山等城市，美国香港人会馆成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和平方式表达对自由价值的坚持。他们的存在，使香港问题继续出现在国际社会的视野之中，使世界了解香港所经历的制度转变及其深远影响。

这些活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历史意义。在极权试图通过控制叙事来重塑历史的时代，保存真实记忆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行为。

## 四、流亡共同体的历史意义

### IV.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xile Community

历史反复证明，自由理念无法被彻底消灭。当自由在本土受到压制时，它往往转移至海外，在流亡中继续存在。

二十世纪的东欧民主运动、苏联时期的流亡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极权体制下的民主力量，都曾在海外保存自由的传统，并最终对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香港人会馆正是这一历史传统在当代的体现。他们代表着香港人民对自由的坚持，代表着对极权统治的不屈抗争，也代表着对来自自由社会的历史承诺。

他们的存在，使香港的自由精神得以延续，使历史记忆不被抹去，使未来仍然保有改变的可能。

## 五、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共同历史使命

### V. Shared Historical Mission with the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香港的自由命运，与中国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香港长期以来作为华人社会中自由与法治的重要象征，其制度经验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民主党始终认为，中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自由、法治与宪政的基础之上。只有当中国实现制度转型，建立民主宪政体制，香港的自由传统才能真正得到制度性保障。

美国香港人会馆与中国民主党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形成，但在历史使命上具有共同目标，即推动自由理念的发展，并为未来社会的制度进步积累力量。

海外民主力量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将成为推动未来历史变革的重要因素。

## 六、历史的见证者与未来的参与者

### VI. Witnesses of History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Future

流亡不是终点，而是自由历史的延续。

美国香港人会馆的存在，证明了自由不会因压迫而消失，而会在新的土地上继续存在与发展。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参与者。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方向的。当制度发生转变时，那些在困难时期坚持信念的人，将成为未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香港人会馆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人类对自由的永恒追求。

他们的努力，将成为自由历史的一部分。

他们的名字，将属于未来。

请关注推特：美国香港人会馆@USHKersClub  
Facebook: USHongKongersClub



# 王炳章：让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

— 浙江、山东民运组党的感想之二

编辑：冯仍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浙江的响雷，山东的曙光，使国内公开层面的民运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筹组公开反对党的高度。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在孕育之中。

在专制制度下，催生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注意：不是秘密层面的反对党，此问题以后讨论），需要客观和主观的很多条件。这里，我只想谈谈主观因素，即我们民运自身可以掌控的因素。主观因素，包括勇气和策略等。

上一篇文章中，我主要谈的是勇气。我始终坚持，勇气为第一要素，勇气为开路先锋。在当前，勇敢是最大的道德体现。试想，当人们通通勇敢地走向牢房的时候，再专制的牢房都会被踏平，牢房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问题是，有勇气的人，并不是很多。这就涉及到避免或减少镇压损失、让胆量不是那么大的人士也能参与，争取中间人士的同情、争取舆论的支持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策略问题。

只有勇，没用谋，是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只会谋，缺少勇，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两种倾向都要避免。

策略是桥和船，是抵达彼岸不可或缺的工具。毛泽东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话有道理，不可因人废言。讲起毛，可能大家还记得四六年的重庆谈判。毛到了重庆，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三民主义万岁，俯首称臣，做了一场漂亮的“政治秀”。这是什么？这是策略。毛泽东打江山的一些策略，是成功的。舍之，到不了彼岸，达不成政治目标。

策略之所以运用，乃为绕过礁石，达到彼岸；策略的原则，是削弱对手，壮大自己，争取群众；策略的生命，在于其灵活性。船为绕过礁石，有时必须采取迂回；为了避开浪头，甚至走段回头路。关键是灵活二字。

我们的口号是，让勇气与道义使魔鬼退却；让战略与策略使魔鬼迷惑。

这次，浙江和山东的民运朋友们，在组党过程中的策略表现如何呢？我说，很好。我从天时、地利、人和等角度分析一下。

**天时：**时间是可以基本由自己掌握的。浙江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举事；山东选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夫人访华前夕响应。两个时间都不错。此时，中共一时不好抓，要给客人一个面子。几天之后，舆论已经造大，也难以下手。下了手，克林顿、

罗宾森肯定要表态，中共后患无穷。

**地利：**浙江和山东都是民运力量比较雄厚的地方。

**人和：**浙江、山东的民运人士比较团结，心齐。除此之外，人员的分线安排也很有策略，第一线冲出来公开注册，第二线预备，第三、四线人员做后援和后勤。

**提法：**浙江明确表示尊重中国宪法，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山东的组党申请提出，尊重江泽民的国家元首地位，承认中共为执政党。这是毛泽东教出来的招术：“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共心知肚明，但是又不好说。棋下到这个地步，可说是出自高手。

**做法：**完全公开、合法、合中共的法。注册人员公开、纲领公开、做法公开。除了注册外，浙江朱康大还上街公开散发了上千份的“宣言”。王有才和王东海等人被抓后，二线人员通过合法手段申请示威抗议，明知得不到批准，但造成舆论，争取了同情。合法斗争还有一着：法律抗争。你不是有法吗？我就来个以法抗争。为此，各地民运人士组成了法律后援会，二、三线人员给被捕者聘请了律师。如果中共审判王有才，一场法律大战不可避免。其它的做法，如声援灾区、谴责印尼屠华等，不仅合法，而且得分。

总之，这次浙江和山东民运在策略上的操作，可圈可点，给后继者提供了不少借鉴。当策略灵活得使魔鬼迷惑时，我们算是相当当地成功了。

前面还有很多弯路，还有很多浪头，还要设计一系列的策略。勇气带动下的策略运用，仍须我们仔细探讨。

（作者为中国之春创办人，现任民主正义党发言人）  
（1998, 9, 9）

*Wang Bingzhang: Let Strategy Be Flexible Enough to Confuse the Devil*

*Wang argues that forming an open opposition under authoritarian rule requires both courage and flexible strategy. Reflecting on 1998 efforts in Zhejiang and Shandong, he stresses lawful tactics, careful tim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Moral bravery must be paired with adaptable political planning to weaken repression and broaden support.*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http://www.ZYD1998.com)

# 政治民主

(长篇连载)

作者：祝正明  
编辑：李聪玲 翻译：戈冰

## 内容提要

本书共十二章，探讨了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政府与百姓的相互关系，专制政权的特征，民主政治体制的思想理论和民主政治活动的具体做法，剖析了民主政治所特有的政府结构模式，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和社会发生政府重组的各种途径。相信在百姓对政治问题普遍不甚关心和了解的情况下，对增强百姓的参政议政意识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如何促进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建设，促进政府高效廉洁地为人民群众进行了充分的理论探讨。

## 民主政治的内容

集权统治者认为，社会离不开他们，是他们为社会提供了安定和秩序，没有他们就会天下大乱。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不需要有政府，政府不仅向人民征收苛捐重税，还制定大量的惩罚条例来约束民众，没有他们，人民可以更自由幸福地生活。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众本身并不须要政府，只是因为民众有一些共同需要，才须要建立起一个公共服务机构来满足民众的这些需要，民众据此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权限仅限于使他们能服务于民众而不能加害于民众，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思想原理。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之上的，认为人只要拥有权力，就存在滥用权力的趋势，因此，必须严格限制政府权力的使用，不给政府官员留下任何滥用权力的空间，以充分完善的法律制度建设，来保证社会时刻有一批优秀分子在为人民提供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一批同样优秀的社会精英分子时刻在监督与提防着他们，一旦发现这些人中有人不称职或滥用职权、贪污腐化，任何一位都会随时被撤离职位，受到惩罚，从而保证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在被使用时能够满足百姓的苛刻要求。除了周期性的选举以外，绝大多数民众都可以尽管放心地去从事他们的工商业活动，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需做的只是偶尔看看这些人提供的述职报告，健全的制度建设会使政府自动地像仆人一样照顾着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而周期性的选举，即是防止这些人形成新的阶级的手段，也是显示人民始终是权力的主人的表现，人民可以随时收回交给这些人代为行使的权力，交给新的一批人去行使。

民主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不同于历代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形成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格局。它首先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收回到人民手中，然后运用一种科学的机制，建立、控制与监督政府，使民众始终保有这种权力。民主运动是一场以增进全民利益为目的的运

动，全体国民是其受益者，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有义务和责任参加这项运动，促进民主政治的早日实现。

## 政府及其作用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你可能已经发觉：不论你生在何时，身处何地，都会受到别人的管制，不论你是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或者是腰缠万贯、被人前呼后拥，都同样无法摆脱这种管制。有人总是规定你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必须服从他们，如果你不服从，就会受到他们严厉的对待和残酷的打击。他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法架避，这就是政府和它的雇员。

多少年来，我们祖祖辈辈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现实，认为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就象必然就会伴随有山水草木一样，自然就有朝廷或政府，它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法摆脱。

这种概念已经变成我们社会的一种遗产，代代相传，以致于当突然没有皇帝朝廷或政府时，人们便会惊慌失措，坐立不安，赶紧要立一个新皇帝，即便他非常的年幼无知。否则，就认为一定会天下大乱。

政府跟百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在起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要人们向它进贡纳税。任何人，不管是个体摊贩、私营业主还是收入稍高的工薪阶级，任何形式的厂矿、企业、公司等，都要将自己辛苦经营出来的一部分利润或个人收入上缴给他们。这是强制性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其次，他们制定出很多的法律、条例，规定人们哪些是允许做的，哪些是不允许做的。如果你不遵从他们的规定，与他们对抗，他们就会对你进行罚款，没收你的财产，甚至拘禁你的人身，扼杀你的生命。他们依靠广泛的税收，养活着一支庞大的警察队伍和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击溃任何来自民间的反抗。它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从事任何劳动就能享受到荣华富贵，无任何特长仍能花天酒地。它们在内部划分势力范围，规定层层等级，享受各类特权。它们有时贪污腐化，恣意妄为，甚至敲诈勒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耸人听闻的事件都与它们有关。

既然如此，干吗还要政府呢？没有它们，人们不是可以生活得更好吗？

回答是：也不行，有很多事情，还必须要由政府来做。

在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政府来维持社会治安、保障经济合同的履行，需要政府来修筑道路、管理交通、兴办教育、医疗、管理老年人的退休保障，需要政府来监督食品卫生、控制环境污染，建立应急医护消防力量。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即便是很有组织能力、很有威望、经济实力非常强大的富豪或公司。

显然，社会还是存在着各种公共和社会福利问题，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机构也就是被称为政府的机构来解决和管理的。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没有政府，人们也将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

但是，显而易见，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根据民意设立，受民众的控制，为民众利益服务、以满足民众需要为其存在目的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脱离民意，漠视百姓利益，依靠自己的暴力工具强制征收税款、暴力镇压反抗而维持其存在的强权政府。

但是，既然需要设立政府，不管其建立的基础是依靠暴力或依靠民意，都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必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广泛的权力，政府官员大权在握，在政府官员以这种权力社会安定提供某种保障的同时，这种权力也给他们侵犯百姓的利益提供了种种机会。他们可能忠心耿耿地为大众服务，也可能会滥用职权。结果，人民大众得到社会安定的好处的同时，往往也有可能付出过重的经济代价甚至是惨重的人身自由代价。

那么，难道民众非得在享受政府提供的益处的同时，也必须忍受它对民众可能有的种种伤害吗？

人类有充分的智慧去战胜自然，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人类社会自身的这个问题，却成了人类追求幸福的一大障碍。人类有能力和智慧去解决它吗？这是无数仁人志士思考过、并进行过种种探索和尝试的问题。现在，它再一次摆到我们面前。所幸的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前人进行的大量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选择最佳方案，少走弯路。

实际上，政府及其组织结构也和人类社会的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因此人类完全有能力对它进行设计、改造。探讨理想的政治模式，对各种社会问题及弊端的起因进行研究，以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是人类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事，这也正是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像其它自然学科一样，政治学同样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是为人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的。人类有能力对政治模式和政府结构进行不断的实践、总结与改进。

但是现在，当我们还很年幼，尚未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之前，我们就被灌输了某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我们已经习惯于以该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去思考问题，以致于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在这种思想理论中寻找依据，或者打上它的旗号才会感

到放心。这就产生了一种悲剧，本来是人们掌握了一种思想理论，结果反而却是这种思想理论控制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成了这种理论的仆人，不是它在为我们服务，而是我们在为它服务。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没有止境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就像各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在不断发展一样。对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进行仔细而公正的研究而不发现其缺点是不可能的。试图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与社会制度当作完美无缺的真理而不允许触动是荒谬的，停留在某种社会体制而自认为已经达到了顶峰，只能是极端愚蠢的表现。

但是，没有一个统治阶级会愿意主动交出权力，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在专制统治时代，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常常具有危险性。因为这会触及少数大权在握的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可能给探索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正是极少有人敢于或愿意进行这种探索的原因。尽管社会非常需要有人去做这项工作，却很少有人会去做。

但是，有充分的理由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健全的政治制度是促进社会福祉的最有效工具，而一个腐败的政治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最可怕敌人。那么，相对任何其它科学而言，政治科学就应该是人们最值得花精力去研究的科学。

地球上曾经存在及目前正在运作的政府中，没有一个是没有缺点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需要与社会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同步进行。任何政权也不应该坚持不改自己的制度，尤其不应对探索人类社会各种问题及解决办法的行为进行惩罚，限制富于创造性的探索。正是因为有了思想的自由地探索，科学与技术才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只有让思想自由地探索，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发展到更美好的境界。（下期待续）

#### 祝正明简历

祝正明，男，汉族，浙江江山人，工程师，1962年10月2日生，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分配在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被评为联合公司先进生产者，1988年调入杭州，从事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设备调试等技术性工作，并担任车间主要负责人。1998年春被选拔参加省经委举办的全省大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培训班，为期三个月。

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痛恨专制不平等现象。

89年学运期间，曾在北京天安门发表演说，并向天安门学运领袖递交过十条政治运作建议，“六四”后回杭潜心从事西方历史、政治思想史研究，遍阅各主要图书馆的大部分有关民主的中外文书籍，95年开始，从基本民主观念入手，写成《政治民主》一书，98年1月完稿，联系近十家出版社无人敢接印，4月进行自费印刷，遭查封。

98年6月初，分析了国内社会现状和政治时局，积极筹划建党活动，起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和《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并进行印刷、散发，联络诸位民运朋友于6月25日前往注册，从而掀起了一轮冲击党禁的全国民运浪潮。1月10日，遭抄家，被抄走电脑、打印机、数字收音机、数千页文稿、通讯录、大量《公开宣言》和《章程（草案）》等三十一一种物品，被关押十六天，监视居住五十天。于11月8日经选举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负责人，全国筹委会筹委。

祝正明于99年初被捕，同年年底因中国民主党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 宁波市公安

## 起诉意见书

甬公刑诉字（2006）83号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别名：力虹，男，1958年3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3302041958030601014，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家住本市江东区宁舟一村5幢7号604室。

该张建红曾因反革命煽动罪错于1989年被宁波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3年。2006年9月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本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依法逮捕。

经本局依法侦查，现已查明：2006年5月到9月，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以“力虹”笔名撰写文章117篇，通过其电子邮箱lhqqq0@hotmail.com将这些文章发送给“大纪元”、“博讯”、“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这些网站发表。其中62篇文章具有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内容，该张利用其参与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关闭，“苏家屯事件”、“北京高智晟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等大做文章，声称我国现行国家政权“反自由，反天赋人权的顽固本质，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如果再让一个业以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叫嚣”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繁殖、传播与肆虐。但是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了。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中共当局为苟延残喘延续专制统治已经到了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的地步”。煽动“中国人彻底告别这个黑暗日子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本质，看清了要挽救我们的国家、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像一个人，必须尽早、尽快结束目前的罪恶统治。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

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政权统治而共同努力”。

为扩大影响，便于他人查阅其撰写的文章，犯罪嫌疑人张建红还在“大纪元”、“民主论坛”、“自由圣火”等网站分别建立了“力虹专栏”、“力虹书房”和“力虹文集”。今年3月份以来，还多次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接受境外网站提供的稿费。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书证、物证、搜查笔录、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亦供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局长：〔印章〕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六日

附：1、本案卷宗共6卷982页。

2、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 宁波市公安局 起 诉 意 见 书

甬公刑诉字〔2006〕83号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别名：力虹，男，1958年3月6日生，身份证号码330204195803061014，汉族，大学文化，无业，家住本市江东区宁舟一村5幢7号604室。

该张建红曾因反革命煽动罪错于1989年被宁波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3年。2006年9月7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本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被依法逮捕。

经本局依法侦查，现已查明：2006年5月到9月，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以“力虹”笔名撰写文章117篇，通过其电子邮箱lhqqqq@hotmail.com将这些文章发送给“大纪元”、“博讯”、“民主中国”、“民主论坛”、“观察”、“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圣火”等网站，在这些网站发表。其中62篇文章具有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内容，该张利用其参与创办的“爱琴海”网站被关闭、“苏家屯事件”、“北京高智晟事件”、“山东陈光诚事件”等大做文章，声称我国现行国家政权“反自由、反天赋人权的顽固本质，是整个人类不共戴天的死敌。极权中共残害大陆人民长达57年。如果再让一个业已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严重、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叫嚣“共产瘟疫开始在神州大地以几何级的速度迅速繁殖、传播与肆虐。但是，

那个被命名为‘共产主义’的病毒太过强大，太有欺骗性和诱惑性了。从历史考察，造成东方近百年赤祸泛滥横行、苦难罄竹难书的邪恶学说之源头，就是来自欧罗巴大陆。中共当局为苟延残喘延续专制统治已到了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的地步”。煽动“中国人彻底告别这个黑暗日子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我相信，结束专制独裁走向自由民主之途，除了依靠全民族的觉醒和全中国人民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绝对离不开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为了揭露中共当局反人道、反人性、反文明的惊世暴行与罪恶，更是为了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大的极权暴政，挽救更多的受杀戮、受迫害、受奴役的苦难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与本质，看清了要挽救我们的国家、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像一个人，必须尽早、尽快结束目前的罪恶统治。直到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共产极权黑暗统治、迎来民主新中国在千年神州大地呱呱坠地的那一天！我还要感谢上苍所赐的互联网，在今年3月9日《爱琴海》被关、‘苏家屯事件’被揭露之后的日日夜夜里，让我坐在电脑前挥笔著文，能够奇迹般地于外部文明社会时时沟通、休戚与共，与全世界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正义人士站在一起，为早日结束地球上最后、最野蛮残暴的极权统治而共同努力”。

为扩大影响，便于他人查阅其撰写的文章，犯罪嫌疑人张建红还在“大纪元”、“民主论坛”、“自由圣火”等网站分别建立了“力虹专栏”、“力虹书房”和“力虹文集”。今年3月份以来，还多次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接受境外网站提供的稿费。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报案记录、书证、物证、搜查笔录、电子证据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张建红亦供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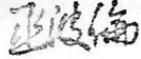
认不讳。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现将此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 致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局 长：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六日



附：1. 本案卷宗共6卷982页。

2. 犯罪嫌疑人张建红现羁押于宁波市看守所。



#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 荣誉主编：

毛庆祥 (发起人) 谢长发 (倡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鲁慧文

轮值总编辑：彭小梅

日本分社社长：漠北独侠/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韩瑞媛

副主编：张致君 陆乾坤

编辑部：李聪玲 (部长) 李晶 (副部长) 钟然 (副部长) 张娜 (副部长)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Gloria Wang 赵杰 Geoffrey Jin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胡雨 莉 程伟

美编部：胡海宁 (部长) 刘敖 (常务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阎梦菁

收稿部：马群 (部长) 彭小梅 (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信息技术部：卢新虎 (部长) 李建伟 (副部长) 邢致远 卢超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校对部：冯仍 (部长) 熊辩 (副部长) 程筱筱 (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翻译部：彭小梅 (部长) 吕峰 (常务副部长) 何兴强 周敏 戈冰

采访部：巫伟杰 (部长) 林小龙 (常务副部长) 缪青 (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方鹊 宋娟华 瞿成松 邢致远 [旧金山记者站]：缪青 (站长)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宣发部：Gloria (部长) 彭硕 (副部长) 曾群兰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夏体姗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人权观察部：安浦 (部长) 张维清 (副部长) 黄吉洲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胡志飞 黄子腾 陈娟 老默

外联部：张致君 (部长) 赵杰 (副部长) 林小龙 (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房兰峰 汪洋 Rong

财务部：朱晓娜 (部长) 高晗 (副部长) 朱小砚 (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吕聪 (部长) 张宇 (副部长) 陈婷 (副部长)

档案部：侯改英 (部长)

法务部：陈闯创 郑存柱

###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Send Money with Zelle®  
OPPOSITION PARTY INC



Zelle®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年1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捐款日期	捐款者姓名	捐款用途	捐款金额 (USD)
01.14.2026	MINGYI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300.00
01.14.2026	CHAO LU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14.2026	XINGQIANG HE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14.2026	BINGBING ZHU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15.2026	QINGMEI SHI	捐国内政治犯	\$500.00
01.15.2026	YONG ZHANG	捐国内政治犯	\$300.00
01.15.2026	GANG OUYANG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01.15.2026	JIN ZOU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15.2026	HAOWEI SHI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16.2026	YUNCAI XU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01.16.2026	HONGCHANG ZH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0.2026	KUN Y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0.2026	XIAOJIA ZH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0.2026	GE YAO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0.2026	LIANJIANG W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0.2026	JINGHUI CHEN	日常	\$2,000.00
01.21.2026	FENG LYU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01.23.2026	XIUHONG JIN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0
01.26.2026	LANFENG FANG	捐国内政治犯	\$200.00
01.26.2026	JING LI	捐国内政治犯	\$150.00
01.26.2026	QIANKUN LU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6.2026	JIANWEI LI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7.2026	GUOAN HU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7.2026	WEIQING ZHANG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8.2026	TISHAN XIA	捐国内政治犯	\$150.00
01.28.2026	FAQUN FAN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01.29.2026	KEKE SHAO	捐国内政治犯	\$100.00

## 幕后团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 荣誉墙



**张致君**，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2025年协助朱虞夫搭建《在野党》团队架构，参与人员招募与组织协调工作，并在复刊后长期承担杂志的公关事务及日常运营支持。

在具体事务中，她负责统筹流程对接与事务协调，协助处理突发事项，维持编辑团队的工作节奏与刊物的持续运转，是杂志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力量。



**程筱筱**，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校对部副部长、信息技术部成员。加入团队以来，参与刊物校对与文字规范工作，负责稿件审阅、细节复核及出版前核查，确保文本表达的准确与严谨。

她持续优化校对流程与文字标准，提高工作效率；对稿件进行复核与结构梳理，使表达更加清晰，并协助完善版面与发布节奏，保障刊物稳定出刊。

## 黎智英 Jimmy Lai (1947 -) 香港新聞自由的守望者

他從貧窮中走來，以勇氣改變命運；又在時代轉折處，選擇為自由承擔代價。創辦《蘋果日報》，他用新聞對抗權力，用真相對抗遺忘。面對鐵窗與審判，他沒有退却，也沒有沉默。在恐懼成為秩序的年代，他守住了一個人最後的尊嚴。

因為總有人，寧願失去自由，也不願放棄自由。

